

# 中国民主季刊

# CHINA

2023年10月

第4期

卷1

VOL. 1

NO.4

OCT. 2023

# JOURNAL

# OF

# DEMOCRACY

发展、韧性与危机：这个政权还能持久吗

黎安友 / 王天成

中国错失经济现代化机会：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视角

文贯中 / 张杰

中国民主化会乱吗

王飞凌 陈健民 胡平 宋永毅 坚真光 李西潭 等

自由爱国主义

周保松

使非暴力运动更有力量

索菲亚·麦克莱纳 斯尔杰·波波维奇 等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

主编 Chief Editor

王天成 Wang Tiancheng

副主编 Deputy Editor

滕彪 Teng Biao

运营协调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芮朝怀 Rui Zhaohuai

编辑 Associate Editors

Amelia Pang

张杰 Zhang Jie

余浩风 Yu Haofeng

技术、发行总监 Tech & Promotion Director

杨子立 Yang Zili

---

主办、出版 Organization & Publisher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电邮 Email: [cjd@chinademocrats.org](mailto:cjd@chinademocrats.org)

网址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

---

电子版刊号 ISBN (electronic): 979-8-9875925-0-2

印刷版刊号 ISBN (print): 979-8-9875925-2-6

---

2023 本刊版权属于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2023 by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

### 国际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戴雅门 Larry Diamond	王飞凌 Wang Feiling
陈健民 Kinman Chan	盖思德 Roger Garside	文贯中 Guanzhong James Wen
陈志柔 Cih-Jou Jay Chen	胡平 Hu Ping	吴国光 Wu Guoguang
郭丹青 Donald Clarke	林培瑞 Perry Link	吴介民 Wu Jieh-min
孔杰荣 Jerome Cohen	许田波 Victoria Hui	许成钢 Xu Chenggang
戴大为 Michael Davis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

### 国际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阿古智子 Tomoko Ako	李酉潭 Yeau-tarn Lee	曾建元 Chien-Yuan Tseng
陈杰 Jie Chen	李玲 Ling Li	王兴中 Hsing-Chung Wang
陈育国 Yuguo Chen	罗世宏 Shih-hung Lo	吴玉婷 Andrea Worden
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艾华 Eva Pils	吴强 Wu Qiang
柯蕾 Chloe Froissart	任思梅 Johanna Ransmeier	许秀中 Vicky Xu
郝志东 Zhidong Hao	石小琳 Katrin Kinzelbach	叶耀元 Yao-Yuan Yeh
郭汤姆 Thomas Kellogg	古思亭 Kristin Shi-Kupfer	赵荔 Zhao Li
卓玛加 Dolma Kyab	贡嘎扎西 Kunga Tashi	
廖雨诗 Yushih Liao	楚克斯 Rory Truex	

---

---

# 目录

---

## 访谈

### 8· 发展、韧性与危机：这个政权还能持久吗？

黎安友 / 王天成

### 24· 中国错失经济现代化机会：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视角

文贯中 / 张杰

### 44· 抗议的伦理：从非暴力运动、非文明抗争到 #MeToo 运动

艾华 / 曾金燕

## 笔谈

### 56· 中国民主化会乱吗

王飞凌 陈健民 胡平 宋永毅 坚真光 李酉潭 雷乐天 弥正平 王涵 邓聿文

## 当代问题

### 76· 自由主义的四次“左右之争”（下）

陈纯

### 96· 自由爱国主义

周保松

### 114·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

彭涛

## 台湾视角

### 130· 美国促成日韩和解与围堵中国态势的成形

曾建元

## 民主转型

### 144· 使非暴力运动更有力量

索菲亚·麦克莱纳 斯尔杰·波波维奇 约瑟夫·赖特、言晓义 译

## 制度设计

### 168· 从新角度看半总统制：一个主题的不同情况

罗伯特·埃尔吉文、徐行健 译、王天成 审校

## 读书

### 188· 捷克斯洛伐克的圆桌谈判

莫里斯·卡尔达

## 简记

### 200·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Eleanor Zhang

---

### 210·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 211·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

◎ **致谢：**郑玉禧为本期所有画作作者

---

## Contents

---

### INTERVIEWS

8.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d Crisis: Can this Regime Last?  
*Andrew J. Nathan / Wang Tiancheng*
  
24. China's Missed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Factor Markets and Urbanization  
*Wen Guanzhong/ Zhang Jie*
  
44. The Ethics of Protest: From Nonviolent Movement, Uncivil  
Resistance to #MeToo Movement  
*Eva Pils/ Zeng Jinyan*

### CONVERSATION

56. Will China's Democratization Create Chaos?  
*Wang Feiling Kinman Chan Song Yongyi Jian Zhenguang  
Yeau-tarn Lee Lei Letian Mi Zhengping Wang Han Deng Yiwen*

### POLITICS AND SOCIETY

76. The Four "Left-Right Controversies" among Champions of  
Liberalism in China (Part II)  
*Chen Chun*
  
96. Liberal Patriotism  
*Chow Po Chung*
  
114.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t Movemen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Peng Tao*

### TAIWAN PERSPECTIVE

130.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Shaping of the  
Encirclement of China  
*Chien-Yuan Tseng*

## DEMOCRATIC TRANSITION

144. How to Sharpen a Nonviolent Movement  
*Sophia McClennen, Srdja Popovic, Joseph Wright*  
*Yan Xiaoyi(trans.)*

## INSTITUTIONAL DESIGN

168. A Fresh Look at Semipresidentialism: Variations on a Theme  
*Robert Elgie*  
*Xu Xingjian and Wang Tiancheng(trans.)*

## BOOKS

188.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Czechoslovakia  
*Moliš Calda*  
*Zhang Xiaoshan etc.(trans.)*

## NOTES

200.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vents  
*Eleanor Zhang*

---

210. Call for Submissions

211. How to Subscribe

---

© All paintings in this issue are by Cheng Yosea.

访谈

黎安友 / 王天成

中国民主季刊

第 1 卷 第 4 期  
2023 年 10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发展、韧性与危机：这个政权还能持久吗？





黎安友



王天成

**编按：**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权曾表现出很强的韧性、适应能力。习近平所建立的新极权体制，是否也同样有这种韧性和能力？它是否有能力修复最近显然陷入困境的经济？中国的发展程度是否已经使民主化变得更加可能？它是否可以不经历民主化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所说的“中国威胁”是什么？中国将来如果分裂，会有什么可能后果？《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就这些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教授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曾帮助过许多中国学者、活动人士。今年恰逢他八十大寿，我们做这篇访谈也是本刊全体同仁对黎安友教授的祝贺、感谢和致敬。

**王天成(以下简称王)：**黎安友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长期关注中国的问题，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中国很多学者和读者对您的观点非常感兴趣、非常关注，很高兴今天能对您做一个访谈。做这个访谈，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今年是您80大寿。过去几十年中您帮助了很多的中国民主人

权人士，我和同事们都觉得应该为您庆祝、向您表示感谢。

**黎安友(以下简称黎):**到了八十了，还得学习(笑)。

**王:**中国的事情在不断变化，所以要不断密切关注(笑)。我们从您在2003年左右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开始，就是中国威权主义具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适应能力很强。您不同意当时有名的一个看法，即“中国即将崩溃”，也不同意一些人对民主化的乐观预期。这么多年过去了，看来您是对的。不过，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两位数增长率。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继承趋于制度化。现在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前景堪忧。习近平向毛时代的极权主义倒退，当然不能完全回到毛时代；也废除了任期限制、终止了制度化。还有，中国的国际处境也显著恶化。您认为习近平的新极权统治是否也具有韧性？

**黎:**这个问题当然提得非常好。中国现在面临一些经济问题，但这不是第一次。过去也面临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过了关，因为他们管理经济的一些专家非常有能力。这一次是不是比过去更严重一些，值得讨论。因为现在经济的危机可能有三、四种特殊情况。

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现在的规模比以前更大，有没有办法解决是一个问题。第二，外部市场与过去比不那么欢迎中国的产品，这个跟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就是中美之间的所谓“战略竞争”，以及中国“战狼外交”引起一些欧洲国家、澳大利亚的反对情绪，认为与中国经济联系过于密切是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外部出口市场能不能恢复是一个问题。第三，人口结构问题，人口越来越老化，长期看会给中国经济更重的负担。最后，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候暖化。

考虑到这几个比过去更严重的问题，中国能不能恢复经济发展速度，值得怀疑。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政治方面的问题，您刚才提出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去制度化。其中，关键是接班。除此以外，应该承认中国现在还是非常制度化的。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一个庞大执政党和党内纪律体制，有一系列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所以，从制度化看，关键是接班有没有制度化。

我认为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制度，动摇了接班的稳定性。因为如果习或者身体不佳，或者突然去世，或者习的政权受到党内外的挑战，遇到这么一个政治危机的时候，在人大或下一届人大、或者党内有人提出接班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及时接班？等等。

当然，按法律、按党章有一个接班程序。比方说，国家主席是副主席接班，但是副主席是不是真的能够接班、巩固权力？所以，如果习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继续掌握权力，可能会引起比较激烈的权力斗争，这非常危险。

总结起来，关于中共的制度是不是还有韧性的，我认为近期、中期仍然有韧性，因为国家力量强，社会力量弱。但习如果出问题，韧性的期限很可能结束。

王：可不可以这样概括您刚才说的，就是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把权力集中

在他个人的手里，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体制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这个体制同时还因为官僚体系很强、社会弱小而从中获益。可以这样概括吗？

黎：可以。

王：我们回到经济的观察角度，回到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学者，例如李普塞特（Martin Seymour Lipset），认为民主的产生与存在跟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过去也有经验研究，比如说已故哈佛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的研究认为民主转型更有可能发生在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中国1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亨廷顿的看法成立的话，它现在实际上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民主化。我们国内国外有很多学者、评论家认为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现代化理论是不是一个适合分析判断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工具？

黎：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当然现代化多了。人均收入13,000到14,000美元。中国的中产阶级多大要取决于定义。中国全部人口的1/3左右是中产阶级，他们住在大城市，教育程度高，有房子、车子等，能够到国外旅游，享受消费主义生活。当然，中国还有2/3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属于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等等。

但这个2/3的、比较不富裕的人口，他们中90%左右受过教育，用互联网、手机、计算机、电视，信息来源丰富。当然信息都是当局产生的。但他们有这种信息工具，所以包括农民工，他们的期望也提高了，对生活的要求提高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可以期望中国会民主化。但是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等人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李普塞特是1950年代写作的，而且他的理论不涉及到民主转型，而涉及到民主稳定。他说如果是生活水平比较高，中产阶级占多数，一个已经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会维持民主制度而不倒退。

亨廷顿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认为民主转型、民主的存在、民主的韧性等主要不取决于经济格局，而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政治制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如果政治制度比较强、比较制度化，你的制度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都会有效。

那么，后来有一些学者，比如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有民主转型，主要取决于一些偶然的政治因素，跟经济发展程度缺乏必然关系。但转型之后，如果超过平均6000美元人均收入——当时是6000美元，现在可能要更多，因为每年货币在贬值——它就不会倒退回专制。

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判断比较复杂。我认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它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最近被印度超越），历史复杂，社会结构复杂，外部环境复杂。不能用简单的学术理论去概括中国的未来。

王：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应该区分民主与存在的条件。我们接着往下走。过去有不少的威权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智利、韩国等，但是后来经济放缓，它们就陷入危机、发生了转型。斯坦福大学的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认为现代威权国家有一个“经典悖论”（classical contradiction），一方面需要做到经济快速发展、提升生

活水准来维持统治，但是经济发展本身也会预备有一天可能摧毁专制的力量，包括刚才谈到的中产阶级和独立的公民社会；当经济放缓、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危机可能就来了。我认为，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其实也在经历这样的悖论，虽然对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看法。您是否认为中国也陷在这样一个悖论中？您如何评估经济放缓对共产党政权构成的政治挑战？

黎：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这样描述，就是它如果能够达到快速发展的目标，长期看会威胁它的政权，因为越是快发展，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知识程度、资产的拥有量、对生活的要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等就越高，就越快培养一些早晚会反对专制统治的力量。

但同时，如果不快速发展的话，会引起大家的不满情绪。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听说中国的年轻人，就是16、17岁到20多岁的人，失业率超过20%，不能就业的人会不满意，很多人要到国外读书或者读第二个学位等找出路。年轻人不满意对任何一个政权都是非常危险的。在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中，学生是最危险的，对不对？

王：我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参加“造反”（笑）。

黎：对。五四运动、1989年都是学生造反。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快的话长期看会有危险，经济发展慢的话会有近期的危险。但同时，也要承认上面提到的、中国的威权制度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威权制度更强大。它有更多的工具去控制，比方说人工智能。如果年轻人要造反，他一上街，警察立刻就知道谁上了街，谁说了啥，等等。所以，你要反对这个政权，比以前

反对任何一个中国的政权，或者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或者任何一个不知道哪里的纳粹政权，都要危险。而且，我认为中国人都是非常清楚这点，所以他们不可能任意地去“妄议中央”、任意去上街，需要别的历史事件、更严重的危机，才能让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一般人上街。

所以，我一方面承认经济问题给了现在的政权一个矛盾，承认发展快速有危险、慢速也有危险，但同时不能简单说因为经济的问题，中国的政权早晚会的倒台，我没有信心那么简单地判断未来。

王：现在经济放缓显著，的确遇到了麻烦。新冠疫情之后，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有大的反弹，焦虑、失望的情绪非常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经济很糟糕，共产党可以用更残酷、严厉的手段控制，可以变成北朝鲜那样，经济不发展、贫穷也没关系。我觉得北朝鲜和中国不太一样，北朝鲜的人没有享受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好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发展中间期望值提高了。假如对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共产党不能像以前一样修复，您觉得中国变成北韩的可能性有多大？

黎：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第一，你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已经富裕了很多，它不可能倒退到北韩的地步。第二，北朝鲜非常孤立、跟外部没有什么来往，中国已经打开了大门，没有彻底关门的可能。第三，我要承认北朝鲜是一个谜，我明白北朝鲜怎么能够这样。是不是跟朝鲜人的文化有关系，跟朝鲜与韩国是分离的紧张格局有关？我认为很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北朝鲜怎么能够维持这么一个制度。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这么做，因为中国老百姓太聪明，他们的自尊不会接受这种待遇。

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先例，就是一个国家到了中等发达程度后，它不经过民主化就上升为发达国家——当然，这里我们不考虑一些石油出产国。若干年前，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欣教授，在我作为《中国战略分析》共同主编时对他做的一个访谈中，特意提到这一点。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不经历民主化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黎：从某种角度去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从技术发展、工业化程度看，它已经是一个高技术化、高教育化、高交通化、非常发达的国家。有些中国人来到纽约，认为纽约是一个不发达地区，比北京、上海落后。

王：他们说纽约像第三世界（笑）。

黎：我们看起来像落后国家，中国是发达的（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敏欣教授的观点已经被否定（笑）。中国提出了一种另类现代性观点。传统上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模式只有一种，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等等。所以，现代性（modernity）只有一种。但是中国和南半球、西方之外的一些理论家认为，也可以有另一种或另几种现代性。中国是另一种现代性，就是说它同时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消费主义的社会，但是政府控制着制度和文化的建设等等，跟西方不一样。

我认为中国可以说自己是另一种现代性，但是它的现代性不是非常稳定，因为它里面有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内在矛盾，包括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接班制度。



当然，同时也要承认西方的现代性也不一定非常稳定。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制度会不会永远存在，欧洲的制度会不会永远存在，都是动态的局面，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历史是不停止的。

有个理论家过去说历史终结了，是吧？（王：福山《历史的终结》）。可是我们发现历史没有什么终结，除非打核战终结或者气候暖化终结人类历史。终结人类才能终结历史，有人类就不会终结历史。

我们有点偏题了（笑）。的确要承认西方也有它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特别不稳定。我不是说它5年或者10年之内或者多少年之内发生危机，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它早晚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到根本变化的时候，是会转好还是转坏，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王：我觉得什么算发达国家，应该有一个指标，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人均收入。中国虽然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口很多，平均收入还是不高的。

黎：中国的人均收入13,000-14,000，当然没有日本、韩国、美国、欧洲那么高，但是还是不错（笑）。

王：还有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等等，人均收入也要比中国高不少（笑），属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现在转到另一个问题，看看最近中国的国际环境。美国和西方盟国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要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最新的说法叫做“去风险化”。与以前不一样，对华政策转向强硬。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限制关键技术出口和进入中国，包括半导体芯

片、人工智能等。

您前不久提到西方对华政策这种转变会刺激老百姓的民族情绪，老百姓会更加支持政府，这一点上可能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作为一个美国教授，您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西方所感到或者受到的“中国威胁”是什么？威胁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对它的崛起，西方会不会不那么担忧、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态度？

黎：西方是一个概念，美国是一个概念。为了简化我的回答，我主要注意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可不可以这样限制一下？

王：请限制在美国。

黎：美国是西方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威胁”，对于美国具体是哪些，在美国是很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都能够同意，比方说中国要统一台湾会威胁美国的一些利益、在亚洲的影响。也可以承认，如果中国占领所谓的“21世纪经济高峰”，比如半导体技术、电力车生产、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换句话说，谁能够占领控制这几个21世纪经济非常关键的领域，谁就会占优势、赚很多钱，会或多或少控制别的国家的经济和信息，更方便进行信息战、间谍活动。

所以，台湾是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是21世纪经济的垄断或者控制、优势，谁胜谁败至关重要。

其次，还有很多别的、不一定那么清楚的方面，比方说中国要不要推广它

的意识形态到别的国家，要不要动摇西方人权民主意识形态的权威？它要不要在非洲或者南美或者中东，取代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它要不要取代西方控制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要不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新国际秩序？这些都成问题。

西方学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共识。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为什么搞不清楚中国的威胁的一个理由，是习近平说话不是非常清楚，他没有很清楚说他的“中国梦”在国际领域具体是什么。他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上、很清楚，但是别的问题他用比较朦胧的提法，比方说“国际秩序民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说（笑）。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看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中国威胁台湾、威胁西方在技术领域的优势，这两点已经足够告诉我们与中国的、拜登政府所谓的“战略性的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是什么。这个战略性竞争已经够严重、够庞大、够重要。所以，我认为西方的决策者可以基于这两个威胁制定、推展政策。

台湾问题不只是台湾的，也对西方同盟体系稳定性构成挑战。如果中国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北约、欧盟的同盟关系都会被动摇，因为美国会失去所有的可信度。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很大的、全球性的问题。

还要说一句，我认为武力攻台是一个“零和游戏”。为什么是零和游戏？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以提高互相信任，可以找一个办法谈判。我并不认为，中国应该把情绪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和百年侮辱的因素放在一

边。中国为了它自己的安全，需要控制台湾这个大岛。但美国因为台湾问题跟盟国体系的关系，它必须不能让中国用武力统一。我们可以拖，把这个问题拖到未来，但不能找到一个两边都高兴的解决方式，是不是？

王：台湾当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不能接受以武力解决，也不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吞噬一个民主政治体。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崛起，它对周边和更远地方影响、控制潜力的增强，美国、西方的态度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我今天问了很多假设性问题（笑）。

黎：好的（笑）。我刚才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存在，一个庞大的地理存在，它在海边有所谓的“第一岛链”，日本岛、台湾岛、菲律宾岛、印尼岛，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海军如果要自由地穿行大海，它要通过第一岛链。如果台湾不是中国控制的，你不能穿越第一岛链自由地去大海。

中国为什么要去大海？因为中国是一个贸易国家，进口庞大、出口庞大，进口包括一些非常关键的、经济需要的资源，比方石油。所以，我认为，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或者是王天成还是黎安友控制的政府（笑），都要突破第一岛链。要突破一岛链，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控制台湾。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取决于一些客观的、安全上的考虑。

王：我们在国内和海外流亡人士中，当然其中包括学者、自由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中国的统一是不重要的，可以、甚至应该分裂成很多小

国。当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很担心、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我从民主转型的角度，觉得中国在政治控制放松后如果分裂，会让民主转型复杂化，可能会导致民主转型失败。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采用什么转型战略，才更可能避免分裂、成功建立民主。在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第一本著作是关于民国初年北京政治的。从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假如说中国分裂，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黎：中国以前有分裂的格局，20世纪相当长时间是军阀时代。我认为，军阀时代的分裂是不能持续的。因为有两种因素发生影响，而现在这两种因素比二十世纪初更强。一个是刚才也提到的，作为一个地理存在，中国必须统一，如果不统一的话，它的经济不灵，交通受到阻碍，安全也非常脆弱，等等。就是说，客观来讲，它必须统一，自然而然是一个统一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分裂的东西。它一分就要合，就会有一种内在动力要统一。

第二个因素是人性，人性本恶，对不对（笑）？比方说，你是广东的统治者，你当然要控制福建、广西、云南，你认为自己不安全，因为你怕福建的统治者会攻击你，所以你要先攻击他，等等。所以，如果再有一个军阀分裂的时期，军阀和军人当然还要打仗。

所以，我认为不仅从地理上的客观、自然而然的性质来讲，从人性的观点来讲，如果中国分裂，为了不让分裂的状态继续，就一定要经过一个统一的过程。

从外部的观点来看，分裂的中国并不是好事，因为第一，它不稳定，第

二，它不富裕。从外国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虽然有一个所谓“中国威胁”，它也有一些好处，比如我们知道是谁执政，对不对？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要给习近平打电话，他有权力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有权力回答你。如果中国是分裂的，它还是一个人口非常多、经济很重要的国家；在各种国际问题上，像气候暖化、国际组织问题，等等，它还是一个关键的国家。如果它分裂了，我们不知道谁能够接电话。所以，我是认为西方不太想看到中国分裂。

王：非常感谢您的这些细致的评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刚开始时说过，今天做这个访谈，除了中国很多学者、活动分子对您的看法非常感兴趣，还有就是今年是您的80大寿，按中国传统应该特别庆祝。您过去帮助了很多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包括我本人也是您帮助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借这个机会，可否请您对您曾经帮助过的人说几句话，包括您的期待？

黎：我自己不相信这么快就到了八十岁，我内心的感觉还没有到八十。

王：十八岁（笑）。

黎：十八岁或者六十（笑）。我要从两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你们在中国之外关注中国，因为你们是中国人的，当然关注自己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你们在国外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就是利用国外的言论自由的环境追求真实。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个方面的机会非常受限制，他们可以思考，但是不能自由出版、发言、广泛交流。所以，你们这个责任非常之重，我非常佩服像你们这样的人，在国外继续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工作。

第二点，你们住在自己国家之外，有一个生活的问题，要有收入、要解决语言的问题、要解决家属的问题，要适应一个对你们奇怪的文化环境，等等。所以，我如果在过去帮助过一些人的话，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光光是抽象的知识分子、抽象的战斗者，他们也是人、有人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帮助，帮他们安定下来、稳定生活，他们才能够继续思考、继续发言、继续奋斗。这大概就是我要说的。

王：再次感谢您。请多保重。

访谈

文贯中 / 张杰

中国民主季刊

第 1 卷 第 4 期

2023 年 10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中国错失经济 现代化机会： 全球化、要素 市场和城市化 视角





文贯中



张杰

**编按：**“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于是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开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调节，加入WTO，力图融入世界。在所谓“中国模式”下，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这种模式遭到空前挫折，发达国家正关上大门。它们在剥夺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吗？“中国模式”为何漏洞百出？为什么抗拒要素市场发育，中国的农业和城市化走上歧途？中国现代化还有生机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先生最近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已被党国体制绑架，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这个判断所依据的逻辑成立吗？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文贯中教授。

**张：**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但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和投资，甚至推出了“小院高墙”策略，为何昔日敞开的全球化大门正在对中国关上？

文：中共常说的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指的是全球化的机遇，中共打了个时间差，表现为世界向中国开放，中国没有同等开放。而百年未遇的变局，则指中共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一举成为“厉害国”，自以为羽翼丰满，已能改变世界现行秩序，由中共主导。中国的两大全局性改革（见下文）确实使它抓住了第一个机遇。至于第二个机遇，中共高估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模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没有完成要素配置机制和所需的宪政民主两者的制度转换。

加入WTO前，中国做过两大全局性改革，给世人巨大希望。再者，前苏联阵营在1990年代初全面崩溃，其中许多国家立即选择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自称也要学样。这些变化同样令人鼓舞。世界对中苏两大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希望，认为两国会在制度和价值上与发达的民主国家趋同，因而超级全球化值得一试。换言之，发达国家愿意在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实现之前，给经济全球化一个机会，并希望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发达国家同意提前执行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中国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之前，根据跟进原则，中国可单边享受这一待遇，以换得中国承诺，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向发达国家对等开放。

中国加入WTO前所作的两项全局性改革如下。第一项，在19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这种当代的农奴制，农民积极性大增带来农产品产量大增，高达3亿之多的农民得以脱离农业，进城打工。第二项，在1990年代，除了保留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外，私有化了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解放了城市地区巨量的生产要素。

沉睡的巨量生产要素正好遇到中国成为WTO成员，世界向中国单边开放的机遇，在世界要素市场的价格指引下，和涌入的国际资本结合，得以参加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去，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0-40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对世界，尤其对中国，都是好事。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更接近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是他们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虽然出于好意，却引发了杨小凯指出过的后发劣势的恶性发作。果真，进入WTO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全局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没有一鼓作气发育出要素市场。中共反而大力推动国进民退，加固本来有所松动的党国体制。最近十年来，中共更明确喊出，一切都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意味着要由党，而不是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

这使发达的民主国家感觉上当，因为单边开放已经给它们本国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例如退出某些产业，就业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不满。如果允许通过“党治”决定要素价格，以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这种经济体制必定进一步扭曲整个世界的市场价格，造成有利于中国党国体制的经济格局。中国更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利用尚未充分开放的庞大市场，使国有企业单边收割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加上国库的津贴，让它们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巨头，使得不到国库津贴的各国私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以便中国通过弯道超车，一举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桂冠。这些做法违反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原则，违反经济全球化的高远目标。所以，欧美日发达国家在中国15年宽限期满的2016年起，陆续发表官方声明，否认中国的党国体制享有

市场经济地位，以防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世界秩序受到颠覆。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认正在加紧扩军备战的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单边援助和各种优惠是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并不是让某些发展中国家一边自称贫困，一边大肆扩军备战，巩固独裁政权的。

发达国家正在说服本国利益集团，从大门洞开状态逐渐关到和中国的开放度大体对等的程度，所以困难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因为社会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愿景十分对立，超级全球化已不可能。面对独裁和伪共产主义的愿景，欧、美、日出于安全，尽量杜绝为对手提供助攻机会。所谓小院高墙政策，旨在将明确定义的高科技领域和中共彻底脱钩，以免危害自身长远安全。在其他领域，发达国家则采取去风险的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以安全为理由，发达国家甚至推出自己的产业政策。于是全球化大步倒退。

张：您在“被党国体制绑架的中国经济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下称“绑架”）一文中指出，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中共曾在18届3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呼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并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要素市场对市场经济这么重要？所谓“中国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文：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特征是：由党，而不是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便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使资源向军工倾斜，达到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这个模式在其他层面上的特征，就留给专门领域的专家去总结吧。

要理解要素市场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资源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残酷事实。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最基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中国特别贫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外部世界的巨量资源。但从拥有丰富资源的前苏联没有逃过崩溃看出，比资源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正是“中国模式”的致命伤。

世上只有两种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途径：第一，通过行政命令。

最典型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先将一切资源和企业国有化，接着通过预测供需信息，制定全国性的供需计划，用行政指令付诸执行。他自称这套方法能使经济发展做到有计划，按比例，避免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试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过剩和短缺，贫困和浪费长期共存，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资源配置却向军工倾斜，保护党国的寄生虫们过着特权生活。所以，这套体制无论在效率上，还是道义上全都彻底破产。

第二种配置资源的办法，是让市场对资源，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作决定性的配置。用市场配置，就是用价格配置。没有价格，就没有市场。理由如下：对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价格只有四种：1) 资本的价格，即利息；2) 土地的价格，即地租；3) 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以及4) 本币兑换各种外币的价格，即各种汇率。这四种价格中，前三种决定了一切产品的国内价格，这是因为一切产品的成本可以分解为这三种要素的价格。第4种价格则帮助人们得到相应的国际价格。这四种价格是一切价格之母。如果价格之母由政府说了算，这样的经济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如此基本的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交易，即由供需双方数以亿万计的消费者和

供应者共同决定，使价格的决定机制具有天然的人民参与性，而不是几个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在密室之中擅自决定。

要发育要素市场，首先要允许生产要素私有。所有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允许自由进退，对全国统一开放。在法律面前，所有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所谓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实际上就是用均衡价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只能通过供需双方的交易才能产生，而且永远在波动之中，以便随时吸收和消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

值得强调的，在成交时，价格同时完成三重功能。以要素市场为例，在成交的一刻，成交价：1) 对某种要素做了决定性的配置；2) 完成了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初次，也是决定性的收入分配。要素所有者成交时面对的要素价格，就是他每出售一单位要素的收入；3) 自动惩罚了要素的低效使用者，因为他们的每单位成本高于市场承认的价格；也自动奖励高效的企业，因为他们的成本低于成交价。通过兼并，生产要素会不断地从低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由于创造发明能自动得到市场奖励，所以，市场经济大大促进科技进步。特别重要的是，价格的三大功能都是市场的客观过程，和人际关系中的恩怨情仇无关，因而减少了裙带和权贵的影响。在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因为积累和保住财富的诀窍取决于效率和勤勉，而不是特权和世袭。

要素市场的发育需要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对产权的最大威胁来自拥有合法

暴力的国家政权。所以，所有发达国家一定实行宪政民主，将统治者权力关在由宪法和法律构成的笼子之内，以牢固保障人民的产权，使市场能自主运转，政治对经济的干扰最小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存在不幸的人们，他们陷入贫困并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以减少市场失灵和天灾人祸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帮助不幸的人们克服短期困难，而不是鼓励不劳而获。所以，政府只应扮演辅助的角色，不应通过国有化强制进行。

中国虽然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实只发展出产品市场。由于不允许要素市场的发育，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内生的真实要素价格，所有产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无从知道整个经济是否有效。当局依靠对媒体和信息的垄断，隐瞒真实的统计数据，强制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并将资源向防止“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方向倾斜，以便维持一党统治。在要素市场始终发育不出来的地方，这条用谎言和暴力压制真理和真相的逻辑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张：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通吗？为什么要素市场有促使城乡收入差趋向弥合的功能？

文：中共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中共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种定义是自说自话。如果人民有选择自由，也许中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1949年后，中国一直处在中共领导之下，一直自称走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却人祸不断，一再被迫

推迟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可见，党的领导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常常是祸害。1949年后的所谓前30年就是明证。文革结束时中国民众呈现的贫困和愚昧，就是明证，令第三世界国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说发达国家。

无论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不能回避两大问题。首先，不能使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固了，农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乡收入差反而扩大了；其次，不能人为拉低城市地区的收入，使城市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为此，我在“绑架”一文中提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在于收入的两个弥合，即“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如此归纳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溃的苏联为教训，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在高楼大厦，或兵舰航母，却让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何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中，如果中国做不到，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就在倒退。

东亚（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以及拉美（智利）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了两个弥合。今日的发达国家当年也是农业社会，也经历了城乡收入差的收敛过程。在市场条件下，城乡收入差会趋于收敛的观点，首先由诺奖得主刘易斯提出。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基于城市工资上升，便认为中国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这既误读了刘易斯原意，也误读了中国的国情和制度，成了经



济学的笑话。

刘易斯模型的预言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根本没有抵达刘易斯拐点。从1978年包产到户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吗？中国农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变成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了吗？农场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构成中国农业的骨干，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不是刘易斯错了，而是中国没有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农村剩余劳力首先被城市吸收殆尽的转折点；刘易斯的第二拐点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产力更高的其余农村劳力，直到剩下的农村劳力的生产力和城市拉平的转折点。顺着先第一，后第二两个拐点的吸收顺序，城乡劳动市场就能统一，城乡二元结构就能消失，城乡收入差就能弥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吸收顺序称为弥合性顺序。

但是，只要没有要素市场，城市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时，就不会服从这种弥合性顺序。弥合性顺序来自两种效应：1) 一轮又一轮的挤出效应，使务农效率低的农户逐渐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兼并。前者拿了卖地所得，流出农村；2) 一轮又一轮的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使务农经验较丰富，生产力较高，收入较高，有较强务农意愿的人首先离开农村。理由如下。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力未被吸收殆尽，城市工资只需比农村工资略高，就能吸引农村非熟练劳动进城。这种城市工资对生产力高的农民毫无吸引力。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在农业中的贡献较低，甚至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应，生产力会显著提高，因而收入高于农村，会选择首先离开。所以，存在要素市场的地方，

城市吸收农村劳力一定服从弥合性顺序。

可是，1990年代后，农村改革停顿，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农民受到土地规模的约束，无法忍受乡村的贫困，首先离开无法致富的农村。一轮一轮的能干农民被迫离开村镇，等于城市不断抽走农村优秀人口，农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城乡收入差也就不断扩大。可见，由于拒绝发育要素市场，中国农业发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现代农业的人口，浪费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现在，平原地区出现私人经营的农机队。有人以为，小农购买了这类服务，就算是农业现代化了。这是不懂科斯说的市场购买服务和企业自主生产之间的本质不同。各国农场都能通过调整土地的经营规模，以使自主拥有的农机规模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中国小农却无权这样做。今夏华北麦熟时，正好预报有雨，由于大批农机队被堵在路上，结果无数小农颗粒无收，欲哭无泪。此例说明，为何各国农场要自备农机，才能战胜不测风云。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转，以为种地能手可租进土地，经营大农场。此法并不灵验。因为小农只要见到土地经营者发了点小财，就会立即涨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坏，使经营者不敢向土地和农机投资。

**张：**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但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城市化弊端在哪里？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文：**城市化的真谛，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其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会急

剧下降。从基尼系数的算法可知，要弥合城乡收入差，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也应等额下降。由于集聚效应这条经济规律，移出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应该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现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乡收入差弥合，又要实现城乡现代化，必须尽量提高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要素市场无法发育，无法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城市走上了将农民作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权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制度性地丧失了吸收广大农村人口的能力，违反城市化的真谛，使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真正现代化无法实现。

以上海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场，并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资本进出自由，使老浦西从原来的荒滩、农田发展成东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农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谛，因而成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后，上海实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消灭了要素市场，不但停止吸收农村人口，而且以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越来越多的市民赶往深山老林和贫困农村。1990年代后，政府要开发浦东，只能借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东模式应运而生。虽然高楼林立，但投资昂贵，土地浪费，人口密度远不及浦西。为了呈现千年盛世的荣景，政府不断铲除城中村，消灭农民工借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荣和文明成果的空间，以防他们定居，使浦东模式消化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远不及老浦西，违反城市化真谛。这种模式也许适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区进行城市自我现代化，却严重违反国情，违反人道，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中国有要素市场，浦东模式本来不会产生，更不会流毒全国，造成全国性的房市泡沫。

这种模式虽在硬件建设上有过短暂辉煌，颇具迷惑力，其实有长远的致命缺点。土地财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众储蓄，必然将土地和房价推到天价，使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的农民群体无力也无权购买。由于无人接手楼宇，房市泡沫随时可破。这种模式除了具有排斥农村人口的劣根性，违反城市化真谛外，财政上也无法持续。土地既然国有，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征收各种地税，使政府无法获得细水长流，可以永续的财政收入。随着基础设施日益老损，今后保养和维修城市所需的庞大费用会捉襟见肘。今日靓丽的城市外观能避免上海当年的心酸故事吗？1990年代初上海经过计划经济的几十年折腾，变得破旧不堪，世人不敢相信这曾是光彩照人的东方巴黎。

**张：**既然要素市场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发誓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用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又出尔反尔，不允许发育要素市场呢？

**文：**我的判断是，党内保守派不愿向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放绿灯，是出于对失去寻租特权和失去对民众控制的恐惧，便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加以阻扰。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来得太迟，又没有实行细则和时间表。这份决议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过，借助WTO带来的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随后高速增长带来的充沛就业机会，也许有一丝希望，使要素市场逐渐发育。

三大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直接冲击党国体制的。首先，资本市场。其发育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国内外信息必须自由流动，投资者必须得到透明的政、经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错误决策。人民币能自由兑换，资本能自

由进出。对私有产权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保障，使国内外股民对中国资本市场有长远信心。这些条件对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并担心私人企业坐大，构成对权力挑战的中共保守派来说，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前总理李克强一上台就推动这个项目，直到卸任，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连自由贸易区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资本市场又从何谈起？

其次，土地市场。其发育需要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现行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土地。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搞土地财政，断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财源。在“中国模式”下，农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于奉献，保守派不会同意向农民让渡土地财富，自断党国的财源。

其三，劳动市场。首先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特别要废除不准农民工在打工地落户，实现与配偶及子女团圆，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知识的代际传承。只有废除歧视性政策，才能发育出城乡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劳动市场。但是，目前的歧视政策不需负责农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别是住房成本，养老和医疗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党内保守派以为用这种低人权换来的中国制造品的成本优势，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机遇，弯道超车，夺取经济霸权。尽管农民工已经一条腿跨入城市，却不准他们落户，其子女丧失了接受城市文明熏陶，实现阶层提升的机会。他们被迫成为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带着一口乡音和低劣的乡村教育，重复父辈进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甚至连这种希望都会丧失。可是，对保守派来说，户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劳动成本外，还是控制民众的利器，必然反对早日废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场能顺利发育出来，并由它们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政府和

党拥有的随意干预经济，操弄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要交还给市场。经济发展就和党没有太大关系。党内的寻租者鱼肉人民，控制民众的权力会大大减少。人民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资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懒惰者受到了惩罚，勤勉和有创造性的人得到了奖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党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吃党的饭，不能砸党的锅的现代神话不攻自破。这自然是党内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扰。

张：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国已经出台了众多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市场反应冷淡，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其原因与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受挫有关吗？

文：我认为直接有关。清零政策暴露了这个政权为了维护一党独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顾民意、国际舆论、科学结论，甚至各国的最新经验。中共自称生命至上，指责拒不采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国家罔顾生命，甚至下赌，其他国家会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可是，中国民众发现，拒绝清零政策的国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复经济活力。它们的民众也没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躏。这就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原以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祸临头，却发觉这是中共用以恐吓，胁迫民众的天大谎言。这种对人权的无底线侵犯引起人们怒火中烧。年轻人更勇敢地以白纸运动的方式聚众抗议，迫使当局灰溜溜地放弃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转向如此突然，无数老人猝不及防，纷纷谢世，乃至无法火化，爆出人间悲剧。一个自诩的抗疫优等生，以为能引领世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举世鄙视的劣等生。为了遮丑，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种愚蠢，颠预和蛮不讲理，导致民众对党国体制的极大怀疑，对未来进一步丧失信心。

今年已经大半年过去，各项经济指标却一直十分难堪，表明经济十分疲软。我认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层原因。下面，用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何“中国模式”早已山穷水尽。中外经济学家十年前便有共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过，原因如下。经济增长只有三大终极源泉，分别为：1) 增加生产要素的粗放型生产，产量会增加，但增量会逐渐趋零；2) 科技进步，使要素质量提升，同样数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续带来产出的增量；3) 制度创新，例如，从人民公社体制转换成包产到户体制，即使没有激发立即的科技创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种要素的整体效率，使产量大增。

从这一理论框架看出，首先，各种要素的红利，例如人口的红利，土地财政的红利，民众高储蓄的红利（分别对应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经过几十年的滥用，几乎已被榨尽。粗放型的增长无以为继。其次，受党国体制的绑架，要素市场无法发育，经济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废。第三，由于要素市场难以发育，中国丧失科技的内生活力。本来，如果和发达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至少能从国外引进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国际社会的规劝，拒不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一心要维护党国体制。于是，中共与发达的民主国家日益对抗。如此一来，连高科技的源头也被切断。百年不遇的宽松国际环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于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都已穷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极为暗淡。

张：中国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左右逢源，发达国家看好中国，认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愿意和中国一起共襄盛举，将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也津津乐道，认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机遇。可是，最近十

年来，国际气氛已迥然不同。现在众多西方智库看衰中国经济，拜登总统甚至将中国比喻为一颗定时炸弹。中国也出现了民营企业一蹶不振、外资撤离、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企、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重情况，甚至出现了民众逃离中国的“走线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

文：我觉得，您提到的上述种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要素市场没有发育的结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绝了让要素市场发育的空间。他们的顽固反对，不但使党自己通过的关于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决议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使经济改革变成一个不断加强党国体制的过程，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离心，精英逃逸，外资撤离。中共加固党国体制的目标是与WTO的宗旨背道而驰的。WTO从一开始就昭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组织。对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党国体制改革为真正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标志就是要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也因为知道WTO的市场性质，中共才会在WTO给予中国的15年宽限期即将期满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届3中全会的决定，呼吁全党尽快发育要素市场，并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给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机会，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和社会，希望中国投桃报李，能发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场，对世界全面开放。可是，党内保守派为了捍卫党国体制，其实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主动选择杜绝要素市场发育。发达国家由于深深担心以中国的体量，党国体制会严重扭曲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现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党国体制。

中共的反应，不是向各国致以改革过于迟钝的歉意，加速改革，尽快发育



出要素市场，反而将清谈误国，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告诫置之脑后，以战狼的姿态，喋喋不休地用历史旧账攻击发达的民主国家，从奴隶制到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不一而足，向世界倾诉历史上发达国家当年的黑暗，丑陋，残暴。在中共的宏大叙事中，有意不提历史的另一面，即正是发达国家将先进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的巨量的知识、科技、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人文成果向全球胜利传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政权反而是落后、腐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皇朝，因对周边封建、保守、愚昧政权的鼎力支持，成了亚洲反动势力的总堡垒。在当代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下，今后再要推广先进生产力和人文成果，固然应注意人道、平等和自愿等原则，这是历史对今人的教训。但是，不能因此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当年发达国家向世界传布先进生产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伟大贡献都一概否定。事实上，今日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在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中的贡献，同它们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相比，显然是更主要的。联合国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终结。发达国家已经认识了当年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当代的条件下，试图将发达的民主国家描写为仍然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想要阻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崛起，这种判断符合战后，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吗？在今天的条件下，要避免再犯当年的错误，难道不应首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径？但是，今年三月，当世界听到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习近平与入侵乌克兰的刽子手普金告别时所说的，“希望中俄联手，迎接百年未遇的变局”时，再糊涂的发达国家也会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中共为了坚持党国体

制，不惜要联手俄国，颠覆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国的现行国际秩序？难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唤起它们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图实现百年未遇的变局，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对如此忘恩负义的中共，民主的发达国家会再度主动帮助中国吗？

您问我，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只要不允许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就必然被无限延迟。可是，党国体制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要使要素市场顺利发育起来，党国体制必须作深层改革。即使中共走投无路，将来声称要重启要素市场的发育，发达国家不会对中共意图轻易信任，立即大开绿灯，因为中共的党国体制可以随时翻脸。所以，除非中国采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已经无法赢回发达国家的信任和精诚合作。所以，所谓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一外部环境已因中共过河拆桥，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机遇和党国体制之间，世界只能让中共选择一样。既然中共选择了党国体制，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已时过境迁。重启现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结束党国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之后了。党国体制的选择未经人民公投，只是出于一党的私利，被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了。中共不会承认这样做是出于一党之私，必然将责任推到坚持市场原则的民主发达国家身上，似乎它们突然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人民手中抢走了。这是为何中共目前在国内外大力煽动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在现行的党国体制下，中国会呈现前苏联那样的伪现代化，举全国之力堆出一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楼大厦、高铁、大型工厂、兵舰和导弹，但民生会相对萎缩，城乡收入差会继续扩大，广大农民难以进城成为市民，留下的农民也无法成长为现代农场主。由于标志现代化实现的两个

弥合遥遥无期，中国将无法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无从显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优越。只要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也就无法享受持久的繁荣。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发育要素市场是为中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决不是对发达国家的恩赐。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做出勇敢的选择。这个任务是写入中共自己的决议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发育要素市场，不但符合亿万民众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强大的激励，而且将为宪政民主铺平道路。



稻田 作者：郑玉禧

访谈

艾华 / 曾金燕

中国民主季刊

第 1 卷 第 4 期

2023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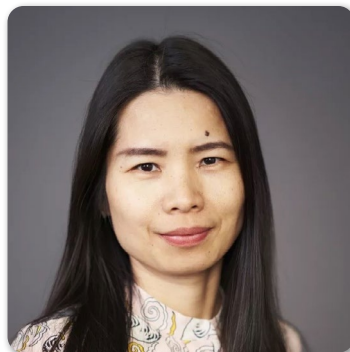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抗议的伦理： 从非暴力运动、 非文明抗争到 #MeToo 运动



艾华



曾金燕

**编按：**在民主协商的可能性非常低乃至不存在的情况下，选择非暴力抗争还是使用暴力进行非文明抗争？谁能决定抗议者采取何种形式抗争？如何理解非暴力抗议中暴力因素的上升趋势？如何理解米兔（#MeToo）运动对华语维权社群的冲击？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曾金燕，对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法学教授艾华（Eva Pils）做了以下访谈，以期开启华语世界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曾金燕（以下简称曾）：**艾华老师你好。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维权议题的法学家，你对中国的维权社群和异议社群十分熟悉。你也长期研究法律和政治反抗的关系。我想请教你关于社会抗议和政治反对的伦理问题。触发我思考社会运动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刘晓波“我没有敌人”宣言所引发的讨论；二是基于香港社会运动的观察；三是华语圈米兔（#MeToo）引发的关于社会运动社群内部文化、结构和伦理的争论。

首先是关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言。2009年刘晓波在法庭上作

出“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许多争论。2017年刘晓波去世时，相关的争论又再次出现。从1989年六四绝食宣言开始，刘晓波明确表示在社会运动中要放弃仇恨和“敌人”意识形态。他在2009年的法庭陈述里，以一个长期遭受政治迫害（被反复监禁、控制自由）的身份说明在社会运动中“我没有敌人”、摒弃仇恨和敌人意识的政治伦理，以及以他对妻子刘霞的“爱”的表达来宣扬爱和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同时，许多人戏称刘晓波为“刘无敌”，认为应该容许各种方式来反抗政治压迫，并不排除采取各种程度的暴力手段；应该追责实施政治迫害的个人，而非向施害方“让步”、“妥协”；在专制政治下与专制“和解”是反抗无力的表现，等等。当然，暴力这个概念本身在当下社会已经有更加广泛的含义，不仅限于物理形态可见的暴力，还包括话语的、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暴力形式。

后来在香港的大型社会运动中，雨伞运动期间和平的抗议者（学生领袖）有机会与香港特首会面，双方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会面实质是双方主要面对自己社群的公开言说表演，本身没有推进社会运动转变为政治协商的可能。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抗议者和警方对暴力的使用不断升级，公众一方面谴责警察暴力，另一方面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的容忍度逐渐提高。

艾华（以下简称艾）：谈到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观点，我也发现一些人权捍卫者对他的观点确实是有批评的，我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权律师》一书中简单阐述了一下人权捍卫者对暴力反抗的不同看法。当时，律师们虽然对暴力反抗是否道德这个问题有不同观点，但是他们都不主张在中国试图用暴力反抗。怎么去反抗一个使用暴力的政权，这不仅是中国

处境下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层来谈：第一层问题是什么样的抗议是能成功的。第二层问题是不管抗议成功不成功，而是它是否道德。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但我们先处理这两个层面。

关于是否使用了暴力反抗就更有可能成功的问题，有一些学者比如说政治学家艾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主张非暴力反抗更有可能成功。她通过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主张只要得到3.5%的公众支持，非暴力的政治运动就可以成功。而使用暴力的话，公众的支持会减少。但是切诺维斯的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有局限，我们只要碰到一个例外的情况，就得重新去调查。也许香港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一个例外。再说，切诺维斯的这种实证研究对反抗模式的道德性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判断。

从一个反抗暴政的人权捍卫者的角度看，就要考虑合法性和道德问题，要讨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这和什么样的反抗是否能成功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作为一名人权学者，我在这一点还是倾向于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就像刘晓波所提出的一样。暴力反抗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使用暴力，就会复制暴力，就有风险变成一个和使用暴力的政府差不多的团体。这是很有问题的。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谁来决定抗议者要不要使用暴力？比如说在中国农村，政府采取暴力的方式征地或强拆，实施日常压迫。政府官员使用的很多暴力强拆方式是非法的，甚至构成犯罪的。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在某些情况下，某一些公民采取暴力反抗政府官员刑罪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当然，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解释。

同时，我们要考虑受害者的角度，尊重受害者的选择。或者说，可能在这些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可接受的伦理选择的光谱。比如，要分清这个暴力是针对人的暴力还是只是破坏物体的暴力，例如扔石头打碎玻璃的暴力。如果有一系列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选择的话，那在具体实践中还要尊重参与者的选择。

曾：特别感谢你向我推荐了切诺维斯的著作，它对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设计非常有帮助。现实非常丰富复杂，我想理解公众怎么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何种程度的暴力是可以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何种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我想理解不同的人的看法。

艾：你是社会学学者，社会学跟法律和道德哲学的角度不一样，它们带来的启发也不一样。上次我们也提到坎蒂丝·德尔玛斯（Candice Delmas）在2018年出版的对非文明抗争（uncivil disobedience）的研究。她用批判性的方式和立场去分析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所主张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概念。德尔玛斯并不否认文明抗争/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但是她认为所谓的非文明抗争（包括隐蔽的、逃避的、暴力或攻击性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正当的。盖伊·艾奇逊（Guy Aitchison）则指出：在它最为激进的形式里，民主构想包含了广泛的活动……包括与当局的军事对抗中采取强制行动和暴力。说到公民不服从我们马上想到马丁·路德·金、晚期的纳尔逊·曼德拉、甘地等反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领袖。这些人的反抗对象是民主或半民主国家的政权和开放社会，但如果在一个没有宪政基础、没有可以参与选举、可以表达民意的环境，公民不服从可能是无效的。德尔玛斯认为，声称人们在面对暴政的时候只能非暴力反抗，本身就可能不合理或不道德。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也默认了这条道理：鉴于为使



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曾：切诺维斯在2020年发表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完全不采用暴力形式的非暴力抗争总体数量下降，在大型的非暴力抗议中，使用不同程度暴力的元素在上升。换句话说，非暴力运动容忍了采取暴力的非主流。从1970年代到2010年，包含了暴力分支的非暴力运动占比约30%-35%。2010年到2019年期间，该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切诺维斯的分析认为，这是近10多年来非暴力运动成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使用暴力的比例上升，这本身也要求思考更为复杂的现状。

艾：是的，非常复杂。回到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个议题，“我没有敌人”是否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暴力去抗争？还是意味着对迫害主体的某种理解？

曾：我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一种有原则的非暴力实践（principled non-violence），是生存美学即伦理层面的表达，要抛弃仇恨和敌人意识，它和实用主义非暴力（pragmatic non-violence）还不同。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的想法，除了考虑他文学专业背景和理论分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还因为我当年被软禁时的亲身体会，以及长期以来对以何种方式反抗、抗议的摸索、研究。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我自己如何与看守们相处。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愤怒，不要把看守们看成恶魔、非人化，不要因为他们对我的虐待我就容许自己仇恨他们，来合理化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反击他们的冲动，以及如何不放弃协商的努力。简单地说，我要保持自己成为正常人的能力，

并推动其他人也成为正常人，退回到协商避免暴力冲突、对立的处境——尽管很多时候这不可能马上实现，但我相信长远来看这是根本出路，这已经是当时处境下我最大的抗争了。

艾：在我看来，使用暴力虽然不一定等于把行暴的对象当作敌人，但是暴力很容易导致“有敌人”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感到仇恨，伤害我们自己。就像刘晓波所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曾：这和社会运动也是关联的。在社会运动里，愤怒作为抗议动机和社会动员的燃料很常见。但如果持续地把愤怒、乃至仇恨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燃料，它就会带来许多问题。研究愤怒的文献也不少，比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承认了愤怒的合法性，它是在人们遭遇不公后的表达：这是错误的，不应该再发生。她提出转换性愤怒的概念，从过去的不公转向未来以寻求补救。她也指出愤怒具有渴望报复的危险，渴望对方体验同等痛苦的冲动。她认为痛苦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不会修复最初的伤害，社会运动中应该避免这种愤怒，或者说提升和净化这种愤怒。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

艾：英文里我们可以说，选择非暴力抗争等于tak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站在道德高地的一种方式）。最主要的是，仇恨会伤害自己，这个自己并不仅仅是个人，也是整个运动。如果一个运动靠仇恨去运作，那在道德上它已经失败了。我们也看到社会上现在有越来越多激愤，包括各种民粹主义的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制造仇恨，然后利用仇恨来对付政治对手。

曾：这是政治反对的伦理问题。

艾：是的。从刘晓波的角度，他主张合理的政治竞争是可以的，并且有可能。

曾：没有可能的时候也要去创造可能。需要一种像刘晓波“我没有敌人”那样面对对手时不确定的信任（姿态）和“我有爱”那样一种彻底的爱。在政治上才有往前走的可能。这也是我在西方生活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理解到什么是一种“彻底的爱”，邻人之爱、陌生人的友善。也许这才是我们在专制政治处境下长期生活的人需要学习的民主的细节。

艾：这是民主的基本观念。如果民主是一种有可行性的体制，那么必须要有这种合理竞争的可能。对合理竞争的各种挑战不仅在中国是问题，在民主社会也有这个问题。

曾：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和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抗议者都获得与政府高层对话的机会，但最后都未能转变成政治对话和政治交换。一方面抗议者有理想主义情怀，它和政治反对的伦理有冲突的地方——后者包括以暂时的或适度的退让来实现政治对话，与不同团体的进行利益交换来推进漫长的协商进程；另一方面，抗议者面对的是专制程度相当高的政权，也许在对方眼中看来，抗议者并不具备博弈的资本。

艾：你提到的香港学生谈判的问题又不一样。第一点，它是成功的政治对话与交换的可能性问题。这是有条件的，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情况。在一些情况下，这是不能达成的目的。成功的、合理的、和谐的政治对话在某些

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不了解香港的所有细节情况，我的理解来说，香港政府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和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跟真正的、有权威的、能决定的机构对话，那对话就是表演性的。第二点，在这种政治运动的情况下，表演者以及任何一个声明，针对的观众是多样的。可能是针对政府官员，也有公众、跨国公民社会，有各种不同的观众和受影响的群体，没有跟香港政府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对话根本没有成功。从长远来看，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体现出来了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它改变了香港社会对自我的理解和外界对香港和中共的理解，这是很重要的成就。

曾：香港问题也成为更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最近你也看到了华语圈有许多米兔的案子，作为一位法律学者，在法律层面和伦理层面，你如何去理解这么多米兔案件的发生？米兔和非文明抗争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伦理吗？

第二个层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活跃分子对米兔案件的反应，反映了维权社群里男性优先、男性气质主导的父权结构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比如，维权人士施明磊——狱中劳工运动活跃分子程渊的妻子，在2023年6月21日自述受到当地知名维权律师邓林华的性骚扰，并且是以程渊被判刑的近况作为胁迫施明磊的关键因素。事件发生时，施明磊与其他律师讲述被性骚扰后，其他人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该律师，而且依旧与其“觥筹交错”，社群里甚至质疑施明磊。施明磊为此深受创伤，看心理医生，两年后公开述说时，她写道：“我感到受双重暴力深深辖制，曝光他，我不但受国安的打压，还要受社群的质疑。”这种质疑，我认为是维权社群长期以来性化女性参与者、看低乃至无视女性参与者的声音和主体的表现，它还是维权社

群基于“兄弟情谊”相互维护而不惜牺牲女性的一种社交文化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维权社群中一些人对米兔事件的反应，与对女权运动引发的议程——如：摒弃男性（气质）优先和男性传承的父权结构，尤其不对弱势群体、不同意见者进行排斥，承认女性、性、民族等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倡导不以牺牲个体、其他团体为代价的团结，落实对所有人的平等——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我在《中国民主季刊》第二期的《女权主义与民主运动的民主化》一文有详述）。有些人认为女权议程会挑战整个活跃分子社群的权力结构、社群文化、以及社群主流想要选择的做社会运动的方式。有哪些思想和行动的资源，可以在活跃分子社群里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和讨论？

艾：对不起，我对这个具体的案件不熟悉。不过我有一些个人的经验和总体的观察可以分享。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在各种等级制度和权力失衡的机构中工作，我个人经历过性骚扰（Me Too!），也遇到了许多涉及其他女性的案例。基于这些经验，我认为首先倾听女性的声音是很重要的。长期以来，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幸存者普遍被忽视和被压制，#MeToo运动对于改变社会上的理解和意识非常重要。我也完全同意，父权文化是难以撼动的，它不会止步于捍卫人权和民主意识的民间组织、大学或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性骚扰无论在哪里发生我们都要揭露和反对它。但我也认为，在讨论的时候，要考虑每一个人的人权。当指控出现，每一个人都当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过严重犯罪的指控只能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来对待，在这个程序中，证据很重要，而且双方都一定要得到适当的听取，刑事司法过程中要保护被告人得到公

平审判的人权。

女权和其他的人权议题是分不开的，而且人权本身是不可分割的（indivisible）。但是从人权捍卫者的某些保守派观点来说，所谓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liberty rights）或所谓的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具有优先性。应该首先解决政治和公民权利的问题，然后可以考虑社会经济平等和其他“没有这么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保守学者认为，以平等的名义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必定是对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一种侵犯，保护弱势群体重新分配就等于极权政治，公共机构主张平等权并反对性别、种族等歧视等于侵害言论自由的（自我）审查。最近几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在民主国家的兴起，不仅有主张比较狭义的人权的党派，也有主张民意至上、干脆反对司法对人权的保障的党派。比如在美国有人主张的不可转移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实际上是排斥各种人权（或者说human rights backlash/人权反弹）的借口。各种针对捍卫女权、反歧视民间机构的攻击越来越激烈（比如在波兰、美国等国家），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公民社会的攻击。还有些人以国家主权的名义反对和攻击国际人权条约和人权司法审判（例如英国一些保守派政客要求英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它们在我看来也是与人权的最基本理念格格不入的。

平等的问题——女性的平等、LGBTQ+社群的平等、土著/民族的平等，基于性别、民族/种族的暴力，毫无疑问非常重要。现有的争论，没有考虑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概念的关系。没有平等也不会有跟自由关系更密切的权利，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实现平等。

曾：它们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艾：是的。性别平等、反歧视、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等等工作需要长期且大量的投入，它涉及到改变人们的观念——这非常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应该对这些性别争议感到太过吃惊。男人和女人，她/他们所成长的社会在很多方面上都是非常传统的、父权的。在理论上可能是，人对自己成长的环境进行“复制”。哪怕他/她们是人权捍卫者——这不是借口也不是辩护——但这是一种解释，也许有的时候它让我们更加包容一点。这不仅说是在实践层面，事实上一些人确实有比较保守的观念。有道理吗？

曾：是的，这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我们还有高校教育者的身份。我在想，目的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而是如何沟通，如何实现对每个人的公正——这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达到共识、更新常识、实现改变？这也有许多困难。我完全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改变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你作为法律学者尤其体会到立法、司法以及体制改变之漫长。但对当事人来说，人生苦短。人们需要解决个人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当然，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是特定社会处境下的呈现。我的考虑还包括各方——无论是学生、记者、教师、公众、活跃人士，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如何共同参与、共同建构一个结构、一种文化、一种氛围，来共同尊重女性权利、女性主体，以及各个少数和边缘群体的权益。

艾：今天涉及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参与讨论的各方来说都是。我期待未来看到更多的讨论。

曾：我也是。谢谢你。

笔谈

王飞凌  
陈健民  
胡平  
宋永毅  
坚真光  
李西潭  
雷乐天  
弥正平  
王涵  
邓聿文

中国民主季刊

第 1 卷 第 4 期  
2023 年 10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中国民主化 会乱吗



**编按：**长期以来，一提到中国民主化，几乎总是有人问：“国家会乱吗？”，同时，官方也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官方媒体不时渲染其它转型或民主国家的“乱象”。

担心民主化会导致大的动荡、混乱，这是一种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的普遍情绪。尽管从来没有人清晰界定，但听起来似乎那种动荡混乱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这种普遍担心的“大乱”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崩溃，没有法律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分裂、内战，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还是其他？

如何看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这种普遍担忧？它主要是出自人们天生的保守倾向，即对未知之境的惶恐、不安，还是官方宣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这种想象的恐惧有多大的合理性？中国民主转型究竟存在哪些风险？应以什么心态对待可能的震荡与风险？哪些风险是可以未雨绸缪、尽量避免的？如何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如何看待民主、专制与稳定的关系？目前中国语境中、特别是官方话语中的“稳定”存在哪些问题？中国目前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如果您既有在中国、也有在自由社会生活的经历与观察，您如何看待自由社会与专制下的稳定？游行示威在中国是不允许的，上街抗议会被官方定性为“动乱”，其中体现的是什么稳定观？民主社会中对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多党竞争的接受与保护，体现的是什么稳定观？

就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专家学者与海外中国留学生进行笔谈。简短的评论当然不足以回答这么多而且重要的问题，我们欢迎专家学者赐稿做更深入、细致、全面的讨论。



王飞凌（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这是一个极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话题。担忧社会动乱无序，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之所以要建立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第一原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征税与警察齐备，还是经常性地被所谓“大乱”所困扰，那就是该国政府无能、无道，缺乏执政合法性，连最基本的工作也没做好。在今年出版的《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里，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治理。一个根本性的次优化问题就是：举国体制专政了七十多年，予取予夺、天价耗费、扰民不止，还是在不断地警告“动乱”，动辄祭起“亡党亡国”的唬人幡。当然，对于维护一党乃至一人的专政与特权来说，北京至今做的倒是相当的“优化”。而中国人民为此则是牺牲无数，忍受各种劣质治理，为那些无休止的“伟大斗争”而不停地吃苦受累；人们于是常常是怨恨不已，戾气深重。

如同其他许多威权乃至极权国家一样，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制造和夸大各种敌人（从阶级敌人、外国间谍到所谓动乱），从而煽动利用各种真真假假的仇恨与恐惧，以役民渔利。挑战一党专政被臆造灌输为等同于动乱无序；要么是一人一党永远专政，要么就是地狱般的无政府大混乱。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没有逻辑，还彰显了掌权者的自私与邪恶。他们其实是在威胁和勒索人民：要么唯我独尊，无限特权，要么天下大乱，同归于尽；如果挑战和削弱独裁权力，人们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公共治安。时间长了，这种漏洞百出的欺人把戏还是形成了许多人脑子里的自欺迷思。

历史与理论都已经充分表明，民主政治并非十全十美，但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动乱。在民主化进程中，由于人事变更和政治竞争秀，有

许多需要人们适应的新人新事，会令人一时晕眩；也会有人趁机渔利作恶；甚至会有一些停滞倒退，影响到日常生活。这些应该看作是一个伟大民族寻求更好政治制度的不可避免、完全可以容忍、更是可以尽量减少的代价。与非民主政治下长期的根本性次优化、各种运动与折腾，以及经常的悲剧性灾难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把21世纪民主化政治转型过程中会有的一时变动与可能的一时不确定，等同于中华世界里过去王朝更替时常见的天下大乱与大血洗，是幼稚可笑的无知想法，更是掌权者阴险的愚民把戏和赌博诡计。其实，到时候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既得利益，养尊处优好几代、密切连接乃至依赖外部世界也已经几十年的中国统治群体不敢、不愿也不能制造大混乱，而为一党一人的独裁专制去自杀殉葬。韩国、台湾、智利和苏联集团诸国的基本和平的政治转型就是明证。法国大革命和德国、日本那样的非要血与火才实现的政治转型，应该早已成为不会同样再现的旧历史了。

统治者的明智与勇气将会决定性地减少民主转型的代价。言论自由、示威抗议、民众结社、司法独立、多党竞争，都是已被证明了的有益铺垫与有效步骤，会动态地维护政治稳定、推进良政与善治。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应该是最终会结束一党专政，但不一定非要“亡”共产党，很可能不会“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会“亡”中国。除了一些权欲熏心而又愚蠢蛮横的掌权者外，绝大多数人，包括统治精英里的绝大部分，都会过得更好、更安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领土变更和政权重组，也许会令一些沙文主义糊涂虫们痛心疾首；但由此对各民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持久优化，其实会远远大于可能的暂时性不利与不适。



陈健民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中国人怕乱, 政府更怕。怕贫富悬殊和贪污会引发动乱, 提倡“稳定压倒一切”以保证生存和发展。为了稳定, 不惜取消言论、集会等自由, 不惜以武力镇压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但

中国过去百年的动乱, 是因为有太多或太少的民主? 文革、大跃进、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北伐等造成的生灵涂炭与民主何干? 再追溯历史, 每二、三百年便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 皆因土地过度集中、贫者无立足之地, 专制皇权从来无力阻止这种恶性循环。

不去直面专制造成的动乱, 却对民主变革心存恐惧, 是因为当权者怕失去权力; 但何以民众同样恐慌? 是担心民主政府太过注重个人自由, 造成争论不休, 政府施政受阻, 甚至警察无从执法、个人生命财产蒙受威胁? 抑或担心失去一个独裁的中央, 尾大不掉、诸侯割据、甚至引发内战, 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独立, 中国从此分崩离析?

怎样才算是乱? 这涉及价值及文化判断。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说, 即使众声喧哗、甚至因为公众参与而牺牲一些行政效率, 那一点“乱”换来的是对多元的尊重和社会共识。如果人们理解到一国的版图往往是战争的结果, 若尊重民族自决, 即使一些地区分裂出去也非天下大乱。何况采取合适的制度设计, 民主亦可以维护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严重种族冲突, 甚至最终分裂成不同国家。这是因为西方帝国到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时, 将不同的部落强制纳入其统治范围内。当这些国家在战后决定结束殖民统治而进行“非殖民地化”时, 往往硬搬宗主国那套民主制度。以英国为例,

其“西敏寺模式”民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单一制、分区单议席单票制选举、两党制、单一政党执政等做法，只适合种族、语言、宗教组成较为单一的社会，而许多殖民地的状况并非如此。

试想一个族群在一新兴国家中只占少数，与其他较大的族群长期处于紧张关系。如果采用英国的民主模式，该族群会成为持久的少数，与其被其他族群以民主之名欺压，倒不如走上分离主义之路。但阿伦特·里杰哈特（Arendt Lijphart）以瑞士、比利时等国家为例，提出以权力分享为原则的“共识型民主”，实行联邦制、联合政府、比例代表制选举等，令少数民族裔的文化、宗教、语言受到保护而最终留在同一主权国家。中国如果成为民主国家而且希望不以暴力维系各个民族，必须采纳部分共识型民主的制度，譬如联邦制和全面下放言语及宗教政策权力至各族群。

至于如何避免民主化带来政局的不稳和管治能力的大幅下降，非一篇短文可以处理。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有专书讨论民主巩固的问题，他们指出，市场经济、法治、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政党及选举制度）和有效的行政系统，均为巩固及深化民主的社会及制度条件。如果在民主化之前经历一段自由化过程，让上述某些条件得以发展，新生民主的表现会更佳、更能以绩效增加其认受性。如果在这些条件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出现一场革命，民主巩固的难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民主崩溃，回到治与乱的循环。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讲到，在预言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三个

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共产主义体制垮得那么快。第二个没想到，是转型导致的经济下滑那么剧烈。第三个没想到，是在转型时衰退那么严重且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没出现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乱。

补充一句，蒙古的民主转型也没有乱。其实，苏联的民主化也没有乱。苏联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甚至苏联的解体都是和平的。俄国后来出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先前民主化这一阶段中没有乱。

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不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中国民主化并不必然会乱，也不必然不会乱。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用什么态度、什么方式去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准备的好应对的好，就可以不乱，如果我们准备的不好应对的不好，就很可能乱。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实现民主化做好准备。

按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说法，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民主）。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包括：一、保护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压迫；二、人民掌权，指的是建立人民的统治。从程序上说，获得自由和保护人民乃是民主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的两个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实现自由，首先

是言论自由。

应该看到，对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还要更简单些。因为就连中国现行的宪法也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在中国，这种选举之所以沦为假选举，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发表不同政见。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言论自由，中国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就被激活了，假选举就成了真选举。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赢得了言论自由也就是赢得了民主。

当然，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有关民主的条款还有别的很多问题。按照这部宪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省市级和国家级的人民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只是这些改革可以逐步推行，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包括修宪制宪，都免不了会有个过程。从优先顺序而言，我们应当把言论自由置于首位，并且把它夯实。这样，即便在下一步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倒退，我们起码还能站在言论自由这块坚实的基石之上，而不至于一退就退回到暴政。

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族群问题，是分离主义或曰统独问题。正如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族群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最常见且可能最具破坏性的割裂之一。族群身份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割裂因素，是一种聚合型的割裂，并且极有可能造成感情用事、政治认同激化、甚至暴力。族群冲突很容易导致零和的结局。回顾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发现，那些出现了动乱的国家，十之八九是统独之争引起的，俄国的民主倒退和强人崛起也是借助于镇压分离主义而形成的。

可见这个问题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一书里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宋永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讨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内乱，我认为必须首先大致地界定什么是令人忧心忡忡的“动荡”和“内乱”。

民主化后的中国或许很快出现这样的“乱象”：一是雨后春笋般的新政党喷发，民众和媒体都会习惯于对执政者指手划脚，乃至游行示威都成了家常便饭。二是在选举中会出现整个社会的意见分裂，甚至“水火不容”，非得通过“数人头”的投票才能解决。三是选举后的议会里会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不断互相攻讦，甚至偶尔发生不雅观的“肢体冲突”，造成决策的效率缓慢。如果有人担心这些为不可接受的动荡和“内乱”，那就是杞人忧天了。一个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社会，而社会的意见分裂有时也确实只有通过投票得出的多数来决定。但是，“数人头”（民主选举）绝对要好于“砍人头”（诸如阶级斗争和政治迫害后达到的专制），因为它不会造成流血和最宝贵的生命的丧失，使最终的和平“妥协”成为可能。有人说专制政治的特点是“你死我活”，而民主政治则建立在“你活我也活”的基础上，这是很有道理的。简言之，一个允许不同观点和利益进行纷争的多元社会才是政治代价最小的、活跃的社会。

如果把“动荡”和“内乱”的内涵定位于饥荒人祸、兵凶战危，或许会比较准确一些。因为这些确实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极度灾难。但纵观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大都发端于专制极权的



国家。在二十世纪有记录的140场战争中（维基百科），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由专制国家制造的。尤其是自1917年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后，在“革命”的旗帜下，共产党至少在近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内战，在血泊中建立残暴的红色帝国。前者如中国这样的大国，杀掉了上千万人。后者如柬埔寨这样仅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竟也被红色高棉杀戮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论及人祸，大饥荒应当仁不让。在上世纪的数十次大饥荒中，共产专制的苏联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被排在首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口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从历史的纵横中观照民主和专制政权：哪一个更会导致动荡和内乱，应当是一目了然的。

**坚真光（笔名，中国大陆社会学副教授）：**民主化是从集权向分权转变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无疑会引起人们的适应问题。民主化会带来包括生理、认知、行为和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适应问题。人们能否接受和适应民主化带来的诸多变化，将影响个体、社会 and 制度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秩序和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和社会安

全产生负面影响；民主化要求民众具备与民主相适应的认知模式和水平；民主化需要民众积极、理性、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行为方式和能力；民主化必定会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和要求对民众的生理适应、认知适应、行为适应和结构适应提出严峻挑战。

如果人们在民主化过程中无法或难以理解、接受和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就可能出现激进民主化或逆民主化的行为反应，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民主倒退。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四个适应呢？

一是与民主化相伴随的生活质量改变；二是与民主化所要求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与国民实际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的差距；三是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结构变化的广度、深度与速度；四是内部精英和外部势力对民主化的干预方向与程度。最后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它对四个方面的适应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

针对影响民主化适应的几个因素，结合中国民主化所经历的成败得失，借鉴新兴民主国家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民主化大概率不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

首先，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即使近十年来逆改革开放的“骚”操作，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但一旦中国民主化，就会重启改革开放，发达经济体也会重新对中国包容和开放，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促进人们民主化的生理适应。其次，30多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信息化相伴而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

触、认识、理解和接受民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中国民主化奠定了较为广泛而厚实思想启蒙和行为学习的基础。尽管近十年来政府不遗余力的反启蒙对民主化造成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认知能力不足的中下层民众。而近年来的极权化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反而有助于社会精英的民主启蒙，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到专制的危害和民主的好处。再次，中国是民主化的后进生，经历多次民主化失败，有国内外民主化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重蹈他国和本国激进民主化的覆辙，不会出现过广过快的民主化，这有利于人们对民主化的结构适应。最后，国内精英和外部势力会形成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合力，为中国民主化提供正向扶持、引导、约束和推动。近十年来，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经历或正在经历高度极权的“洗礼”，痛定思痛，他们应该会达成中国必须民主化的共识；在国际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民主阵容日益壮大和联合，而以俄罗斯等国家为轴心的专制阵容日趋衰微与神离，已经很难对中国民主化进行逆向干预；民主国家已经感受到日益强大的中国专制政权的渗透和威胁，出于自身安全与繁荣的考量，他们也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中国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共问题。一旦中国启动民主化，国际民主阵容一定会进行积极的正向干预。

中国民主化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要经受生理适应、认知适应、行为适应和结构适应等诸多重大挑战，道路必定曲折艰辛，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李西潭(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后的中共，只着重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并未推动任何政治改革。习近平上台以后，运用高科技控制人民，数字极权主义隐然成形，并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在这

后疫情时代，全球担忧中共会不会对外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极权专制政体会不会崩溃垮台？进而思索若中国推动民主化，能否维持政治稳定。

首先，如何看待民主、专制与稳定的关系？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理论大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1968年出版《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政党竞争从长远来看，除了促进民主外，更可增进政治安定。他说：“我们经常以促进民主、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及维持多数统治为理由，来为政党竞争辩护。但我们也可用政治安定的价值，来证明政党竞争的必要性。政党竞相争取选民支持，一方面可以扩大政治参与，同时也可强化政党组织。再者，此种竞争可诱使怀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愿望的新社会势力，较可能在体系中求发展，而不是与体系作对。”

其次，以台湾的政治发展为例来观察，发现愈民主就愈稳定，也愈少暴力。戒严时期无论是白色恐怖，或者1977年中坆事件、1979年“美丽岛事件”，都比1987年解严后更多暴力。1987年到1996年民主转型期间，虽然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频繁，但唯一暴力案例为1989年郑南榕被迫引火自焚。而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确立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完成民主转型以后到现在，台湾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政治暴力事件。以2014年“太阳花学运”为例，长达二十三天，相对和平、没有人死亡，五十万人上街集会游行离开以后，垃圾三十分钟收拾干净，展现公民社会运动的高素质。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非暴力，台湾的民主转型更普遍被赞誉为“宁静革命”。

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反过来用作对内镇压与对外扩

张的工具，乃是世界上唯一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的国家。但为何需要这么多经费来维稳，岂不代表极权专制严密控制下的社会反而极度不稳定？未来中国民主化稳定与否，吾人认为下列五项因素非常重要：1、建立制度化，尤其是确立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2、尊重地方自治与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承认的第一条“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原则。3、确保军、警、情治人员服从民选领袖的领导。4、透过民主化来培养人民的民主文化素养。5、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来帮助中国人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以免重蹈俄罗斯转型未能成功的覆辙。

**雷乐天（中国大陆政治学者）：**中共的“民主致乱”论浮现于1989年左右。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在1940年代加入中共或加入其外围组织的老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水、鲍彤、杜光、郭罗基、江平等，堪称中流砥柱。他们青年时代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向往中共对民主的许诺。笑蜀《历史的先声》已颇为详尽，在此不赘。中共改革派不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对自由民主信念始终如一的群体。同样搞学潮起家的江泽民等另一批中共党员则背离了初衷。

李鹏和邓小平都表达过“民主致乱”论，称镇压八九民运是为避免另一场文革。1966、1967年确实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的话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无疑是“乱”，但是“民主”吗？

按中共官方宣传口径，中国现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虽然跟自由民主不同，但也是一种民主。既然中国已经是民主了，怎么还没乱呢？其实这种“民主相对论”经不起任何推敲。照此逻辑，为破除西方对民主的“话

语霸权”，沙特阿拉伯是“君主专制式民主”、伊朗是“神权式民主”、大清国是“爱新觉罗式民主”……因此，为了避免讨论的混乱，必须将民主明确定义为自由民主。

“天下大乱”时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一应俱全，充其量是“毛式民主”，并非自由民主。从红八月到广西文革屠杀，抄家、武斗、私刑、拘禁屡见不鲜、“无法无天”，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沦为一张空文。自由民主的要义是对民主加以“自由”的节制，意味着对生命、财产、自由等人权的法律保障先于任何形式的民主，无论是代议制选举、直接选举还是参与式民主。惟有如此，才能防止民粹主义乃至暴民政治。如果将“民主致乱”理解为“毛式民主”会导致“天下大乱”，此言不虚。但1980年代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清晰诉求是自由民主。将自由民主与“毛式民主”混为一谈，用“稳定压倒一切”将两者视同，不啻为一种话语操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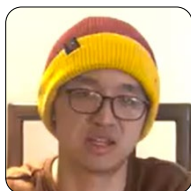
民主转型未必一蹴而就。担心向完全的自由民主（如日本、韩国、台湾）转型风险太大，向混合政权即有限的自由民主（如新加坡、香港）转型，也不失为一定程度、一个阶段的中国民主转型。无论何种程度和阶段，一场不可逆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必须经历成功的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并避免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autocratization）。“60年代人”戈尔巴乔夫以推动民主化名载史册，但这场民主化以民主巩固失败及接踵而至的民主倒退告终，这是戈氏本人及俄国的遗憾。笔者相信，中国民主化的21世纪伟业离不开“白纸一代”政治新人的智慧和勇气。

祚正平（旅美中国留学生）：“中国民主化后会乱吗”，这个问题直到中共政府倒台之后才会有答案。我不是诸葛亮怎么能预测未发生的事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是关于“中国人愿不愿实行民主，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的讨论。持否定态度的人大多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忠孝节义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人无法实践源自西方的这一政治制度。所以，即使中共政府倒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中国人也会选择另一个独裁者作为领导人，最后重新令这个国家、乃至世界陷入混乱。持肯定态度的人则大多是制度决定论者。他们认为施行民主制度后，中国人获得了言论自由和投票等权利，能够收到不同的信息，自然就会摒除国家主义等思想，选择坚持民主制度并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

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对于文化决定论者来说，似乎每个人一出生便获得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出厂设置”。不过这却无法解释他们自己作为在中国那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支持民主制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美台日等成熟的民主国家内，依然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法西斯与支持中共统治的坦克党（tankie）。而对于制度决定论者来说，似乎民主是一剂万灵药，只要中共倒台，施行民主派制定的宪法与转型正义方案，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可是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内部，各种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很尖锐，现在更是面临着威权、保守主义回潮的威胁（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民主制度不行。相反，我觉得只有一人一票、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才能称之为民主，也只有宪政民主才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

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中国人愿不愿、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呢？在这里，我曾向胡平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民主墙、民刊一代成长于文革时期，信息极度闭塞，连书都没有几本，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回答是过去痛苦的经验。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受到或看到了非人道的迫害，一些人开始反省，有了或朦胧或清晰的自由民主思想，乃至开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动。所以，决定中国民主化后会不会乱、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实行民主的其实正是中国人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能一代代保存痛苦的记忆，能反思极权统治与自身所享受的特权，能看到并积极回应所有受压迫者的诉求，那么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会就会最终建立。



**王涵（旅美中国留学生）：**“中国民主了会乱吗？”，这的确是很多人经常会问，很多威权主义者在反对中国民主时都说一定会乱，我听到都有些烦了。

首先，民主自由本就是天赋人权，与民主之后发生什么结果并没有关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在西方文明史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上，革命发生时，英勇的人民并没有想到革命之后的政府会不会“乱”，会不会因为持续的争论导致政府效率低下，会不会因为地方和中央冲突而导致战争。当时人们想的仅仅是民主本身作为议事程序，就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不论其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如何。政府、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本身就应该保证人民拥有参政议政，选出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不管人生来经济上有多大差距，他们在社会上拥有的权利应该是相等的。反民主的专制体制名不正言不顺，本身就站在了正义的



对立面上。

其次，民主之后所谓的“乱”，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血流成河战争，更多的是关于各自立场和利益的激烈争论。历史上激烈的讨论无一不促成了相关领域伟大进步，美国总统辩论促使普通民众对国家政策有更深入的理解，战国时期庄子和惠子“子非鱼”的辩论促进了哲学的思考，波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促成了量子力学在物理学的进步。其大部分结果都是正面的。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所谓“乱”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最落后的时代，反而是固步自封的皇权专制王朝的顶峰清朝，所谓最“不乱”的时代。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和乱不乱并没有关系，而是文明本身所创造的成就。反过来讲，威权专制就能避免所谓的“乱”吗，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每隔两三百年就更替一次，而每次更替，中国土地上就会人口锐减、生灵涂炭，而中国历史并没有民主启蒙。

最后，民主本身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长制的父权家庭往往会造成矛盾的积压不可调和，而真正地民主讨论反而会造成家庭的成员拥有主人翁意识，从而家庭更加和谐。国家也一样，因为人类社会处处存在矛盾，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用强力压制讨论，不如暴露矛盾，让真理越辩越明。而专制社会下掩盖矛盾、镇压异见、暗箱操作，这必然激化矛盾，造成暗流涌动，直至民怨沸腾。

对于每个理想主义者来说，民主都是不可妥协的原则，而对于每个现实主义者来说，民主都是国家走向文明的必要条件。综上，民主会不会乱结论似乎不言自明了。



邓聿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前副编审）：中国经济遇到了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对民主转型来说，这将提供一个有利时机。尽管经济的变坏并不一定会促使民主化的到来，然而，经济处于困难阶段，显然比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更让人心思变。所以，对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士，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

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看，人们对现状，对习近平的统治是越来越不满了。我认为这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已到了某种临界点。虽然人们基于各种考量，还不敢公开走向街头表达对政权的不满，但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目前这种情况不可能维持太久——要么变好，要么变得更坏。可习近平的十年统治已经耗损了中国的发展元气，变好的概率很小，变坏的概率却很高。

尽管如此，民主化不会自动到来，需要有人去催、去鼓动，让更多的民众放下心理包袱——其中一个影响人们参与民主化的心理包袱，就是担忧社会不稳，天下大乱。中国民众此种“求稳怕乱”心理既来自于历史经验，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打仗的时候多，和平的时候少，形成了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更来自于当局对民主革命的妖魔化宣传洗脑，特别是对个别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暴力现象，把它歪曲为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以此恐吓大众。

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内乱和暴力，是有自身的特定因素，可并不表示所有的民主转型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比如，苏联的解体就是一种相当和平的态势进行，作为一个靠武力起家并严重依赖暴力镇压功能

的帝国，它的解体过程没有出现流血，此后社会也未陷入内乱。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出现内乱。世界其他地区其民主转型多数也是平和的。因此，把民主化和动乱、暴力、战争等挂起钩来，认为是国家民主转型的必然现象或者普遍规律，是错误的，乃中共多年来为维护一党专制统治而编造的宣传伎俩。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有着很长的专制历史，又都在共产党的暴力统治下；既然苏联的转型是和平的，就不必成天担忧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会如此。当然，有人会反驳，苏联的民主化其代价就是一个强大帝国的解体，怎能保证中国在民主化中不会分裂？确实不能保证，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动乱，事情在未做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有。但是，不能怕这怕那就不敢去尝试。打个比方，不能因为怕出车祸就不去开车。如果这样，恰恰中了中共的圈套，它就希望人民谨小慎微，好永久统治。

政权更替免不了是有代价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使每个人在民主化中代价尽量地少，在每个人的可承受范围内。不过，话也说过来，在一个政权气数已尽时，不会因为人们怕乱它就不会崩溃。所以，对大众来说，既然想变革，让自己从此不再生活在中共统治的恐惧中，就不该被它的宣传所惑，而参与到民主变革的事业中来。

陈纯 | 作者陈纯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领域主要为伦理学、政治哲学和价值现象学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自由主义的 四次“左右 之争” (下)

**摘要：**近十余年来，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内部产生了四次“左右之争”，它们分别围绕着分配正义、改良与变革、#MeToo以及川普主义展开。中国语境下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这四次论争中逐渐成型，并且不断参与到本土的议程设置之中，与此同时，左右两翼自由主义的分歧也在论争中愈益明晰。这些分歧的维度除了受到两翼各自的理论来源的影响，也深刻地受到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与过往思潮的形塑。本文旨在对这四次论争进行整理、探究、分析、总结，以期有益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

## #MeToo的挑战

如果说在2016年改良与变革之争时，自由主义者里的变革派尚且缺乏一个“现实基础”，那到2018年时，这个现实基础来了，这就是轰轰烈烈的#MeToo运动。

有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女权主义的现实基础，跟自由主义无关；但归根到底，这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如何理解自由主义，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各种社运的关系。一个西方的自由派（liberal）对#MeToo运动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尽管我们也不是要将西方的liberalism“照搬”到此地，但在中国，#MeToo运动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就是现实。

中国的#MeToo运动开始于2017年底，一直到2018年7月初，它在自由主义者里都获得了普遍支持。公平地说，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具有较强的性别意识，而主要是因为运动首先冲击的是体制内的大学教授。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陈小武、南京大学的沈阳（事发时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顾海兵和中山大学的张鹏，他们具

有体制内成员的身份，且与自由主义并无任何关联。

直到#MeToo进了公益圈、媒体圈和公知圈，自由主义者才认真思考起自由主义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因为这几个圈子都有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事情的转折点在于青年女作者赵思乐对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的指控。熊培云是2010年左右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重新发现社会》等，在青年之中影响广泛，而赵思乐曾是端传媒的特约撰稿人，有多篇对中国的抗争者的深入报道，赵思乐的指控自然引起自由主义者的极大重视。相比针对资深媒体人章文和知名公益人雷闯的指控，赵思乐对熊培云的指控疑点颇多，她甚至不能确定是熊培云有意用书本触碰到她的敏感部位，让人难以全然信服。

2018年7月27号晚，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个长图，对#MeToo进行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文章分为十七个小节，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让女权主义者感到难以接受，包括总体肯定#MeToo、被作者自认为“政治正确”的第二小节，因为里面提到女性要学会自我保护。从第四到第八小节，刘瑜阐述为何诉诸司法优先于网上曝光，她所列出的理由也确实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比如法治、个体主义、无罪推定、比例原则、不能要被指控者自证清白……在第十节，刘瑜认为不应当永远预设女性是“无辜柔弱女人”这也不符合女权主义所信导的“力量、自主性、勇气”，两性之间应该权责对等。第十二和十三节所引发的争议或许是最大的，因为刘瑜说，流行文化中的“easy sex”观念和某些女性的自我物化也需要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负一定的责任。

刘瑜的文章于深夜发出，但在朋友圈的转发却成刷屏之势，主要转发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到第二天早上，来自女权主义的批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毕业的赵丹，是最早回应的一个，《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对刘瑜的文章逐一作了反驳，其主要的论点是：性骚扰所涉及的问题，并非仅通过司法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这就是#MeToo运动的正当性；#MeToo的主要目的，也并非将被指控者置于死地，而是让受害者在讲述的过程中自我赋权和重建对他人的信任。<sup>1</sup>

后来出现的一些批评文章，语气更为激烈，大有把刘瑜当作#MeToo和女权主义的敌人来看待的架势。自由主义者对激烈批评刘瑜的声音大感骇然，有一些觉得这是#MeToo运动已经失控的征兆，因为它已经容不下任何批评。女权主义者和年轻世代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应也感到不解，有的认为这是“代沟”，有的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保守”，已经“跟不上时代”。媒体人纪小城写道：“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已远远落后于年轻社运一代……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女权主义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运动中的行动派。”<sup>2</sup>北大飞认为，以刘瑜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患有严重的“文革恐惧症”：“其症状是：无论看到什么社会正义方面的东西，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看到持左派理论的人或群体，马上大脑自动的吓唬自己，这些人是不是挺毛的，他们做的事情会不会最终导向又一次文革。”<sup>3</sup>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刘瑜批评的人，对自由主义都有相当程度的认同，

甚至也自认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北大飞。自由主义者关于#MeToo的论争，确实也是一次“左右之争”，这不仅因为被周保松翻译为“左翼自由主义”的liberalism，在西方早已将“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作为政治正确，而且“左”本身就有“进步”和“平等”的意味，这种“进步”和“平等”如果不包含“性别平等”，那是说不过去的。在刘瑜的文章出来之前，作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林垚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对#MeToo运动表达支持，其逻辑用于反驳刘瑜也未尝不可。<sup>4</sup>

在另一个层面上，关于#MeToo的论争也可以算是“左右之争”，因为这次论争也是对“改良与变革之争”的一种延续。从刘瑜对#MeToo的批评可以看出，她（当时）依然相信某种意义的“渐进主义”，比如她主张诉诸司法、相信程序正义，这对于那些对体制的自我改良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司法的程序正义，根基在于司法独立，而在此地，“司法独立”被当作与中国国情不符的“邪路”。有的人可能会说，对于民事案件，政治权力一般不会加以干预；然而，这归根到底取决于案件的影响力，以及当局对案件如何定性。让受害者去诉诸司法，相信诉诸司法能比社会运动更好地实现正义，这本身就蕴含着对现有体制的一种“信任”。

从刘瑜对#MeToo的形式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她某种程度的保守倾向。她虽然自称不反对社会运动，但她设想的社会运动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社科教材上的那种，以某些领导人物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然而#MeToo是去中心化的运动，尽管在中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受害者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这也使得她们对什么样的案子会曝光、什么样的受害者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受害者自己没有勇气，不愿意站出来，运动也是



持续不下去的。正因为#MeToo运动里有一个接一个的受害者勇敢地提出指控，所以它才能实现广泛而深入的自我赋权和群体联结。

刘瑜的文章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文革的类比，这一点北大飞已经点了出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革”不仅对官方来说是禁忌，对民间也是忌讳，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西方的学者说，战后的西方存在一种“归希特勒法”（模仿“归谬法”而创建的一个词），即任何事情只要能与希特勒的恶行做类比，那其道德上的错误就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是这样，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存在着“归文革法”，任何事情只要能与文革做类比，那就是值得警惕的，值得唾弃的。然而随着文革研究的发展，以及新生代左翼青年的出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和“造反派”，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惊恐和痛恨。更何况，把在权力操弄下拿到免死金牌的、针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跟在官方眼里属于煽动性别对立和破坏社会稳定的#MeToo陈述粗暴地加以类比，应该是有失公平的。

在这一次关于#MeToo的论争中，并非所有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支持#MeToo，自刘瑜发出文章以来，周保松本人对运动一直持保留态度。然而正如#MeToo运动一样，左翼自由主义的构成运动也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人可以垄断对“左翼自由主义”的解释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可以代表左翼自由主义与#MeToo的关系。#MeToo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点出了以往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发展所欠缺的性别视角，而且也为其贡献了前进的力量。如果左翼自由主义已经抛弃了渐进主义，且需要一个推动变革的现实基础，那#MeToo运动则必然是这个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说，左翼自由主义能够比女权主义更好

地对#MeToo进行诠释，毋宁说，#MeToo不断地翻动社会的权力和观念的土壤，这就给了左翼自由主义机会，对它们进行重新整合。然而，如果左翼自由主义者不能对自身的观念结构做出同样革命性的整合，那他们迟早会走向其所拥护的事物的对立面，或在精神分裂中丧失参与前进的动能。

## 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

2020-2021年的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之争，作为“左右之争”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大部分参与论战的人就是从“左右之争”来理解自己与对方的论争的，比如郭于华的文章《观美国大选，想中国问题》，其中一节就是“左右之分”，并对“左”进行了无差别的炮轰<sup>5</sup>，滕彪的《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不仅在标题已经将对方称为“右翼”，而且在文章中也为“左派”与“社会主义”做了某种意义的辩护。<sup>6</sup> 所以这次论争，更加像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对过去二十年来的分歧进行总结和清算。

论争的缘起是2020年的美国大选，围绕着是否应该支持川普，2020年总统大选是否存在舞弊，以及2021年初川粉攻占国会究竟算什么性质，自由主义阵营里的挺川派和反川派打起了激烈的嘴仗。接着，挺川派联合出版了《川普主义》，反川派针锋相对，出版了《川普主义批判》，而在台湾的《思想》杂志，则推出“解读川普现象”的专题，向两边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约稿。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右翼自由主义或者保守派自由主义明显是论争的中心，《川普主义》主要在阐述己方的观点，《川普主义批判》主

要在批判对方的观点，《思想》的文章，阐述川普主义和批判川普主义兼而有之，但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基本没有得到陈述。不过刘军宁在2020年7月7日的网文中概括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13条立场对比：多元化种族配额／教育权利平等；大麻合法化／反对大麻合法化；支持堕胎／反对堕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信念信仰／信念信仰；大政府主义／小政府主张；同性婚姻／男女结合婚姻；全面禁枪／反对禁枪；增税／减税；接受非法移民／接受合法移民；随意冒名投票／有ID才可投票；完全开放边境／加强边境执法；奥巴马医保／反对奥巴马医保。前者代表民主党，后者代表共和党。他问，如果你在美国参加大选，你会投哪一边？<sup>7</sup>

郭于华发表在《思想》上的文章，也对左右两边的立场做了归纳：“左右之别是存在于无神论与信靠神之间，在辩证法与逻辑思维之间，在平等与自由的价值之间，在激进革命与审慎变革之间，在推翻重来与尊重传统之间，在理性主义和理性有限之间，在标新立异与基本权利之间，在创造规则与自发秩序之间，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在致命的自负与承认人性弱点之间。”<sup>8</sup>

然而，这些都很难说得上是对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陈述，因为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不等于美国民主党的立场（且上述概括也不见得是对民主党立场的准确描述，一些概括过于简单化，明显有污名化对方立场的用意，如随意冒名投票、完全开放边境、致命的自负等），而郭于华所说的“左”，更是包括了中国的老左派和新左派，只是她觉得并没有必要把这两者与左翼自由主义区分开来而已。

这说明了这些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对左翼自由主义有相当强的敌意。我们不

妨从另一边，看看左翼自由主义者对保守派自由主义的总结，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周濂的《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对所谓的川普主义者（代表大部分的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他所谓的“迷思”）做了概括：

迷思1：圣经造就美国：只有回归盎格鲁—新教传统，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

迷思2：美国正在社会主义化：无论是经济安排还是文化道德，美国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会主义。

迷思3：曲线救国：惟有川普继续执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变革。<sup>9</sup>

针对每一个迷思，周濂都做了相应的反驳和批判。应该承认，即便川普主义者不同意周濂的批判，但这几个描述还是符合他们对自身立场的理解的。

滕彪在《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中对“右翼化的泛民派”也有一定的概括，比如市场原教旨主义、小政府主义、反对分配正义、厌恶一切“左”、信仰基督教、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中国共产党）情结。<sup>10</sup>假如将“市场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换成更中性的词语，这些概括保守派自由主义也未必会反对。

不过，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右翼自由主义，跟2011-2013年期间与周保松辩论的那些，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逐渐盖过了他们

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执着。右翼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化”，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就蕴藏着萌芽。在第一章第五节“一般原则与基本信条”里，刘军宁就提到保守主义相信存在着“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保守主义者通常相信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客观的道德秩序。在基督教和社会中，这种保守主义信念来自自然法，来自上帝。”<sup>11</sup>在第六章第六节“宗教之维”，他说：“保守主义特别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它认为，宗教组织的普遍存在可以制衡现代国家的集权倾向，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的宗教组织，公民的自由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同时，“宗教的繁荣通常会对一个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作用。”因此，“宗教作为社会中的精神与道德事务的权威源泉，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sup>12</sup>

自由主义者的基督教化，作为一条暗线，内里汹涌澎湃。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一些以往知名的自由主义者，突然皈依了基督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冉云飞和李英强。王怡是“70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曾经发表过一系列与宪政主义有关的学术文章；冉云飞是牛博网和“公知时代”的知名作者，对自由主义的科普和推广做出过相当的贡献；李英强则是“立人大学”的创建者，在自由主义的行动者中算是重量级的人物。另外，江湖人称“阿姨”的刘仲敬，也在2016年皈依基督教。刘仲敬虽然与自由主义者来往不多，但其保守主义倾向显而易见。他曾经论述基督教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精神支持，更在于提供“组织资源”，而这在中国的抗争者里是严重稀缺的。

到了2020年，基督教在右翼自由主义者那里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周濂对此有所刻画：“华人川普主义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顿的这个叙事；随着川普当选引发的保守主义热潮，尤其是杰瑞·纽科姆的《圣经造就美国》、拉

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思想》陆续引入中文世界，愈发坚定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即便是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学者萧三匝依然在《川普主义已经赢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义的实质，毫无疑问，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既关注人权，更关注人权的基础——神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萧三匝认为川普虽然输了，但川普主义必将胜利，因为它是恢复山巅之国的荣耀的必由之路。”<sup>13</sup>

右翼自由主义者的基督教化对左右之争当然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加剧了另一边的不信任，左翼自由主义者怀疑这些对基督教信仰如此执着的人，是否还称得上“自由主义者”，是否还会坚持“思想自由”，是否能宽容无神论者和LGBTQ等群体。事实上，有一些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正是因为这其中的冲突，所以干脆放弃自称“自由主义者”。另一些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有些表达总让人担心他们有建立“神权政制”的想法，至少，他们希望基督教能具有美国的福音派那样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给了右翼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语言武器，用来攻击一切“左”。如今，“左右之争”在他们看来变成了“正邪之争”，对“左”的妥协变成了对撒旦的屈服。郭于华的那篇自白再好不过地展示了这点，她认为此次美国大选，不仅是川普与拜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派之争，而且是关乎“美国的成败、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甚至人类命运的重大选择”。她甚至放言：“真相和真理比输赢重要。故不以成败论，而以是/非、正/邪、善/恶论；只能选择站在正义一方，没有中间立场和中间道路。”所谓的“非”、“邪”与“恶”，自然就是“左”：“左与共（产主义）通，诉诸于人性之恶，不会消亡于一时。如果人类自己选择走向深渊，谁也无法阻挡。”<sup>14</sup>

川普现象之所以能引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分裂，一个是他身上集中了大部分左右对立的焦点，比如他主张减税政策、反对政治正确、宣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每一样都为左翼自由主义者所怀疑，也为右翼自由主义者所推崇备至。不过仔细推敲起来，因为川普而引发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如此大的撕裂，确实是让不少旁观者感到意外，毕竟他并不是亨廷顿所说的“自主式的保守主义”，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像是个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那么虔诚，对美国的建制也持有很多机会主义的态度，而且他的许多言行所引起的争议，并不仅仅是左右信念差异的问题，而是对民主制度本身也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冲击，尤其是2021年初川粉攻占国会，更是将围绕着他的矛盾推到了至高点。

2020-2021年的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是这四次论争里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自由主义左右翼分立的格局正式成型，但分立之后是进一步的撕裂还是对话与联合，如果是后者，那又如何可能？这是放在自由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难题。随着川普逐渐远离总统之位，他所引起的论争可以继续，但他所引起的对立情绪，确实没必要再继续了。

## 左右之争的原因

到了2020年代，自由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粗略来说，右翼自由主义依然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反对福利主义，但比起它1998年浮出水面的时候，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那就是对政治正确的拒斥和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左翼自由主义离周保松刚提出的时候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它如今对不同维度的弱势群体的权益都予以考虑，不仅包括阶层

上，也包括性别和族群上的，同时，它对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有更大程度的接受和思想准备。

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变化至此，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四次“左右之争”，不如说这四次论争只是起到部分的推进作用，其他的因素还包括：

**新左派让出左翼的知识空间：**严格来说，新左派并没有放弃原有的左翼立场，但他们对这些立场的坚持也愈益标签化，基本可以概括为“反资本主义”，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另外，涉及这些立场的争论已经不是他们在学术上关注的重点，正如我们在第一节所说，他们后来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化”，致力于维护中国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化”，将20世纪的左翼运动和中国革命作为一种景观和传统重新诠释。这就使得左翼的知识空间和实践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真空，其实践空间由非国家主义的左翼青年所填补，其知识空间则由左翼自由主义所占领。

**部分自由主义者有意的保守主义化：**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小部份知识分子有意地引入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这其中的一些，比如蒋庆，将其用来发展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政治儒学），并推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另一些，比如刘军宁，则将这种西方的“保守主义”充分阐释，并影响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按照刘军宁等人的说法，这种保守主义才是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其在近代以来之中国的缺席，是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诞生与罗尔斯主义有着密切的



联系，周保松本人就是罗尔斯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左翼自由主义”，最初也是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一种阐释。大陆最早承认自己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比如周濂和刘擎，都不仅受到过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而且也都在这个基础上对左翼自由主义进行阐释。2014年在香港召开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会议，与会者大多有一些罗尔斯研究或分析政治哲学的背景，这种知识背景对于后续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sup>15</sup>

**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划分的引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运作和政治派别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在海外（主要是美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和中国留学生，也将这些西方的政治常识进行了传播。以美国的“左右之争”为例，“左”主要指的是自由派（liberals），“右”主要指的是保守派（conservatives）。自由派一般支持较高的福利，支持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支持女性的堕胎权，支持禁枪，支持LGBTQ的权利，支持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保守派则反之。不过，自由派不等于民主党人，保守派也不等于共和党人。民主党里有一部份比自由派要更左一点，而保守派属于共和党里比较右的那一部份（当然还有更右的）。在中国的语境里，liberals又有一个特殊的翻译，叫做“白左”，它与“政治正确”一样，经常被中国的网民嘲讽。<sup>16</sup>应该说，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分化，与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划分脱离不了干系。

**大环境的变化，压迫加剧：**自当今领导人上任以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就江河日下。国家针对高校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出台了“七不讲”，针对在舆论场上风头正健的“公知”，封禁了大量大V的账号，针对到处死

磕的“人权律师”，制造了“709事件”，针对接受境外资金的NGO，出台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慈善法》，针对不接受收编的地下教会，修改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大环境日益逼仄，自由主义者的心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的自由主义者想退守自己的“私人领域”，这便有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争；另一些自由主义者，想通过更具组织性的方式“曲线救国”，这便使得基督教会里的自由主义者数量激增；还有一些，想要通过与其他激进力量的联合，来实现自由主义的突围，这也为打破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教条做了准备。当然，这样的大环境也会让一些自由主义者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比如认定另一边的存在，是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或者将大部分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政治的变化。

**中美社会运动的兴起：**从2013年开始，美国兴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对美国盛行的针对非裔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抨击，然而这场运动在中国互联网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正面评价，中国网民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治正确”愈演愈烈的表现。由于受美国的保守派影响，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运动也是怀疑多于支持，这为后来左右两翼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论埋下诸多伏笔。2017年，#MeToo运动从美国的好莱坞蔓延到世界各地，到了年底，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MeToo案件，在2018年达到高峰，至今方兴未艾。这些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放大了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的分歧，而且也使得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出现了进一步的演化和整合。

经过2020-2021的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之争，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撕裂严重，虽然已经过了两三年，但对立情绪依然难以消泯。然而平心而论，左

翼自由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依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也是它们依然都能称为“自由主义”的原因。这些共同点包括：

个人主义：虽然左翼自由主义支持社会再分配，而右翼自由主义越来越强调“组织”和“社群”，但两者的根基还是个人主义，正如朱学勤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宣言所说的，“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sup>17</sup>

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绝对的放任自由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而这涉及社会正义，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会否认，市场经济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能受到限制，而不能完全取消，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经济自由，也关系到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左右的分歧在于经济自由是否是最根本的自由，以及对自由市场的限制要达到什么程度。

宪政、法治和民主：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都不会否认宪政、法治和民主对于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朱学勤所说的依然适用：“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可能需要“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补充，但不会认可毛式“大民主”。

其他的一些共同点包括但不限于：对大跃进、反右、文革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而并非由于中国体制的优势和执政党本身的执政能力；反对中国以任何名目发动战争；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粉红民粹主义均持批判态度。

## 结语

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绝对不是正邪、善恶、是非之分，而是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右翼自由主义，其内部的基督教群体组织性强、意志坚定、心力充沛，不容易被高压打垮，正如王怡所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是党政体制之外，硕果仅存的独立力量了<sup>18</sup>；右翼自由主义对大政府有天然的警惕，这与当下执政党的大政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而左翼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国家在再分配和平权运动中的作用，在宪政民主尚未建立之前，这样的强调会让人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感。然而，右翼自由主义对左翼自由主义的敌对情绪要更加严重，这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批判，总是有树稻草人的倾向，比如将左翼自由主义与老左派、新左派混同，或者通过引用一些不实的信息来批判左翼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政治正确”。右翼自由主义者里，“支黑”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支黑”认为共产党统治的问题，只是中国问题的表征而已，所以不仅要反共，而且要反支（支那），他们要么认为中国是没救的，要么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解体。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一部份右翼自由主义者对于一些群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比如女权、LGBTQ、穆斯林等，这使得他们与中国的主流网民越来越难以区分。

在另一边，除了大政府倾向容易在异见群体里引起反感，左翼自由主义还有诸多弱点，比如在地性有所欠缺，因为其初始的理论背景来自分析政治哲学，而分析政治哲学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差异巨大，且其主要构成者依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普通人的诉求和痛苦感受不足；另外，左翼自由主义人数稀少、过分分散、单打独斗、凝聚力弱，“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在那些实质持有左翼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群中缺乏号召力，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比较明确地自我认同为“左翼自

由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与其他的进步群体，比如女权主义者和非国家主义的激进左翼，仍存在难以协调之处。左翼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难以扩大，也很难在新的变革之中争得稳定的话语权。

2014年，共识网对陈冠中做了一个访谈，里面提到一种相当综合的左翼图景，不仅涵盖上述自由主义的左右之争的大部分面向，而且还涉及四次论争中未曾提到的环保、后殖民等问题。<sup>19</sup>可惜他的这一个访谈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不然左翼自由主义的进化速度可能要更快一些。值得一提的是，陈冠中在访谈中一直谈的是“新左翼”，而不是“左翼自由主义”，他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世界左翼的传统之中，但在其他地方，他也愿意自称“左翼自由主义者”。<sup>20</sup>这说明“左翼自由主义”确实是结合了“左翼”和“自由主义”两个传统，而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左翼自由主义蕴含着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左右之争”，并不是一种“问题殖民”，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也不是西方“白左”的中国镜像。左翼自由主义出现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土壤和机缘。而且，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对于“政治正确”的诸内容，他们的认同感并没有西方的“白左”那么高，这个和中国的“公共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程度有关。<sup>21</sup>最重要的是，如今中国左翼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反国家主义”，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或“反保守主义”。

在未来，自由主义者的希望，除了在左右两翼的互相谅解，也在于两翼各自的联结基础。自由主义右翼里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群体有着广泛的联结，而后者在中国有数千万之巨。自由主义左翼的情况则稍微复

杂一些，其出路只有在于与反国家主义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左翼自由主义经过数十年的现实锤炼和与右翼的论争，在阶级和性别议题上，与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有较程度的共识，具备一定的联结条件。

如果右翼自由主义也能意识到目前的迫切问题不是“反左翼”或“反政治正确”，那真的是皆大欢喜。

注释.....

- 1 赵丹的文章来自赵丹的微信公众号“赵丹赵丹喵”，<https://mp.weixin.qq.com/s/ZSZ-TFLIValyS2k8-KcCV9A>.
- 2 纪小城，《中国#MeToo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刊于《端传媒》2018年8月1日。
- 3 北大飞，《中国中年一代自由派的知识结构问题》，<https://mp.weixin.qq.com/s/1xW8Lw-aWPP-DkflpxqNOg>.
- 4 参见林森，《MeToo运动与“无罪推定”：一个澄清》，<https://matters.town/@linsantu/683-me-too运动与-无罪推定-一个澄清-zdpuApGyaA4RnSPUfsB1UjqSAXUZjd3nR947ZH89vTmNii6B6>，以及《MeToo会制造冤假错案吗》，<https://matters.town/@linsantu/684-me-too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zdpuB35qyY8bW1HiZwrKN3GFvM5g6SkCBTEE6RDCBTdw4Xb4b>.
- 5 郭于华，《观美国大选，想中国问题》，刊于《思想》第42期。
- 6 滕彪，《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刊于《思想》第42期。
- 7 郝志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三个政治角色》，刊于《思想》第41期。
- 8 郭于华，《观美国大选，想中国问题》，刊于《思想》第42期。
- 9 周濂，《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刊于《思想》第42期。
- 10 滕彪，《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刊于《思想》第42期。
- 11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 12 同上，第175-177页。

- 13 周濂，《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刊于《思想》第42期。
- 14 郭于华，《观美国大选，想中国问题》，刊于《思想》第42期。
- 15 关于会议内容的详细记录，参见陈纯，《自由主义的“进”与“退”》，收入《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20年。
- 16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发明“白左”这个词的人，当时就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
- 17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68262/?i=6924660fzvcDdv>。
- 18 王怡，杨凤岗，《神权与政权——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内部资料。
- 19 《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陈冠中先生访谈录》，<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30046.html>。
- 20 《周濂对话陈冠中之三：左翼自由主义是时候亮出来了》，[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88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7888)。同时参见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序言部分。
- 21 详见本人《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一文，收入《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当代问题

周保松

作者周保松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著有《政治哲学对话录》等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自由爱国主义



**摘要：**本文尝试论证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观，它肯定国家有存在的必要，认同关心和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不过却设下基本的条件：未经充分反思且得到合理证成的爱国主义，不值得我们无条件服从。自由主义会视秩序、自由、平等和正义为国家的基本价值，并以此作为爱国的基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必要建构自己的爱国观，以响应和抗衡各种反自由主义的爱国论述。

---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运动：追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争取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并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启蒙国人，推动传统社会转型成为现代国家。<sup>1</sup>不过，也有另一种论述，认为五四最重要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目的是民族自强和民族自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继续欺凌中国。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出现在五四运动，不仅影响了那一代的知识人，也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有深远影响。不少人因此认为，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不仅相容，而且彼此支持。

这种想法，无论在理念还是现实层面，都遭到很大质疑。在理念层面，不少人认为，自由主义视每个人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国家的首要责任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却要求个体必须将国家放在首位，并在有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和权利。我们于是见到这样一种对立：自由主义以个体为本，而爱国主义以群体为本；自由主义重视权利的普遍性，而爱国主义强调情感的特殊性；自由主义鼓励文化多元，而爱国主义主张国家认同的单一性。既然如此，自由主义者似乎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

爱国主义。

在现实层面，两者的张力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官方垄断了爱国主义的论述，里面容不下自由主义的内涵。一个自我界定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不会被社会公开接纳为爱国主义者。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尝试用自由主义的理念去质疑官方论述，就会随时被扣上“恨国”的帽子，轻则受到舆论的口诛笔伐，重则面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惩罚。而在香港这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区，近年也高扬“爱国者治港”：任何人如想参与政治事务，例如参选立法会议员，公民资格是不足够的，还须得到官方认证为“爱国者”。

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者有意识地和爱国主义保持距离，甚至在理念上与它画清界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不过，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最明显的，是自由主义一旦放弃论证一种属于自己的爱国主义观，就难以争取那些有爱国热情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无法为合理的爱国行为设下标准，从而约束那些极端的排外仇外和猎巫言论。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将尝试论证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并回应以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批评。我将之称为“有原则的自由爱国主义”，以别于那些无条件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以及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反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

## 二

怎样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般而言，爱国主义者通常抱持以下四种态度：一，对祖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二，对祖国有一种特别的认同；三，

对祖国的福祉和人民有特殊的关怀；四，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sup>2</sup>从这些态度出发，我们可以对什么是爱国主义作进一步的定义。

第一，“我”与“我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和亲近的关系。一个爱国主义者既不会一视同仁地爱所有国家，也不会视天下为一家，而是对自己的国家有特别的关怀和忠诚。<sup>3</sup>这种特殊性（particularity）如何建立？当它和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义务产生矛盾时，前者为何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的道德界线在哪里？这些都是思考爱国主义时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爱国的基础，往往不是源于自己的国家客观上较其他国家优越，例如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经济更发达等。尽管这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国家认同，却不是爱国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是这样，只要有另一个更优越的国家，人们就可以随时移情别爱。对不少人来说，爱国最直接、最自然的理由，就是“它是我的国”。<sup>4</sup>我们一生下来就活在国家之中，国家一如父母那样照顾及抚养我们，我们和国家之间因此建立起一种休戚与共、非工具性的伦理关系。

第三，爱国最具体的表现，是对国家福祉的真诚关心，并希望它愈变愈好。可是什么是“更好”呢？更富强、更自由，还是更正义？评价一个国家的福祉，可以有不同标准，它们之间不一定总是协调和统一，例如追求富国强兵和争取民主正义，就是很不同的国家想像，甚至会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爱国主义的内涵。爱国主义本身不是一套自足的政治学说，而必须内嵌于其他政治理论，并由这些理论提供爱国的实质内容和实践方向。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社会主

义，或儒家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爱国主义观。

最后，一个爱国主义者，并不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肯定自己。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这些独特性不可取代，甚至难以比较，我们大可既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也能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的优点和好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或军国主义等，虽然现实上常常会有各种纠结，但在概念上却没有必然的联系。爱自己的国家，并不需要排他和仇外，更不需要将自己想像成或吹捧为优等民族。

读者或会问，根据上述理解，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不是理所当然和轻而易举吗？这要视乎你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哪个时代。设若是民主社会，又是太平盛世，你对自己的国家有由衷的认同，同时国家又没有以爱国之名要你承担起沉重的责任（例如服兵役或交重税），那么爱国不仅没有难度，而且很教人愉快。可是，爱国主义被政府召唤并引发极大回响的时刻，往往是国家面对危机，急需人民支持，甚至要求人民作出巨大牺牲的时候，包括人的自由、权利、财产，以至生命。如果你不服从，就会承受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

这种政治动员如果出现在民主国家，由于有稳固的权利保障和公平的法律程序，个体尚有相当的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空间。可是，如果是发生在威权以至极权国家，通过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爱国主义很容易就会被利用来对内压迫异见和对外发动侵略。在那样的环境下，个人一旦被政权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人身安全和基本自由就会受到极大威胁，甚至没有为自己作出公开辩护的机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当代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屡见不鲜。由此可见，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集体主义，

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国家有难时，它可以团结国民，大家齐心抵抗外敌；可是这种力量一旦不受约束，并供统治者任意操纵，就有被滥用的危险，甚至可能将整个民族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既然爱国主义具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又存在集体主义的危险，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坚持这样的原则：未经充分反思且得到合理证成的爱国主义，不值得我们无条件服从。要满足这条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容许公民对爱国主义的各种主张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要容许人们有是否爱国及如何爱国的选择空间。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些主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明智判断。一如其他关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事务，我们希望自己所相信和所服从的，是正确和合理的观点，而不是令人炫惑的虚假论述。所有真诚的爱国主义理论，都应接受这样的前提，容许人们对其主张作出理性检视，而不是一开始便预设某些不能质疑的前提。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

当代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却对这种立场甚为保留。他在一篇影响力很大的文章《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中声称，这种反思性的爱国主义观其实预设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而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绝对不能相容。他甚至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有某些至为根本的前提是免于理性质疑的。<sup>5</sup>我以下将先介绍麦金泰尔的观点，然后指出他的论证为何难以成立。

### 三

麦金泰尔认为，爱国主义真正体现的，是一种社群主义式（communitarian）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体总是在特定的社群成

长，而人一旦离开社群提供的文化滋养，就难以发展成为完整的道德主体。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却主张我们应该克服这种特殊性，将人视为可以超越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抽象的理性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普遍性的道德原则，然后将这套原则应用到不同社群。可是，从爱国主义的观点看，个人必须效忠社群，甚至为了社群的生存而参与对外战争，即使这样做有违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在此情况下，爱国主义视为美德的行为，自由主义却认为是邪恶。<sup>6</sup>麦金泰尔因此声称，这两套道德观其实无法相容。<sup>7</sup>

麦金泰尔的立场，主要基于一系列前提：一，每个社群都有自己一组规范人们行为的特定规则，这组规则源于社群特定的历史脉络，并形成独特的制度设计和行为规范；二，社群是特殊和多元的，没有一套适用于所有社群的普世道德观，而只会有一套又一套特定的社群伦理。我们每个人的道德信念，只能从自己所属的社群习得；三，我们的理性能力，无法令我们超越自身的“社会特殊性”（social particularity），并从一个完全公平、客观（impartial and impersonal）的视角去证成一套普遍性原则，因为那些用于证成社群原则的基本“价值”（goods），也是来自特定社群中的特定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四，个体若要有效地实践道德的要求，成为成熟的道德主体，活出丰盛的人生，就需要有赖一个稳定和健康的道德社群。

麦金泰尔进一步声称，国家就是这样的社群。爱国之所以是美德，是因为没有国家，个体就没有道德和幸福可言。他因此如此总结：“忠诚于那个社群，忠诚于那个特定血缘关系的等级，忠诚于那个特定的本地群体，以至忠诚于那个特定的民族，在这种观点来说，是道德的先决条件。因此，爱国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忠诚，就不仅仅是众多美德之一，而是至为重要的美德（central virtues）。”<sup>8</sup>正因为国家有着如此根本的位置，麦

金泰尔甚至作出这样的声称：对一个爱国者来说，什么都可以质疑，但是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连续体，以及作为独特的道德社群，它的生存本身却必须“免受质疑”（exempted from criticism），因为我们作为民族的其中一员，个人身份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因此有最大的责任使其永续。<sup>9</sup> 麦金泰尔担心，自由主义所推崇的那种没有任何界线的理性批判，最终会危及社群的独立自主和永久生存。<sup>10</sup>

我认为麦金泰尔的观点难以成立，因为他对于个人和社群关系的理解并不合理。我们大可以同意，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社群。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小通过家庭、学校和不同群体，学习道德语言和伦理规范，并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成长为道德主体。我们也可以同意，我们生活的社群，总是具体和在地的，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并为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道德养分。自由主义不会否定这些事实，可是从这些前提，我们却不能推论出，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忠诚于所属社群，甚至放弃对社群作出理性批评的权利。

我们清楚知道，历时上大部份政治社群，都曾存在各种各样不正义的文化实践。这些不义既包括对社群内成员的歧视和压迫，也包括对社群外他者的侵略和杀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往往以维持社群传统价值之名来加以合理化。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就被认为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可是这却使得女性从出生起便活在被支配的状态；蓄奴制也曾被视为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最后只能靠一场死伤无数的内战令其终结。

自由主义的立场毋宁是：对于政治社群的规则、制度、传统，以及背后的

观念和价值，社群成员总是可以退后一步问：“这些规则合理吗？这种制度公平吗？答案若是否定的，我们仍然有义务服从和效忠国家吗？”自由主义坚信，这种批判性的诘问，事实上可能，道理上可取，因为这是人作为理性道德主体（rational moral agent）的基本体现。麦金泰尔既然以道德主体的发展作为证成社群之所以必要的主要理由，他就不仅没有理由反对，甚至应该鼓励人们作出这样的批判性反思。而我们一旦接受这点，就不应该预先为实践理性的运用设下边界，规定人们的反思一定不能触碰某些议题和批评某些立场。这样的设限，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

麦金泰尔却不这样认为。对他来说，既然人一出生便活在社群之中，无可避免地深受社群特殊的道德观影响，就不可能突破这个道德观设下的整体规范，然后站在一个超越的观点对社群作出批判性评价。<sup>11</sup>这样的回应，庶几接近文化决定论，不过却没有说服力，因为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道德经验。要知道，我们早已不再活在一个封闭、由单一道德或宗教支配社会所有领域的时代。现代社会文化极为多元，我们既可以在自己的传统找到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可以从其他传统吸收不同的文化资源，借此对所属的社群道德作出反思和批判。

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容许人们有独立思考和文化交流的自由，人的理性能力就有超越各种有形和无形边界的可能。而在反思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既不需要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也不需要将人想像成没有任何文化承载的抽象自我，而只需要承认独立主体在自由运用他的价值理性时，总是有可能对各种既有的道德规范作出分析、比较、质问、修正，甚至否定。这是人的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能力的基本展现。自由主义肯定这种自主性，并致力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的环境，容许每个人的自主能力得到



充分发展。

麦金泰尔回应说，爱国主义并不是完全拒斥理性反思，只是在关乎政治社群“根本结构”（fundamental structures）存亡的问题上，爱国者才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国家，拒绝对结构本身作出任何批评。麦金泰尔承认，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因为它意味着即使从自由主义或其他普遍性道德的观点看，这个政体很不正义，爱国者仍然应该站在国家这一边。“既然拒绝检视一个人部分的根本信仰和态度，也就等于是接受它们，不管它们在理性上可否得到证成。就此而言，这是非理性的。”<sup>12</sup>换言之，这种版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抱持这样一种立场：因为它是我的国，而且仅仅因为它是我的国，我便应该无条件地对它忠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令它生存下去。麦金泰尔这里用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例子，就是在纳粹时期，一个德国的爱国主义者，可以选择暗杀希特勒，却不应该采取任何手段去摧毁当时的德国政体本身。<sup>13</sup>

麦金泰尔很清楚，这个立场有相当大的道德危险，因为这等于打开一道缺口，容许某些爱国主义者以效忠国家之名从事各种极端行为，包括对内镇压异见分子和对外发动战争。现实中，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更大的问题，是这种诠释虽然能有效地将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区隔开来，却要付出极大的理论代价；因为这等于承认，爱国主义无法提出普遍性的道德理由来为“免于理性质疑”这种立场辩护。

即使这种立场无法被理性证成，麦金泰尔至少有责任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是理性批评的极限。毕竟我们都知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最重要的是它的制度，而制度是强制性的，同时深远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福

社。无论我们如何爱国，也不可能对极为不义的制度保持沉默，更不要说继续效忠。一个真正关心和爱护自己国家的人，难道不是应该勇于提出批评，从而促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正义吗？我们应该有“第二种忠诚”。<sup>14</sup>

麦金泰尔对此的回应是：“自由主义的道德观，是道德危险的永恒源头，因为它的理性质疑的方式，使得社会和道德联结很容易解体。”<sup>15</sup>原来这个才是麦金泰尔的真正担忧：理性批评是危险的，因为没有节制的批判，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可是这样的结论，实在是危言耸听。回望历史，似乎没有哪个民主政体，是由于国民的过多批评而解体的。最恐惧人民批评、并因此作出各种言论控制的，往往是神权或极权国家。

麦金泰尔曾讽刺那些主张用自由主义来约束爱国主义的人，是“被阉割的”爱国主义者。<sup>16</sup>我反而认为，麦金泰尔这种反理性批评的立场，最后导致的是“被阉割的”道德主体：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同时自我约束理性批评的限度。可以想像，如果有人不想约束自己对国家的批评，下一步自然就是国家权力的出场。讽刺的是，道德主体的充分发展，却是麦金泰尔用来证成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必要的主要理由。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麦金泰尔通篇将“社群”（community）等同于“国家”（state），可是这两者却是很不一样的概念。社群通常意味着成员之间有着共享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价值，以至生活方式，因此形成一个紧密团结和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然而，现代国家却是多文化、多族群、多宗教的多元社会，国家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不可能依靠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文化传统，而须仰赖一组大家都能合理接受的普遍性原则。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奠基性哲学，绝非偶然，而

是因为它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安排，能够合理回应现代多元社会的挑战。

麦金泰尔批评自由主义不重视社群的特殊性和在地性，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建立在政教分离、平等权利、民主程序等普遍性制度之上的国家，才能有效保证多种族、多宗教的公民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自由发展。自由主义不是不重视社群，而是认识到现代社会不再是单一社群，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政治框架来寻求和平共存。就此而言，从社群到国家，是现代政治的“范式转换” (paradigm shift)。<sup>17</sup>麦金泰尔拒斥自由主义，希望国家变回社群，并提出一种社群主义式的爱国主义，不仅无法回应时代，也会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既然如此，自由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应该是何模样？

#### 四

我在前面主要论证，我们不应接受一种不加反思的、无条件的爱国主义。换言之，我们要做清醒、有原则的爱国者，而不是盲从、没有价值底线的国家主义者。我们现在将讨论往前推进一步，看看自由主义会主张以哪些价值作为爱国的基础。

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会特别重视四项价值：秩序、自由、平等和正义。也就是说，一个值得我们效忠的国家，必须以这四者作为它的宪法基础。这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这些价值完全实现，才去认同这个国家，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追求和实现这些价值，我们也以这些价值去判断和约束国家的作为。如果既有的政体严重违反这些价值，我们就没有认同和效忠的义务，甚至有不服从以至反抗的理由。以下我将就这四个方面略作申论。

第一，自由主义有着独特的看待国家的视角：个体先于国家而存在，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国家，是因为它较无国家的自然状态，能够更好地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包括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我们的身份认同所需要的各种物质、精神和价值资源。国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制定和执行法律，建立一个大家愿意服从的政治秩序。有了秩序，我们的人身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稳定的社会合作才有可能。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分别，是它相信国家是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这是洛克、卢梭、康德等发展出来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

不过，读者须留意，这里所说的“先于”，不是指时间上或身份认同上的个人先于国家，因为在这两种意义下，国家显然先于个人而存在。这里的“先于”另有所指。首先，它是指在道德意义上，国家没有任何不证自明的权威，去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它的统治。相反，只有在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下，个人才有服从的义务。其次，它是指在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个人永远可以从国家成员的身分抽离出来，诘问和评价国家的所作所为，即使他仍然深爱这个国家，甚至拒绝离开这个国家。<sup>18</sup>

第二，秩序固然重要，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同样重要，所以它致力追求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和秩序之间会有张力，可是这种张力并非无法克服——只要国家建立起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自由制度，确保所有人能在尊重他人相同的自由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自由，自由的秩序就有可能。是故，国家最重要的责任，是通过宪法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同时确保这些权利能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充分实现。

第三，在建立自由秩序的时候，自由主义强调，所有成员必须得到国家平

等的关怀和尊重。也就是说，不同性别、肤色、宗教、经济阶级、性倾向、成长背景的人，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分别，他们都是国家平等的公民，理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包括平等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平等的婚姻权和工作权等。自由主义主张用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同样是相信政治平等，认为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第四，国家必须将正义放在首要位置。正义关注的主题，是国家能否给予平等的公民公平的对待，包括在司法中获得公平审讯，在政治中享有平等权利，在经济层面获得合理报酬，在社会中得到恰当的承认等。“正义”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不过归根究底，它关心的始终是个体在国家规范的集体生活中，能否得到公平的对待。国家无疑有许多要履行的职责和要追求的目标，可是国家必须重视正义，因为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有内在的价值和尊严，理应得到国家公正的对待。那些明显不义的国家，例如鼓吹宗教和种族歧视，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政权，都不值得我们效忠。<sup>19</sup>

读者或会问，即使这四种价值十分重要，为什么一个爱国者需要认同这些价值，而不是直接认同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为什么要给予前者优先？自由主义不会否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更不会阻止国民热爱自己的传统，不过它会强调，国家首先是个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本质，是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背后有武力支持。换言之，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群，而是有无上权力的组织，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以，国家能否给予每个成员公平对待，便至关重要。举例说，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某种受高度赞美的传统习俗，其实隐含对女性或少数族群的歧视，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它继续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

对自由主义来说，秩序、自由、平等和正义，都是国家具有正当性的重要基础。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绝非无条件，而是看国家有多重视这些价值。一个混乱失序、压制异见、种族歧视、践踏正义的国家，不值得我们无条件的拥护。一个自由主义式的爱国者，当然会珍惜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也会给予自己同胞特殊的关怀，并且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对自由主义来说，认同普世价值，致力将这些价值实现于自己国家，不仅和爱国主义没有冲突，而是应有之义，更是爱国的基本动力。钱永祥便认为：“爱国者对自己国家的处境与前途感受到了强烈的责任心，转成热切的驱动力量，追求平等与包容的政治共同体，目的正是为了实现美好国家的梦想。爱国主义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情感的动力，自由主义展示了爱国之情所必须遵循的伦理边界。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援的。”<sup>20</sup>当这些价值体现于宪法、实践于制度，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指引和规范时，它们就是社会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源泉。<sup>21</sup>

## 五

讨论至此，读者应见到，本文所论述的自由爱国主义，是反思和批判、尊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以及重视平等和正义的。有论者会质疑说，加了这些条件后的爱国主义，早已不是那种充满激情、富感染力、动员力强的集体主义式的理论，既然如此，倡议这样的爱国主义有何意义？

这是很好的问题。可是我们首先得先问：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长期以来，“爱国”在中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能质疑、无须反思的高尚情操，而怎样才叫真正爱国和足够爱国，则由政府视乎政治需求来决定。例如，所谓的爱国行为，常常和“反分裂”、“促统一”、“争取伟大文明

复兴”、“发展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爱国必须爱党”等口号联在一起。久而久之，大家都已习惯，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式的政治动员，大家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跟着官方调子起舞。

无论认同或反感这种操作的人，可能都不太意识到，我们其实可以有别的爱国主义的想像。例如，在自由民主社会，尽管没有中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公民同样会真诚热爱自己的国家，在国家有难时同样愿意为国牺牲。他们的爱国情怀，不是由于官方操控，更不是出于对政党和领袖的崇拜，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政治共同体的建国历史，及宪法承载的价值。当自由、平等、权利、民主、法治这些价值成为制度的基础，并且得到公民的广泛接受，它们就会成为维系多元社会的纽带，并且为公民的爱国情怀提供坚实的支持。

同样值得留意的，是在民主社会，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人们对于应否爱国以及如何爱国，可以自由辩论，甚至可以对国家的重大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和质疑，例如发起各种反战运动。这样的社会环境，会否由于过度强调理性反思，而令人们缺乏爱国热情？不见得。经过自由思考和严肃探究后形成的政治信念，会令个体更加知道自己为何而爱、如何去爱，以及爱的界线和限度。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公民有过度的爱国狂热，而只需要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过好自己的生活，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

最后，有人或会说，既然目前我们无法享有这样的自由环境，爱国主义的论述又被党国牢牢控制，自由主义何不干脆放弃爱国主义，不要和它有任何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结，改为倡议一种世界大同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确

实有不少这样的声音，而“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的理念也开始日益普及。可是在缺乏世界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暂时只能是一种立场宣示，却难以有实质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影响。

我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积极介入爱国主义的讨论，因为它是今天中国最有政治动员力的论述，如果自由主义不去回应人们精神上强烈的爱国需要，同时提出论证去严正反驳那些极端和危险的爱国主张，就会令自由主义变得更加边缘，甚至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失去发言权。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自始至终肯定国家的必要，主张一个有道德正当性的政体是政治忠诚的前提。心系自己的国家和关心自己的同胞，致力推动国家变得更加公正，是自由爱国主义者的应有之义。

注释 .....

- 1 2020年5月8日，疫症肆虐全球期间，我主持了一场名为“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的Zoom线上讲座，由钱永祥先生主讲，并由刘擎和周濂回应，有两千人参与。本文受他们的观点启发，谨此致谢。当晚的完整对话纪录，可在端传媒读到：<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04-opinion-liberalism-patriotism/>。
- 2 这个定义主要参考 Stephen Nathanson, *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pp. 34-35.
- 3 我们平时也会基于不同理由而喜欢别的国家，例如历史文物、自然风光、特色食物等，但这种喜欢和爱自己的祖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情感。
- 4 Keller 指称爱国在性质上是一种“非衍生性”（non-derived）的忠诚，直接基于“它是我的国”这一事实，而不需要独立的道德理想或进一步的忠诚基础。Simon Keller, “Patriotism as Bad Faith,” *Ethics* 115, (2005), p. 569.
- 5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Patriotism*, ed. Igor Primoratz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pp. 43-58.
- 6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p. 46-47.
- 7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p. 57-58.
- 8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0.



- 9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p. 52-53.
- 10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6.
- 11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0.
- 12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2.
- 13 麦金泰尔具体指的，是 Adam Von Trott。他是一名律师和外交官，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参与著名的刺杀希特勒行动，最后事败而被处决。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3.
- 14 “第二种忠诚”的说法，借用自刘宾雁一篇影响力很大的同名的报告文学作品，一九八五年首发于中国大陆的《开拓》杂志。
- 15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56.
- 16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p. 46.
- 17 这个概念借用自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18 感谢钱永祥先生特别为我指出这点。
- 19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vised edition), p.3.
- 20 钱永祥，《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端传媒，2020年7月4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04-opinion-liberalism-patriotism/>。
- 21 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为“宪政爱国主义”。例如 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W. Reh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p. 500。也可参考 Jan-Werner Müller,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当代问题

彭涛 | 作者彭涛为旅欧中国学者，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

**摘要:**多年来,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欧美国家不断地兴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是被成功动员起来。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效地利用了中下层民众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和前景不确定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给西方民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对代议制民主的破坏。要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侵蚀,就得着手消减人们对社会衰退的恐惧、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克服代议制政治功能失调等,致力铲除右翼极端民粹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

## 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几十年来,反对自由民主但表面上很受欢迎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不断地兴起,与之相伴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国更是一直被成功地动员起来。英国脱欧(Brexit)、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成功,都是民粹主义运动兴盛的明显体现。

2022年4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以58.54%的得票率仅以微弱优势击败右翼极端分子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2022年9月11日,在瑞典,由马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demokraterna)在大选中被否决,反移民极右派政党跃升第二大党。克里斯特森(Kristerssons)的右翼、保守的四党联盟能够获得多数席位,也要归功于右翼民粹主义瑞典民主党(The Sweden Democrats)的创纪录(首次位居第二)的成绩。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与民族主义、批评欧盟和部分种族主义的政党“意大利兄弟”

(Fratelli d'Italia)、萨尔维尼联盟 (Lega Salvini) 和意大利力量-贝卢斯科尼 (Forza Italia Berlusconi) 结盟，于2022年10月赢得了选举。<sup>1</sup>

多年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协会和公民倡议在地方、国家以下（州）和国家层面都站稳了脚跟。另外，纯粹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议会中拥有代表，至少是暂时的(或曾经进入议会)。例如：德国的“选项党”(AfD)、英国的“独立党”(UKIP)、瑞士的“人民党”(SVP)、奥地利的“自由党”(FPÖ)、荷兰的“皮姆·富图恩名单”(Pim Fortuyn List)和“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挪威的“进步党”(Fremskrittspartiet)、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与“全国联盟”(Alleanza Nazionale)和“北方联盟”(Lega Nord)、拉脱维亚的“为了祖国与自由/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Tevzemei un Brīvībai/LNNK)、立陶宛的“秩序与正义”(Tvarkairteisingumas)、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党”(Slovenska nacionalna stranka)、斯洛伐克的“人民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Ľudová strana – Hnutie za demokratické Slovensko)。而匈牙利的“青民盟-基督教民主党”(Fidesz-KDNP)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两大右翼政党多年来一直掌控着两国的政府。

在特朗普以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边缘现象，但特朗普的走上政治舞台让这一思潮和运动终于到达了美国的政治中心。<sup>2</sup>特朗普让自己成为“朴实的白人”的代言人，使他成功地赢得了中下层美国白人的青睐。他的“美国优先”理念深受那些感到被华盛顿政治精英出卖的人的欢迎。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右翼选民，大多反对

LGBTQ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对移民的平等立法。特朗普支持者及其意识形态，特别是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极大地鼓励和煽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现象不仅让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登上政治顶峰，而且也助推了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潮流和运动。

近年来，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和党派的兴起并进入政治中心，给既定的民主体制和社会政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人口族群之间的对立与分裂，给“后民主”（post-democracy）和代议制的总体未来带来严峻挑战。<sup>3</sup>

那么，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政党是怎样在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的？其背景原因有哪些？什么叫右翼民粹主义？与其相关的概念和用语（如“另类右翼”、右翼极端民粹主义等）在意涵上有什么相近或区别？右翼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有哪些方案可以用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作为民主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应该怎样来评判民粹主义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尝试着来回答这些问题。

## 二、右翼民粹主义是什么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运动，在西方社会，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党派的崛起几乎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人们通过媒体和选举等活动对该运动也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但对该现象予以系统和专业剖析的文章似乎仍不多见，特别是在中文圈里。

民粹主义（Populism）运动或政党，不一定与一个共同且连贯的价值体系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关联。这让人有时很难确定民粹主义现象，即不容易确认它到底有哪些共同且连贯的价值体系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从特征上来讲，所有民粹主义运动和“抗议政党”也有一定的共同表象与特点，比如，它们的核心是“人民与精英之间明确的对比”。民粹主义者喜欢将自己称为“小人物的代表”。在政界和媒体，通常“亲民、直接民主或迎合当前民意”，以及政党“将问题简单化和搞投机取巧那一套”也被指为民粹主义。<sup>4</sup>

有学者<sup>5</sup>认为，民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强调普通民众的利益、文化特征和自发情绪的政治运动，同时明确结合对统治政治精英的批判”。也有学者<sup>6</sup>针对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比，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将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群体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人民，另一方面是腐败的精英对方。<sup>7</sup>

同样，右翼民粹主义者（right-wing populist）也假设社会分为两个同质群体，即：“纯洁”的人面对腐败、不道德和内心堕落的精英，也就是“人民”与“腐败精英”的黑白二分法。另外，“右翼民粹主义者”一词也成为一系列“仇外抗议政党”的代名词。右翼民粹主义一词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被广泛讨论，它通常被贬义使用。但该词在学术话语中尚未有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含义。<sup>8</sup>

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称谓，即“另类右翼”（Alt-Right）。该词是美国极右翼活动家使用的自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宗旨是，确保所谓的白人、基督教人口的优越性，并“保护”他们免受多元文化社会的

影响。美国“另类右翼”运动反对“社会正义”、“政治正确”、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尤其与“白人至上”的新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穆斯林的仇恨有关。它充当着保守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right wing extremism）之间的纽带。在意识形态上，“另类右翼”可与欧洲的“身份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相提并论。它试图让右翼极端主义话题为广泛的社会圈子尤其是被年轻人所接受。右翼极端主义者及其意识形态在美国“另类右翼”运动中起着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sup>9</sup>

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Far-right politics）这两个词比较模糊，但相互对应。右翼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现象，而右翼极端主义则是一种针对少数群体或思想不同者的暴力现象。两者都旨在破坏社会重要的机构（政府、议会和媒体等），都追求相似的目标，尽管形式或定位不同。<sup>10</sup>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右翼政治光谱的夸大立场与对民主的承诺结合起来，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反对移民（尤其是来自被称为“外国”的文化族裔）、反对被认为有害或具有威胁性的人群和组织，以及国家、行政和政治决策过程中被归类为过于自由和僵化的现有结构。此外，他们要求以绩效为导向的社会秩序，对“基督教西方”的承诺以及对民族文化和身份的保护。这通常与伊斯兰恐惧症和“法律和秩序政策”（law and order）有关。

与二战后的新法西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右翼政党不同，右翼民粹主义放弃了基于种族理论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提出的不是经典种族主义，而是文化种族主义或反民族多元主义的论点。右翼民粹主义也不排斥民主制度，而是公开或暗中反对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或宗教自由等个别因素。

反民主、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党一般被归类为右翼极端主义者。它们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能划等号，但有相似之处，而且经常重叠。因为，在没有完全放弃其根基的情况下，许多右翼极端主义政党成功地采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模式。两股潮流之间达成了影响深远的共识，例如在移民问题和某些族裔群体融入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至少持批评态度，而右翼极端分子则从根本上反对。

归结来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组织及政党在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或共同之处：1、反对既有或现存的政治体制、精英和权威（所谓正派或诚实的“人民”反对腐败的政治统治者）；2、反对少数民族和拒绝社会包容，排外、反多元主义和反平等主义；3、由于怀疑移民和社会政治边缘群体特别具有犯罪的倾向并拒绝遵守法律，因此呼吁对移民采取惩罚性的“法律与秩序”政策；4、批判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避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采取一致的立场。<sup>11</sup>

### 三、右翼民粹主义为什么能够兴起？

欧洲激进右翼的兴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并动摇了大多数老牌民主党（建制派）。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欧美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地利用和煽动了民众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满，而这些不满又源于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社会衰退的恐惧。人们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降低和前景不确定的恐惧，是（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选民认可与支持的动力。

因为害怕，中等及以下阶层的白人和其他感同身受的人群会为他们的挫败感寻找可以责备的对象。右翼民粹主义者操控这种人性的本能，利用不人



道的文宣口号蛊惑和煽动人心，获得人们对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见的认同。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恐惧和愤怒引向他们蓄意塑造出来的敌人形象，如移民、穆斯林、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以及那些“拒绝劳动和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他们不去指出人们生活不顺的原因并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利用这些敌人形象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人否认在逃亡和移民、少数民族和社会分裂方面存在真正的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轻易地相信‘另类右翼’的宣传，而不是帮助受影响的人（移民、少数族裔）排除问题”。<sup>12</sup>

另外，中间派政党（执政的大党／建制派）对“右翼恐惧政治”的成功也负有责任。它们推出的一些政策（如提高税收、大量接受难民、缩减社会福利等）不仅把下层阶级抛在后面，同时也影响到中产阶级。这就助长了愤怒和恐惧，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燃料。这种危险尤其在欧盟南部和北部被广泛地感知。

因全球化而加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与此也密切相关。工作条件发生改变，整个经济部门出现瓦解，传统纽带（如与家庭、工会、政党和教会等机构的联系）开始放松，等等。这一现代化进程让很多人成为长期失业和生活贫困的失败者，同时也让那些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中产阶级）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会倒退。<sup>13</sup>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越来越面临压力。各个国家被迫竞争最佳的区位条件，这往往会压低工资和社会标准。其后果是失业、福利的削减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sup>14</sup>

此外，自 196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生的文化变革，也是右翼民粹主义

者选举成功的源泉之一。首先，移民的涌入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让不同族群的文化区分凸显出来。其次，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秩序观念，逐渐被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个体化）所替代。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感到自己的文化和个人身份（identity）被剥夺了，不安与危机感陡增。

支持或倾向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大多数是经济上直接受负面影响的所谓“现代化的失败者”。对社会衰退的恐惧，加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没有既定政党和政客作为自己代表的感觉，使得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接受了民粹主义的信息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并不直接源于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而是源于左、右主流温和政党在危机中作为政治体系传输带的失败。在争取多数选民的竞争中，温和政党无法说服人们它们代表与右翼民粹主义不同的政治理念，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相似。<sup>15</sup>

结构性的变化使执政的温和党派更难履行其作为民主竞争的代表机构和承担者的传统职能。而且，它们将决策责任转移到跨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也导致其合法性链（legitimacy chain）越来越长，透明度越来越低。执政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将其政治的呈现和媒体表达与自己技术官僚的现实脱钩。而选民会注意或觉察到这种矛盾和错位。这样，毫不奇怪，一个缺乏执行力、迷失于自己措辞里的政治阶层（中间派政党）的形象就被广泛地接受了。<sup>16</sup>

同样，对于中欧和东欧来讲，社会结构性的变革也是促成其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动力。柏林墙倒塌后，中欧、东欧国家指令下的社会主义开始崩溃，

导致公共生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以及经济市场化。这些变革对社会造成了损害，使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未能顺利进行。这也就为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的孕育和兴盛提供了温床。<sup>17</sup>2000年代中期，中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国家在巩固自由民主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社会政治转折来得太突然，政治路线有了新的方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越来越多。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那里的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将自由民主制度缩小到纯粹的多数投票，来使自由民主制度失去合法性。<sup>18</sup>

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失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中欧、东欧，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失望，尤其是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精英”。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变革，加剧了人们的迷失感和恐惧。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使曾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感到处于不利地位。民粹主义宣传的“让国家重现昔日辉煌”的承诺，对那些想恢复他们曾经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sup>19</sup>

#### 四、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威胁

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给西方民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潜在的威胁。但从中期来看，反对党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尚未或不会对民主制度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意大利、奥地利甚或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完全可能对民主政治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右翼民粹主义隐藏的最大危险在于，破坏政治制度的共识特征，并因此阻止对所有社会群体的包容。危险更在于，因为既定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右翼极端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建立一个由专制“领导人”控制的国家。拉丁美洲或东欧历

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表明，民主化了的国家也存在着向专制国家转变的危险。其中，俄罗斯由民主转向威权，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sup>20</sup>

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执政权，欧洲统一的基础越来越动摇。欧盟似乎正处于下行的自动扶梯上。英国2021年退出欧盟（脱欧），仅仅是个开始。2021年10月，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Mateusz Jakub Morawiecki）放弃承认共同规则的基本共识，使欧盟陷入危机。波兰不想再承认欧洲法律的优先地位。波兰的桀骜不驯得到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喝彩。欧洲法律已在匈牙利被打破。欧洲议会将匈牙利定义为“不再民主治理”的“选举式威权国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也是右翼民粹极端主义分子破坏民主的一个典型事例。该事件对美国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特朗普与美国另类右翼运动有着共生的关系。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极端政策（如移民政策计划、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他的“法律与秩序”政策），几乎以教科书的形式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言论和议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动员了美国传统的激进右翼和白人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同时也成功地将美国“激进右翼的传统”与“新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

右翼民粹主义者可以在自己不掌权的情况下有力地塑造政治格局，对公众意见造成广泛影响。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吸引了几乎所有其他政党的选民。因为，他们成功地让人们都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政治精英和外来族群的背叛与压力。

尽管，政治学最初经常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对政治格局的一种“丰富”和“有用的纠正”。但后来，怀疑和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试想，如果右翼民粹主义仅仅是对现存政治的一种纠正，右翼党派要么会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于政党谱系之外，要么它们会逐渐适应主流思潮并放弃最初的极端立场。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似乎都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和立场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中间派政党所借鉴和采用。不难观察到，老牌政党（传统建制派）在媒体亮相和策划方面正在接近右翼民粹主义者，例如：更多地根据领导人的情况量身定制竞选活动，更加注重政党或选民基础的意见，政党本身则更加退居幕后。政治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中“上演”，传播对于政治成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sup>21</sup>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老牌政党媒体经验的政治家也认可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只是采用了其修辞中的成功元素。<sup>22</sup>

## 五、如何降低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侵蚀

欧美国家若要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影响力及其对民主的侵蚀，就得从促成其兴起和成功的根源上着手，尝试着找到消减它们的方案和办法。虽然，导致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成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成因也不尽相同，但是，欧美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政治口号等方面却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和共同之处。

首先，在文宣和鼓动上，民粹主义者吸引选民的绝活是：利用他们对生活方向的迷失、对自己地位的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政治的疏远感，以

此诱导和唤起他们对政治精英、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满与愤怒，同时把自己扮演成“小人物的代表”和为其讨回公道的救世主。因此，在话语和文宣方面，主流民主党派需要找到打破右翼民粹主义这类神话的途径和方式，比如：明确有力地将社会冲突重新解释为纯粹的文化或民族冲突，拒绝将文化差异（以及如何处理它）化简为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

其次，主流党派必须向公众开放，需要打破当今受上层控制的会员和官方政党的模式，并考虑代议制民主是否（或以何种形式）可以通过直接民主而得到补充。这样，右翼民粹主义者就不会完全抓住这一（对直接民主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党与选民之间需要一种相互倾听和接近的新文化。<sup>23</sup>“政客亲民”应该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追求民意，而是要倾听民意，并且知道自己选民的生活现实，或者至少不回避它们。化解冲突是良好民主制度的核心能力，倾听民意和接近选民则是这一能力的体现。民主制度的一个要素是确保几乎从不互相交谈的人们得以交换意见——首先是选民的代表。<sup>24</sup>

另外，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制定政策，更加关注社会的经济和凝聚力。福利国家在过去越来越不重视这种凝聚力，这也导致一些人群倒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果政治家不能建立一个基于平等机会和公平的社会，民粹主义的可能性就无法降低。<sup>25</sup>

值得关注的是，直接民主因素也应该得到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更多地是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来实践，公民借此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事务。直接民主有助于在表达和影响的可能性之间取得平衡，可减少紧张局势。

由于人们对政治的不满、对外来族群的仇视和对社会缺乏信任，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变化与矛盾直接相关，而且这些结构性问题会长期存在下去、甚至会有所加剧——如失业、福利国家福利的削减、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衰退等；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要减少或打消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不信任与不满、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成功率，将是一个长期、艰巨且不一定取得理想效果的进程。这也考验着主流民主政党及其政府有无能力和毅力持续地解决和克服上述结构性问题。

民粹主义以多种形式存在，有右翼的和左翼的，有极端和较为温和的。它可以毒害民主，以及“从内部”挖空民主。但从民主制衡与监督的角度来看，在较小的剂量下，民粹主义还是具有治愈作用的。<sup>2627</sup> 极端的民粹主义对民主肯定有害，但温和的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是有纠正功能的。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矛盾关系，民粹主义运动会攻击代议制政治的功能失调。代议制政治的代表、复杂性和不透明性，通常会转变为民粹主义攻击的目标。因此，民粹主义被政治学者视为代议制健康状况的衡量标准，它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哲学、制度和实践的消极反应。<sup>28</sup>

注释 .....

1 Vgl. Oliver Jauernig: *Wie wir dem Rechtsruck in Europa begegnen müssen*, <https://www.vorwaerts.de/blog/rechtsruck-europa-begegnen>, Abgerufen am 05.02.2023.

2 Vgl. Dr. Christian Lammert: *Rechtspopulismus in den USA und in Europa im Vergleich*, <https://www.bpb.de/themen/rechtsextremismus/dossier-rechtsextremismus/243794/rechtspopulismus-in-den-usa-und-in-europa-im-vergleich/>, Abgerufen am 08.02.2023.

3 "A post-democratic society is one that continues to have and to use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but in which they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rmal shell. The energy and innovative drive pass away from the democratic arena and into small circles of a politico-economic elite." 后民主，是充分运作的民主系统（包含定期选举、政党轮替与言论自由），但其民主运作却受到限制。一小部分的菁英实际控制关键决策、民

- 主议程及建制。“Five minutes with Colin Crouch”.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5 February 2013; Colin Crouch. *Post Democracy*, 2004; Colin Crouch. *Is there a liberalism beyond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Network, 5 May 2011.)
- 4 Vgl. Lars Rensmann: *Populismus und Ideologie*. In: Frank Decker: *Populismu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nützliches Korrektiv?* Springer, 2006, S. 59.
- 5 Di Tella 1995, 985
- 6 Cas Mudde 2004, 543
- 7 Vgl. ebd.: Dr. Christian Lammert.
- 8 Vgl. Richard Stöss: *Der rechte Rand des Parteiensystems*. In: Oskar Niedermayer (Hrsg.): *Handbuch Parteienforschung*. VS Springer: Wiesbaden 2013, S. 575.)
- 9 Vgl. bpb: *Rechtsextremismus, Glossar Alt-Right*, <https://www.bpb.de/themen/rechtsextremismus/dossier-rechtsextremismus/516444/alt-right/>, Abgerufen am 10.02.2023.
- 10 Vgl. Wilhelm Heitmeyer und Thorsten Jantschek: *Der Begriff ‚Rechtspopulismus‘ ist viel zu verharmlosend*. In: <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 DLF Deutschlandfunk, abgerufen am 05.02.2023.
- 11 Vgl. Florian Hartleb: *Rechts- und Linkspopulismus: Eine Fallstudie anhand von Schill-Partei und PDS*. VS Verlag, 2004, S. 143, S. 125–127.)
- 12 Frank Decker: *Die popul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Theoretische und länder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In: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in Europa.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2006, S. 22 ff.
- 13 Vgl.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Rechtspopulismus: Erscheinungsformen, Ursachen und Gegenstrategien*,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rechtspopulismus/240089/rechtspopulismus-erscheinungsformen-ursachen-und-gegenstrategien/>, Abgerufen am 11.02.2023.
- 14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5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6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7 Marcel Lewandowsky (Mehr zum Autor), *Rechtspopulismus: Erscheinungsformen, Ursachen und Gegenstrategien*,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rechtspopulismus/240089/rechtspopulismus-erscheinungsformen-ursachen-und-gegenstrategien/>, Abgerufen am 11.03.2023 )
- 18 *Aufstieg des Populismus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https://cordis.europa.eu/article/id/442600-examining-the-rise-of-populism-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de>, Abgerufen am 10.02.2023.
- 19 Vgl. ebd.



- 20 Vgl. Frank Decker: *Die popul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Theoretische und länder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In: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in Europa.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2006, S. 22 ff.
- 21 Vg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Rechtspopulismus#cite\\_note-decker2006-2-14](https://de.wikipedia.org/wiki/Rechtspopulismus#cite_note-decker2006-2-14).
- 22 Vgl.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nützliches Korrektiv?* Springer, Wiesbaden 2006, S. 10-34.
- 23 Vgl. Frank Decker: *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s%3A%2F%2Fwww.europaimunterricht.de%2Ffileadmin%2Feuropa%2Fimunterricht%2Fpdf%2FUnterrichtseinheiten%2Fbis\\_2017\\_rechtspopulismus\\_und\\_rechtsextremismus\\_in\\_europa.pdf](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s%3A%2F%2Fwww.europaimunterricht.de%2Ffileadmin%2Feuropa%2Fimunterricht%2Fpdf%2FUnterrichtseinheiten%2Fbis_2017_rechtspopulismus_und_rechtsextremismus_in_europa.pdf), Abgerufen am 10.02.2023)
- 24 Vgl. Roger de Weck: *Die Stunde der Demokratie*, [https://www.zeit.de/2022/27/rechtspopulismus-demokratie-journalismus-afd?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2F](https://www.zeit.de/2022/27/rechtspopulismus-demokratie-journalismus-afd?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2F), Abgerufen am 02. 02.2023.
- 25 Vgl. ebd.: Frank Decker: *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
- 26 Vgl. Florian Hartleb, *Populismus als Totengräber oder mögliches Korrektiv der Demokratie?*,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75856/populismus-als-totengraeber-oder-moegliches-korrektiv-der-demokratie/>, Abgerufen am 20.02.2023.
- 27 Vgl. Florian Hartleb, *Populismus*, in: Martin Hartmann/Claus Offe (Hrsg.), *Politische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2011, S. 55.
- 28 Vgl. Paul Taggart, *Populism*, Buckingham, PA-Philadelphia 2000, S. 110-114.

台湾  
视角

曾建元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淡江大学资  
讯传播学系兼任副教授、华人民主书协会理事长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美国促成日韩堵中国的成形 与围堵中国态势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为首各自领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形成全球冷战结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分别推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持至今，但亚洲则仅有昙花一现的东南亚公约组织，很大原因，出于东亚各国对于日本的历史情结。物换星移，在苏联崩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普世价值体系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的安危更牵动着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运转，日韩的和解，正为当代印度太平洋战略架构的构筑，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势的成形，在东北亚创造了条件。

## 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起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次年6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大韩民国，两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当机立断，发布《海峡中立化宣言》（Korean War Statement），而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理据，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协防中华民国，自此断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台湾统一中国的野心。<sup>1</sup>

美国意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赤化全球的危险，于是在欧洲和亚洲布建防线进行围堵，在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与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对峙，在亚洲，则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有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之间的个别军事同盟的建立，各以1952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53年《韩美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另则有1954年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集

体安全体系，加上印度在南亚的不结盟立场而事实上成为缓冲区，由此乃形成了稳定的全球冷战结构。1960年代美国看见联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争取共产主义国家领导地位而引发的冲突与矛盾，乃有“联中制苏”大战略的调整。<sup>2</sup>而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发挥牵制苏联的作用，美国与其盟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与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席次代表权，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享有否决权，美国进而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但基于道义，仍依《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以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发展，维持对台湾最低限度防御性的安全承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台，破坏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优势。<sup>3</sup>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在短暂的国际经济制裁后，仍于1991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而从此进入全球自由贸易经济体系，更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从此经济成长超英赶美，一日千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未因此走向民主转型理论家的乐观预期，即因为中产阶级兴起而形成公民社会，进而涌现参政维权的政治气候，终而迫使专制政府开放政权，而继自由化后展开民主化。相反，中国因为经济上的成就，反而获得政治正当性的新基础，党国威权统治和民粹政治受到多数人民的容忍甚至支持。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更因党国资本主义经济上的操作，利用权力榨取并实际掌握了主要的国民财富，从而拥有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得以进一步对内发展其结合电子监控系统的社会控制与党国统治机制，形成现代君主制与电子极权主义。<sup>4</sup> 中共彻底消灭了萌芽中的公民社会，全面镇

压进步人士与少数民族平权运动，再利用民族主义驱动对外扩张，不仅在地缘政治经济上以跨越欧亚旧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擘画，而有意恢复传统中国朝贡体系下的霸权地位，更以其新兴崛起的全球影响力，摆明挑战联合国全球治理所凭借的普世价值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变异为巨兽，让周边邻近各国感到惴惴不安。东亚各国的石油能源生命线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台湾海峡、东海到日本海。中国直接影响的航道为南海、台湾海峡与东海，并且主张对以上该海域拥有主权，意欲全面占有。位于东北亚海上的日本以及东亚大陆末梢的韩国，居于石油能源生命线的最远端，因此对攸关国家生存发展的南下航道的自由通行权问题十分敏感。1895年台湾乙未战争期间，日本即曾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名义，向要求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的俄、德、法三国和相关国家通告：“帝国政府认为台湾海峡全属各国公共之航路，故宣言该海峡并非独属日本国所管辖或专有”，以交换各国不干涉台湾的主权交接，由此可见台湾海峡及与其邻接的海域，在西太平洋石油能源生命线上，乃居于枢纽的地位，自近代国际法秩序进入东亚，就不容许任何一国独占特定海域，控制航道，而威胁到其余各国的生存。

## 印太战略的形成

日本与韩国基于国家生存的考虑，长期依附于美国的保护，在感觉到美国关于中国政策的变化时，乃争相抢先于美国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日本自1979年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大量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在此同时，中国也始终以日本在第二次中

日大战的战争责任对日本持续进行指责和民族感情勒索，具体表现在强烈抗议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拜谒奉祀有侵华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问题上。<sup>5</sup>韩国面对朝鲜侵略的威胁，则有北方政策之制定，期待中、苏两国的支持与施压，促成其与朝鲜的和解。<sup>6</sup>和台湾一样，韩国因为中国对其开放市场而获得经济发展上的巨量利益，中国也因对于韩国在地缘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力，相当程度恢复了清朝时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强势地位，多少伤害了韩国的民族自尊心。

安倍晋三于2006年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即开始部署调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格局，提出了从俄属远东、沿中国周边延伸到欧洲的外交伙伴关系与后勤联系概念的自由与繁荣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大战略，主张建立亚洲海洋民主国新联盟，并基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与印度四方的领导人峰会，形成亚洲版的小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7年8月22日，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演讲（两洋交汇）（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首次提出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洋自由和繁荣有机融合的愿景，与印度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中互为犄角。安倍晋三显然有意终结在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下区域事务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吉田（茂）主义时代。安倍晋三复出之后，更全力恢复他的政策主张，持续推动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以及印太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大战略。他在2012年12月，以《安全钻石》一文重新誓师出发，主张以对「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共同承诺，建构将澳洲、印度、日本与夏威夷结合在一起的“从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区”。2016年8月，安倍晋三利用出席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国际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的机会，正式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战略，作为日本对外援助的准

则。<sup>7</sup>

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及印太战略的提出，不言而喻，乃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假想敌，而习近平2012年2月大国外交战略与11月中国梦的提出，为印太战略的正式登场做出了铺垫。2017年1月，高唱“美国第一”的川普就任美国总统，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浩于秋天向美国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就印太战略构想献策，令其感到耳目一新。提勒森乃于当年10月在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定义下个世纪的美国与印度关系》演说，阐述“印太”概念，并强调美国将与日本、澳洲、印度等三个民主国家发展更进一步的接触与合作关系。11月6日，川普与安倍晋三在东京宣示，愿与地区内任何共享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的国家合作，并保证将在三个基础上共事：提升基本价值、追求经济繁荣，以及和平与安定。12月美国总统府白宫发布《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确立了“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为国家安全战略，自此而形成了从中东霍姆兹海峡、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宫古海峡的两洋战略安全网。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宣示将透过战备、伙伴和网络化区域等途径，确保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承诺，国务院则另于11月4日发表《自由开放印太：促进共同愿景》报告，强调将基于自由主义，透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方式，积极宣传推展“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理念，强化并扩张美国与盟邦的伙伴关系。<sup>8</sup>2021年1月，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延续了川普的印太政策，在10月举行的线上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构想，并于次年2月11日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揭示其主要战略目标是“促进一

个更具连结、繁荣、安全与韧性的自由开放印太”，其战略途径则在于“强化美国角色，并建构其与盟邦伙伴和区域机构的集体能力”，当中特别点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中尤以在印太区域最为严重。<sup>9</sup>5月23日，美国等13个印太国家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作为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印太经济架构聚焦于四大主轴，包含：“贸易”、“供应链”、“干净能源和减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反贪腐”，当中影响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最为深远的，是规划全球产业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企图使中国无法再将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中世界工厂地位所汲取的暴利，大量投入到发展全球霸权、危害区域安全与文明价值体系。<sup>10</sup>10月12日，拜登再公布《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直接而明白地将中国定性为唯一企图修正现有国际秩序，且具备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竞争对手。<sup>11</sup>

印太战略为自由与繁荣之弧建立国际政治与军事合作的架构，再有印太经济架构作为支撑，将中国与其一带一路大战略整个围堵在欧亚大陆之中。

## 日韩和解与东北亚安全

东北亚的日、韩两国，宿怨累积上千年，盖因日本出入东亚大陆，必定要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朝鲜乃深受来自日本的安全威胁。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对朝鲜民族自尊伤害极大。日本提出印太战略获得美国响应后，2017年10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重启，日本在印太战略中成为领袖国家。与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有所龃龉，既不利于日本的领袖角色定位，亦势必会在东北亚防御合作机制上出现破口，因此日韩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和解，乃有其迫切需要。



2022年3月，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他一改前任总统文在寅的低调亲中风格，旗帜鲜明地投向印太战略。6月西班牙马德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时，美国邀请韩日两国举行三国场边峰会；9月21日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尹锡悦首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双方就日本战前强制征用朝鲜劳工等问题，共同认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日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必要性。<sup>12</sup>11月15日至16日，拜登、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利用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努沙杜瓦（Nusa Dua）举行的G20峰会之便，在柬埔寨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并发表《金边声明》（Phnom Penh Statement），同意建立三国经济安全对话机制。<sup>13</sup>12月28日，韩国外交部发布《自由、和平、繁荣之印度太平洋战略》，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区域现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韩半岛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安全繁荣密切相关。

2023年2月27日，美日韩三方在美国檀香山首次进行三国经济安全对话，重点在落实印太经济架构下全球产业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3月1日，在韩国“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上，尹锡悦发表历史性的重要讲话，对日本重新定位，肯定日本已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方面携手合作的伙伴。尹锡悦宣示，“必须与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合作，为扩大自由做出贡献”。这一段话正式宣告韩国与中国的割席。3月6日，尹锡悦就日治时期强制劳动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宣布将于行政安全部下设日帝强制征工受害者支援基金会，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用，资金则由韩国和日本的企业捐赠。该方案给了日本面子，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乃呼吁日本企业向该基金会捐赠，间接达到赔偿目的。3月15日，尹锡悦访问日本，与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宣布日韩关系正常化，重启中断11年的穿梭外交领袖互

访，也预告将重启外交和国防安保对话，日本也顺势解除了半导体重要制造材料禁止出口韩国的措施。<sup>14</sup>

4月26日尹锡悦访美，和拜登签订了被喻为《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升级版的《华盛顿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将韩国纳入美国的核子武器保护伞之下，而更加强化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sup>15</sup>

东亚形势的转变，先有安倍晋三的倡议和川普的跟进，最终则因尹锡悦的卓见和勇气，而使印太战略得予以该处合龙。诚如安倍晋三所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sup>16</sup>日本海以南，就是东海和台湾海峡，而守卫这片海域的，正是台湾。一旦台湾沦陷，日韩就会如瓮中之鳖，任人宰割，而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只能做困兽之斗。因此印太战略中，台湾地位一如关中，得台湾者得天下。日韩美绝对不容台湾受制于中国，所以印太各国实有必要将台湾纳入为对话伙伴甚至进入协作机制。尹锡悦因主张台湾防卫属于国际责任，近日招惹了中国，两国互召大使表达抗议，<sup>17</sup>这也暴露出两国基本价值立场的差异，反衬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

东北亚的防卫，另有一事件值得重视，即6月2日在韩国首尔国会图书馆礼堂举行的满洲复国研讨会，与会者并于会后由韩国历史领土财团主席张桂黄与满洲流亡政府总理梅凤杰领衔签署了《首尔宣言》。抗战时期由日本扶植建立的满洲国，并不是一个满洲民族国家，其建国理念“五族协和”，是指汉、满、蒙古、日本、朝鲜等五个民族的共存共荣。<sup>18</sup>韩战的经验告诉我们，朝鲜半岛和台湾有唇齿相依的关系，相互可收围魏救赵的效果，一旦中国发动侵台战争，朝鲜极有可能趁势南侵，所以牵制背后的

中国，有助于阻止朝鲜的蠢动，而满洲国复国运动的论述和倡议，则有可能在日后对东北三省军民产生号召作用，成为裂解中国和分层渐进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起点。

## 美日韩大卫营峰会：拜登的历史成就

2023年5月21日，拜登在出席于日本广岛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G7）峰会场边，与岸田文雄及尹锡悦进行三方会谈，当面邀请两人到华盛顿进行正式的三方峰会。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袖举行了历史性的正式峰会。戴维营会议将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串联起来，建构出日韩伙伴关系此一三方共同合作机制。战后因日韩间的历史问题而难以在两国之间直接建构的同盟关系，终于因为尹锡悦对于日韩和解的豁达大度、日韩两国对中国强权扩张的共同威胁感，以及美国的鼓励，终于能以智慧排除历史障碍，在美国的中介下实现了。美日韩三国首脑于会后发表了三个文件：《戴维营原则》（Camp David Principles）、《戴维营精神：日本、大韩民国与合众国联合声明》（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与《三方协商承诺》（Commitment to Consult），为三国未来中长期合作订下了明确准则。<sup>19</sup>

《戴维营原则》系关于三国合作的中长期指南，宣示将在尊重国际法、共同规范与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承诺支持东协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致力于朝鲜的无核化、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同意提高三方安全、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程度，坚持和平解决有关主权、领土完整的争端等。

《戴维营精神》则宣示就韩、美、日共同愿景和朝鲜问题建立具体的磋商机制，政府首长和外交、国防、国家安全等主管官员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谈；与东协和太平洋岛国保持合作；反对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的海上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危险和挑衅行为；重申支持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认定中国对南海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南海仲裁案》（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申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要求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宣示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推进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对话等。

《三方协商承诺》则约定，就美日韩共同利益和安全带来影响的地区挑战、挑衅、威胁，如通商纠纷、朝鲜飞弹威胁、严重海上挑衅行为、经济或资讯安全威胁等，三国进行情报交换，迅速协商制定应对方案。

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在大卫营峰会后更获得巩固，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太架构东北亚防线终于合龙。其战略合作的地域范围不限于东北亚，而是整个印太地区，由此可见“小北约”在美国的串联与领导下已经隐然成形。台湾无疑是欢迎这一局面的。新冷战的格局下，台湾虽然又成为民主世界前线，但这也表示，台湾今后将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不会一国孤独地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攻武吓。台湾也必须警觉并认知到，中国有事，就是印太有事，台湾的国际责任就是守护好台湾海峡，对于中国的变局要有所准备与因应，作为印太架构的非正式伙伴，对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风险，要争取自己的角色，也要有所承担。

## 注释.....

- 1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台北:文英堂出版社,民国85(1996)年9月,页184。
- 2 李登科,“五十年的‘中’、美、苏(俄)关系”,《中国大陆研究》,第42卷第10期,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民国88(1999)年10月,页47-54。
- 3 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台北:文英堂出版社,民国85(1996)年9月,页392-399,459。
- 4 伊能嘉矩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译,《台湾文化志》,下卷,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3月,页555。
- 5 林煥廷“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影响因素之研究”,《探索与展望》,第5卷第8期,新店:法务部调查局,2007年8月1日,页68-70。
- 6 罗颖熹,“阳光明媚的再来:韩国北方政策、阳光政策的回顾与展望”,《香港01》网,香港:香港01有限公司,2018年2月21日。
- 7 Michael J. Green(麦可·葛林)著,谭天译,《安倍晋三大战略》,新北: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7月,页175-180。
- 8 Michael J. Green(麦可·葛林)著,谭天译,《安倍晋三大战略》,页180-181。
- 9 江今叶,“印太战略新轴线7,延续重返亚洲政策,拜登强化印太战略”,《中央通讯社》网,台北,2023年5月29日。
- 10 许峻宾,“印太经济架构与APEC的连结,以及未来的挑战”,《亚太经济合作通讯》,第259期,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2022年8月,页12-14。
- 11 钟志东,“拜登《国家安全战略》与台海安全”,《国防安全双週报》,第66期,台北: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2022年11月8日,页11-16。
- 12 张子杰,“岸田文雄与尹锡悦举行会谈,同意改善日韩关系”,《香港01》网,香港:香港01有限公司,2022年9月22日。
- 13 张黎莉,“韩美日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强调对朝合作”,《韩联社》网,首尔,2023年9月29日。
- 14 黎蜗藤,“日韩和解,尹锡悦彰显领袖风范”,《上报》网,台北:上昇整合行销有限公司,2023年3月19日。
- 15 李明峻,“美韩华盛顿宣言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远景论坛》,第40期,台北: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2023年3月19日。
- 16 安倍晋三,“新时代台日关系”影响力论坛,台北:财团法人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2021年12月1日。
- 17 陈庆德,“称台湾是国际议题,尹锡悦为何‘重拾抗中初心’大谈台海问题?”,《关键评论》网,台北,2023年4月25日。

- 18 满洲文化协和会,《韩国国会——满洲复国会议纪事(7): 签署满韩〈首尔宣言〉》,《北京之春》,第362期,纽约,2023年8月。
- 19 徐爱英,“韩总统室: 18日戴维营会晤将成为韩美日关系分水岭”,《韩宣网》,首尔: 海外文化弘报院,2023年8月18日。



听泉 作者：郑玉禧

索菲亚·麦克莱纳  
斯尔杰·波波维奇  
约瑟夫·赖特  
言晓义译

索菲亚·麦克莱纳 (Sophia McClennen)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比较文学教授

斯尔杰·波波维奇 (Srdja Popovic) 是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 (CANVAS) 的创始人，也是科罗拉多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的讲师

约瑟夫·赖特 (Joseph Wright)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使非暴力运动更有力量



**编按：**过去几十年中，民众非暴力运动已经成为通向民主的最可靠路径。然而，并非所有非暴力运动都取得了成功。如何使非暴力运动变得更加锐利、有效？在这篇文章中，三位作者专门探讨了一种他们称之为“致困行动”的战术。他们的研究表明，使用这一战术有助于提升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机率。该文 2023年1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1 January 2023)。

1982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期间，波兰东部小镇瑞尼克(Swidnik)的居民决定带着电视机去散步，以此抗议政府的媒体宣传。活动人士旨在表达他们对共产国家一手遮天控制所有媒体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鼓励个人进行私下抵制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如果你坐在家中客厅里不看新闻，谁会知道呢？但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种抵制公开可见呢？如果把对政府宣传和举国信息控制的不满明白无误地公之于众呢？

最终，活动人士决定在重要的晚间新闻播出时段，将他们的电视机带到街上，用手推车“遛”，就像是推婴儿车一样。不久之后，在这个时段走在镇上的人们，都能看到街坊邻居推着电视机，一边遛弯儿一边有说有笑，利用以前花在收看官方新闻上的三十分钟来互相问候、闲聊，并一起分享站出来反抗政权的那份刺激。

“遛”电视机的做法不仅富有创意，而且具有感染力。这是一个很棒的“梗”，很快这种做法就传遍了波兰的大街小巷。波共政府感到莫名惊诧，权衡再三，却无法逮捕任何人，因为并没有法律禁止波兰公民将电视机推到街上。政权能做的就是将晚上10点的宵禁提前到了晚上7点，从而迫使每个人都呆在家里，并通过这一举动显示出它无力控制批评，

这下波兰公众更忍无可忍了。

推车抗议活动使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对抗议者置之不理吧，只会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显得政府软弱无能，并加剧抵抗；镇压抗议者吧，仅仅因为推着电视机遛街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就出手，这会让当局显得过于强硬和压制。通过下令提前宵禁来遏制抗议活动，这种笨拙的做法使政权丧失了公信力，扩大了批评政府的波兰公民基础，并使当局显得荒谬可笑。他们再也不能自称是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了。这种叙事一旦被打破，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变得很脆弱，而最终政权垮台了。这一特定类型的非暴力战术即是所谓“致困行动”(dilemma-action)。它旨在为打击的对象创造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对手陷入“双输”情境：无论怎样应对，都将遭受骂名，最终威信扫地。精心选择的致困行动会利用人们广泛的共识，利用不可预测性和幽默感来颠覆官方叙事，并引来广泛的公众支持。

然而，除了能当成不错的谈资讲讲之外，这种战术是否行之有效？它是否有可测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致困行动”可以使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提高11%至14%。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已近乎两倍高(非暴力成功的几率为50%，暴力运动成功率仅为29%)。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致困行动”可以进一步增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使其几率接近三分之二(64%)。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非暴力性社会抗议一直是通向民主最可靠的途径。<sup>1</sup>尽管最近出现了民主的倒退，但持续的非暴力动员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民主存续之路，尤其是在新的民主国家。<sup>2</sup>

当然，非暴力动员运动也可能失败。自1905年以来，它们的完全成功率为47%(占320个案例中的150个)。在1974年以来的、更晚近的所有案例中，即从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失败率(定义为任何不完全成功的情况)为53%(占258个案例中的137个)。在2010年后，公民抗争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普及水平”，但其有效性开始下降。<sup>3</sup>

我们知道，非暴力群众运动比暴力运动要有效得多，但为什么有时非暴力运动会失败呢？这是否跟他们的战术有关系？非暴力本身是一种广泛的战术，但仅仅说一场运动是非暴力的，并不足以说明它实际上是如何追求其目标的(当然，除了避免使用暴力)。例如，同为非暴力运动，但着重于抗议的运动与那些更具破坏性的直接行动(如罢工)的运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有关特定非暴力战术有效性的研究相当有限。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几个案例之间的比较上，或研究运动内部的战术变化。除了有人建议运动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或许可以更加有效之外，对于特定类型的战术及其对运动成功所起的作用，相关研究寥寥无几。

话虽如此，人们对评估创造性战术的影响越发有兴趣。通过借鉴一些个人轶事，诸如史蒂夫·克劳肖(Steve Crawshaw)的《街头精神：抗议与恶作剧的力量》，或各类活动家培训指南，如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和戴夫·奥斯瓦尔德·米切尔(Dave Oswald Mitchell)的《美丽的麻烦：革命工具包》，或由“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CANVAS)出版的《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南》，史蒂文·邓科姆(Steven Duncombe)和西拉斯·哈雷拜(Silas Harrebye)提供了有关创意活动与传统活动形式有效性的对比数据。<sup>4</sup>他们发现，在几乎所有量化指标上——兴趣观察、请愿签名的收集数量、传单

分发的速度和规模、对活动人士的反应等方面——创意活动在实现意愿目标方面都胜过传统方法。

我们的研究旨在为这些贡献添砖加瓦，对致困行动的功效进行介绍、概念化并加以量化分析。然后，我们使用非暴力运动中致困行动的全球数据，评估这一战术对运动成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致困行动可靠地促进了运动的成功。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一战术如此有效呢？

## 致困的力量

在对印度进行殖民占领期间，英国当局垄断控制着日常必需品——食盐，开征盐税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分配，着眼点是食盐的出口价值。独立运动本可以对这种状况愤起抗议，但却选择了更具创意的做法。在甘地的领导下，独立运动人士们奔赴海岸，蒸发海水自制盐巴。抗税和不服从行动很快在印度蔓延，并影响了盐业以外的许多事物。

英国当局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可以坐视自己失去对食盐(及其他方面)的管控，也可以镇压抗税行为。他们选择了后者，逮捕了数千人，在此过程中损害了殖民政权的合法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令独立运动如虎添翼。

甘地关于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独特思想开始声名远播，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设计创意性致困行动的大师，用致困行动让对手进退两难从而促进他的事业。

我们记录了历史上世界各地的致困行动案例，但对它们下功夫进行系统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乔治·莱基(George Lakey)是第一位将致困行动的成功经验撰写成篇的活动家，他在1987年描述了他所称的“致困示威”。加拿大活动家菲利普·杜阿梅尔(Philippe Duhamel)读了莱基写的文章，于2001年设计了一次“致困示威”，旨在抗议加拿大政府参与美洲自由贸易协会(Free Trade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s)。抗议者手持一把“巨型钥匙”，在渥太华国际贸易和外交事务部展开了一次“搜查和扣押行动”，他们要求该部门允许他们查阅贸易条约草案。抗议者被逮捕，从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拒绝公布草案？为什么要保密？一周后，抗议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草案被公之于众。杜阿梅尔后来就此事的来龙去脉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战术说明。<sup>5</sup>

在莱基和杜阿梅尔看来，这一战术的核心是两难困境，即通过一种直接行动战术，迫使对手面临一个双输的抉择。与所有直接行动一样，致困行动是在传统的倡导活动之外起作用的。它们旨在让目标做出回应。典型的抉择是在对活动人士的取态上：镇压吧，显得过于粗暴；不作为吧，又显得太软弱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都会失去公信力，而运动则会备受鼓舞。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塞尔维亚的奥托波尔(塞尔维亚语Otpor，意思是“抵抗”)运动中，人们给一只油桶贴上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画像，然后将油桶放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购物区。路人只需往油桶里投个硬币，就可以用棒球的棒槌打米洛舍维奇的脸。活动人士称之为“投币换取变革”，他们促使观众们认识到，在他们所生活的政权之下，政府更关心的是维护独裁者形象，而不是让人们和平地表达自我。警察闻讯赶到

后，不得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他们选择“逮捕”油桶，这提供了绝佳的拍照机会，使警方——连带着米洛舍维奇——显得荒唐可笑。奥托波尔运动本可以走传统的抗议路线，却凭着一个有趣、引人注目的致困行动引起了公众对政权镇压的更大关注，并为反对政权而进行的非暴力运动赢得了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致困行动的定义(它是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的培训经验基础上建立的)，要求活动人士要借助被广泛认同的信念。以“投币换取变革”的致困行动为例，它所突显的信念是：人们应该能够和平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警察出手打压时，人们对镇压的反弹使奥托波尔运动变得更加合法，而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合法性则大打折扣。通过将和平行动与借助广泛抱持的信念相结合，活动人士更有机会获得广大公众对其目标的广泛同情，并实现艾丽卡·切诺威丝(Erica Chenoweth)所指出的对运动成功至关重要的“大规模多样化参与”。<sup>6</sup>

成为好的致困行动的第三要素是充满幽默感的反讽。幽默是针对威权政权的活动人士的有力工具。戏谑行动主义(laughtivism)被定义为“被社会非暴力运动战略性使用的幽默和嘲弄，用以削弱对手的权威、建立自身信誉、打破恐惧和冷漠，并触及目标受众”。<sup>7</sup>玛伊肯·茱尔·索伦森(Majken Jul Sørensen)指出，政治活动中的幽默远非仅仅是“发泄情绪”。<sup>8</sup>她的研究表明，使用幽默手段还有助于活动人士本身，他们报告说，在参与带有幽默元素的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相对较少。

当然，并非所有噱头都具有讽刺意味。活动人士扮相滑稽可能很逗趣，但

并不一定就具有讽刺性。相比之下，致困行动就需要讽刺。它们作为情景讽刺的关键在于，揭露对手口口声声自己是从公众最大利益出发，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比尔·莫耶(Bill Moyer)所述，掌权的人编造了一些神话，以此为他们自私的政策和计划辩护。<sup>9</sup>压迫性的政府并不需要公民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他们需要公民在公共场合中“如同”相信这些神话。<sup>10</sup>其内在的讽刺性在于，掌权者的公共叙事掩盖了他们实际上的真相。

**活动人士的目标是利用创意性战术，揭示那些被当成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们置身于颠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

因此，活动家的目标是利用有创意的战术，揭示那些被当作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置身于颠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例如，如果一个政权不允许人们公开表示抗议，那么致困行动就会通过展示无字标语、举行无声抗议或用玩具代替人们进行抗议，以讽刺性的方式引起关注。因此，致困行动是一种公众的不服从

形式，它破坏政权的叙事，但又以一种尊重广泛抱持的社会规范的方式进行。其结果是，公开展示了政权叙事何其违背社会规范。

政府可能会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但实际上战争使公民面临更大的风险。抗议者可以选择传统的示威方式走上街头，也可以创造性地试试具有讽刺意味的致困行动：将反战信息写在钞票上、穿着骷髅装在墓地抗议，或者举着白纸静默地控诉。<sup>11</sup>

对一群进行和平行动的创意活动人士实施逮捕将损害政权的声誉。这个结果非常重要，因为影响运动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公众对活动人士的看

法。当他们被视为扰乱秩序、令人讨厌或是极端主义时，他们往往无法吸引新成员。<sup>12</sup>相比之下，研究表明，如果当局对付活动人士的方式令公众感到道义上的愤怒，那么公众对该运动的支持就会上升。<sup>13</sup>具有讽刺性元素的行动可以非常有效地将活动人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并将他们的对手描绘得充满敌意。

尽管我们研究的各种致困行动在富有玩味性或滑稽性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努力利用创意的讽刺来揭示专制权力内在的荒诞。

## 致困行动研究

这个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将几十年的活动经验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斯尔杰·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深知，致困行动可以带来改变，并以其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是奥托波尔运动的领导人，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上功不可没。他后来又在“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工作多年，从事对全球活动人士的培训。为了将经验付诸实践，我们对44个致困行动案例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九种不同的成功指标进行编码。这构成了我们2020年的著作《恶作剧者vs.独裁者》(Pranksters vs. Autocrats)的基础。<sup>14</sup>其结果令人鼓舞，也促使了眼下这个研究的开展，它旨在记录非暴力运动运用致困行动的范围，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成功率。

为了检验作为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的致困行动的有效性，我们研究了发生在1905年至2019年间的320个非暴力运动中的致困行动战术。这些运动被纳入更宏大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onviolent and Violent Campaigns and Outcomes, NAVCO)1.3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了从1905年



到2019年时期。<sup>15</sup>NAVCO 1.3中的非暴力运动提供了一个样本，我们可以对其中是否存在致困行动进行编码，从而比较具有和不具有致困行动的运动的成功率。

编码的第一步是了解每个运动使用的战术范围，并寻找致困行动的标志。这些标志的例子包括抵制、绝食抗议、媒体艺术、罢工、静坐示威和各种象征物。如果我们发现了致困行动，我们就会对其描述性和评价性特征进行编码。如果我们的团队在一个运动中找到了致困行动战术的一个范例，那么对这场运动的搜索就会到此为止——因为一个范例就足以用来比较，没有必要找到它运用致困行动的所有例子。如果在第一次查找中没有发现致困行动的证据，我们团队就会再次查看主要和次要资料，以确认一项运动中确无致困行动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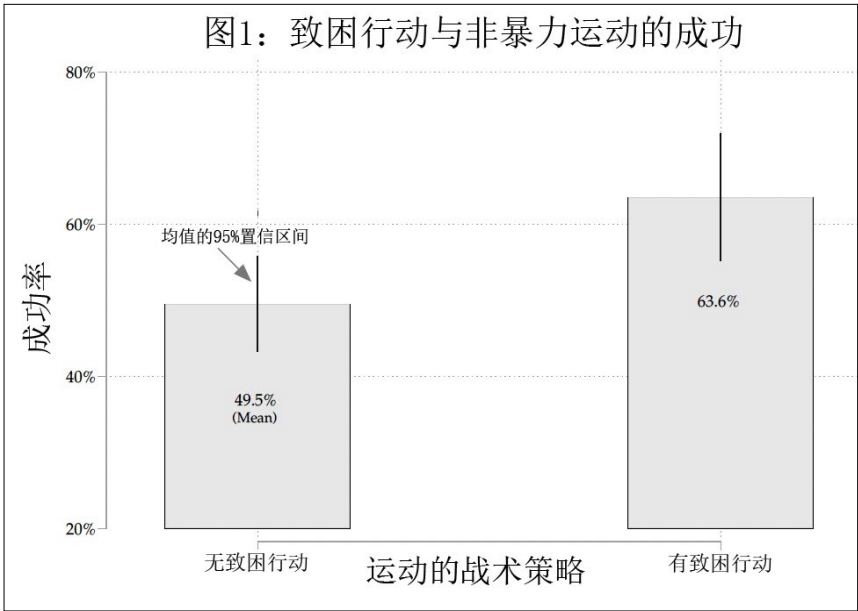
举个例子说明编码的过程：2009年1月，冰岛的所谓“厨具革命”(Cutlery Revolution)期间，近两千人聚集在议会大厦外，敲打着平底锅和其他厨具。这种使用日常厨房用品的方式既有助益又具有讽刺意味，突显了政府处理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的方式对普通民众养家糊口能力的影响。敲打锅碗瓢盆还制造了很大的噪音，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示威者呼吁总理盖尔·哈尔德(Geir Haarde)及其内阁辞职，并要求进行改革，使政府更加透明。这种扰乱行动迫使政府要么将抗议者视为罪犯——并因此而可能面临过度反应的指控——要么让喧闹的示威继续下去。示威者实现了他们的短期目标：哈尔德、中央银行行长和该国最高金融监督官员全部下台。当年四月进行了提前选举。为了对这个案例进行编码，我们团队的两名成员独立查阅了五个不同的二手资料来源，包括报纸文摘、百

科全书条目、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以及现存的一个非暴力动员数据库。

冰岛的厨具革命只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表明，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非暴力运动中存在致困行动，但其发生率在不同时间相当稳定，这表明致困行动的存在并不是新现象。致困行动也发生在非暴力运动之外，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大规模动员的尝试——无论是否使用致困行动——从未吸引到上千规模的参与者，因而无法达到NAVCO数据集的门槛。为了克服数据的这一限制，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超过四百个致困行动案例，其中不乏与任何较大型运动无关的一次性事件，更不用说有上千名参与者的运动了。例如，我们收录了2013年5月土耳其安卡拉的“地铁接吻”抗议活动，此次活动的发生源于公共交通官员查看车站的安全摄像画面，发现有一对情侣在接吻。上百民众于是涌入车站，不顾官方关于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秀恩爱的告诫，在数分钟内进行了接吻快闪，一些人还举着写有“免费接吻”的牌子。官员随后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将接吻定为违法行为，还是让这些抗议者挑衅当局的权威。在NAVCO数据中找到的致困行动数据约占我们迄今研究案例的四分之一。

图1：致困行动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注意：这里将部分的成功视为50%，失败视为0%，完全成功视为100%。

## 证据

在NAVCO 1.3数据集里，所有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大约为54%。图1中的左图显示，这个平均值因是否采用致困行动而有很大的变化。没有采取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其整体成功率略低于50%，而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平均成功率为64%。

接下来，我们测试了致困行动的效果。<sup>16</sup>我们的估算表明，致困行动关乎运动成功的概率能增加10个百分点。这比之前的14个百分点的估计值(64%

对 50% 的成功率)要低, 但我们的估算是基于一种通常对离群观测结果不太敏感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表明, 平均而言, 致困行动显著提高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 在过去的30年里, 成功率的差距缩小了, 与此同时, 非暴力运动的整体成功率也有所下降。这两个趋势——致困行动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 以及整体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似乎都是自冷战结束开始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包括1920年-1950年的年份, 我们可以看到, 含有致困行动的运动的成功率大大超过了没有它的运动。然而, 自冷战结束以来的30多年里, 这一差距在缩小。具体来说, 从1905年到1988年间, 这一差距为25个百分点, 而从1989年以来, 这一差距缩小到9个百分点: 从1989年到2019年, 在至少含有一个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案例中, 运动成功率为61%, 而没有致困行动的运动成功率为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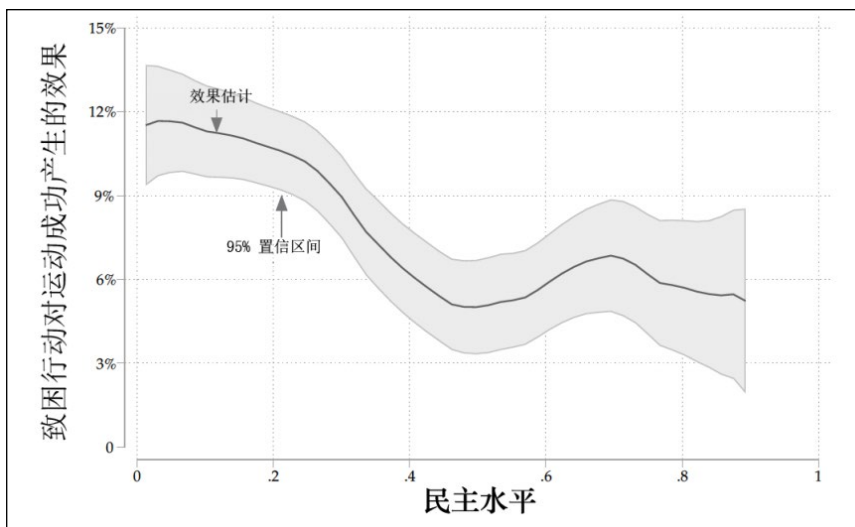


图2: 致困行动提升专制政体中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率

来源：Varieties of Democracy项目(V-Dem)的民主数据(x轴)。

这种成功差距缩小的原因何在？难道致困行动对冷战结束前更为普遍的那种全面专制政权更具有影响吗？那种政权从定义上来说，更为远离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在致困行动可以利用的起点上就存在较大的合法性差距。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们在图2中根据目标政府的民主程度，绘制出致困行动边际效应的估值。

图中的曲线显示，致困行动的边际效应在更加专制的国家中最高。当运动针对的是最专制的政府(其民主程度介于0到0.2之间)时，致困行动的效应远高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民主程度最高的政府(民主数据得分超过0.6)中，致困行动的效应仅有专制政权的一半左右。简而言之，当非暴力运动针对的是更专制的政府时，与在更民主的环境中采用致困行动相比，致困行动提高运动成功率的可能性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 致困行动如何助益非暴力运动

我们的团队就每个致困行动案例收集了一系列描述性数据，编码了15个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评价性的。我们的评估结果表明，致困行动有四个具体要素左右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促成群组的形成、贬低对手的合法性、减少恐惧以及引起媒体的同情报道。

群体的形成(group formation)：波波维奇认为，一场成功的运动能够利用他所称的“酷炫因素”(cool factor)。在致困行动如何塑造公众对运动的想法、如何鼓舞直接参与者的士气方面，他的经验得到了这些相关研究的支

持。例如，这些行动可以将活动人士呈现为无威胁性的。<sup>17</sup>有关幽默和行动主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采取诙谐幽默的方式可以降低观众对活动人士信息的抵触情绪，并可以诱导观众思考他们可能一直回避的问题。<sup>18</sup>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运用游戏可以有助于打破社会障碍，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创建新的联盟。<sup>19</sup>

致困行动不仅影响公众的看法，也会影响活动人士自身。使用讽刺幽默的方式开展致困行动会给参与者带来积极的感受。与其他非暴力战术相比，致困行动更有助于群组的形式和保持活跃。致困行动往往会引发对手的短期负面反应，但这很容易解释为战术上的成功，会让活动人士士气大振。

几乎每次(即92%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进行致困行动都会导致运动参与者人数的增加。在致困行动之后，有82%的情况下，运动的动员会继续进行，而在93%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增加公众对非暴力运动的同情。

合法性：致困行动不仅要造成对手真正的两难困境(失败的尝试通常可追溯到在这方面的失误)，而且还必须触发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让对手以违反规范的方式对致困行动作出回应，这是关键所在。对手无论怎样回应都是输定了的，因为致困行动决定了，要想不违反广泛认同的规范，唯一替代方案是无所作为，而不作为又会被视为示弱，因此是一种损失。

然后，困境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目标在公众眼中可能会失去合法性。旁观者对于针对目标的活动可能产生的价值如何评估，也可能发生改变。<sup>20</sup>例如，如果对手的首选是避免公开回应困境，那么公民们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软弱，并因此而进一步抗争。如果参与致困行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活动人士的合法性就会得到提升，而他们的对手的合法性则会下降。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发起致困行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针对对手的荒谬、过分、不合理或压制性的规定。如果禁止抗议，活动人士可以举起空白标语牌。而逮捕举空白标语牌的人将会使对手丧失合法性，因为公众会对对手制定的法规失去尊重。一次得当的致困行动可以将政权的叙事从合法变为非法，从公正变为不公正，从具有代表性变为专制，等等。

政权置之不理的情况很少见。我们发现，90%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遭遇激进或暴力的回应，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反应过度的回应。例如，2011年7月，马拉维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政府。他们挥舞着该国独立之初使用的国旗——政府最近改变了国旗的设计并禁止展示旧国旗。他们穿着红色的服装，自称为“民主和平的红军”。防暴警察在几个城市进行了暴力镇压，但并没能平息抗议，抗议活动又持续了数天，并在8月和9月再次爆发。当局的严厉反应，正如我们之前提到波兰政府对推着电视遛街的过度反应一样，助长了活动人士的声势，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

恐惧：这是将致困行动与运动成功联系起来的第三个因果机制，涉及恐惧心理学。埃及讽刺作家巴斯姆·尤素夫(Bassem Youssef)写道，恐惧一直是压制性政权的“最佳武器”，但“当你发笑的时候，你就不再害怕了”。<sup>21</sup>他是开罗的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因2011年初发表讽刺作品而成名，当时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侯赛因·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独裁政权，他在自家洗衣房拍摄视频上传到YouTube。尤素夫在互联网上累积了数百万次点击量，然后通过一个类似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秀》(Daily Show)的电视节目引起了轰动。尤素夫的节目“Al Bernameg”(这个节目)，最终吸引了三千万埃及观众(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前所未

有地公开嘲讽埃及政府，提供了以此为特色的突破性的喜剧。威权政权用恐惧来打压言论，扼杀抵抗、制造社会分歧。恐惧可以引发对风险的悲观看法、并增加规避风险的倾向，导致孤立感和冷漠情绪——这是降低参与抗议活动的两种机制。<sup>22</sup>然而，正如尤素夫亲身体会的那样，笑声可以对抗恐惧。例如，2013年3月，当时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政府以尤素夫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和埃及国家逮捕了他，当尤素夫出庭听证时，他戴着一个巨大的帽子，这个帽子是穆尔西在同年早些时候在巴基斯坦获颁荣誉学位时戴过的。尤素夫没有被逮捕所吓倒，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嘲笑穆尔西没有应对批评的能力。

2013年7月军方政变推翻了穆尔西之后，尤素夫受到军政权进一步镇压，他于是在2014年离开了埃及。然而，讽刺节目Al Bernameg的影响力仍然延续，其他喜剧演员如沙迪·阿布·扎伊德(Shady Abu Zeid)也推出了自己的政治讽刺节目。扎伊德还在2016年通过一次致困行动将讽刺作品带到了街头，他在穆巴拉克下台五周年之际，向开罗的警察们献上了充气避孕套做的气球。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活动人士和公众成员面对警方时开怀大笑。<sup>23</sup>由于笑声是一种能够促进群体形成和诉诸集体行动的乐观情绪，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活动工具。

致困行动可以减少活动人士和观察者的恐惧。利用笑声来对抗恐惧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运动，并缓解活动人士过劳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是，致困行动诱使对手做出荒谬或不合逻辑的反应，可以减少非参与者的恐惧，使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加入针对对手的抗议活动，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向不同的受众复制这种致困行动。



正如波波维奇和尤素夫所强调的，独裁者不喜欢笑话。独裁者往往好面子，如果受到嘲笑，就会反应过激。他们对幽默的过激反应暴露了他们膨胀的自我和脆弱的身份认同。2011年在白俄罗斯，活动人士仅仅是在公共场所鼓了鼓掌，就成功地激怒了总统阿连克谢·卢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的政权。当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些人时，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威权政府，拥有各种强制手段，暴露了它对和平抗议的恐惧。<sup>24</sup>我们的定性证据表明，大多数致困行动(87%的情况)有助于减少运动参与者的恐惧或冷漠。通过减少恐惧和增加公众同情，致困行动几乎总是(88%的情况)有助于重塑对手的形象，使其变得不那么可怕或变得更具压制性。

媒体：最后，一个精心设计的致困行动将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关注是否是正面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抗议活动往往得到媒体的负面报道，抗议者被描绘成冒犯的人。<sup>25</sup>媒体报道的内容会因报道机构和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而有所不同。在高度压制的国家，国际和国内的报道会有明显的差异。

在理想情况下，媒体对致困行动的报道会介绍实施行动的团体(假设该团体对公众来说是新出现的或者不熟悉的)，并记录对手的违反规范的行为。<sup>26</sup>媒体报道可能会传达关于该团体的概要信息，比如其规模、组成以及与盟友或同情团体的联系等。公众认知的扩大，可能会进而导致更多的公民改变对该团体及其目标合法性的评估方式。

媒体报道对议题设置、叙事构建和铺垫效果非常关键。<sup>27</sup>议题设置关注抗争所涉问题的突出性(公众是否在思考某个问题)，叙事构建(framing)关涉公众对所涉问题的看法，而铺垫效果(priming)则关涉在提及某个主题时首先涌

现在脑海中的内容。对于致困行动来说，媒体报道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恰当的报道，就无法重构叙事框架，就无法引发公众思维、从而影响人们对行动及其背后原因的看法。致困行动的嬉戏性质、讽刺手法的运用以及对广泛持有的信念的呼应，都旨在吸引同情性报道，从而重塑公众对对手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的发现令人鼓舞：致困行动的宗旨在84%的情况下获得了正面的媒体报道。

## 成功是什么模样？

切诺维斯指出，即使非暴力的公民抗争运动失败了，它们仍比暴力运动更能带来长远的变革。事实上，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提前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引发民主过渡。<sup>28</sup>我们的研究表明，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在取得这些长远结果方面可能更加有效。

2012年，苏丹的抗议者组织了“舔肘星期五” (elbow-licking Friday) 活动，以此讽刺当时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因为巴希尔称那些希望他离职的人为“舔肘者”——那些愚蠢地希望尝试不可能之事的人。当成群的“舔肘”抗议者走上街头时，他们遭遇了橡皮子弹、催泪瓦斯、殴打和逮捕。这种激烈的镇压伴随着当局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封锁，以及总统的欲盖弥彰，他竭力声称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起义。他的政府合法性荡然无存。虽然他还在继续掌权，但可以说，“舔肘者”为推动苏丹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巴希尔最终在2019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尽管在2021年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但该国计划在2023年举行选举并制定新宪法。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哪一方立即让步，但同样可以说，在公众心目中，寻求更好和更自由政府的事业获得了进展，而对专制者的荒谬自大的揭露则

有助于这一事业。

因此，即使被NAVCO数据集标识为失败的运动中，那些使用了致困行动的运动在重构叙事、增加活动人士吸引力以及减少活动人士自身的恐惧等关键指标上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一项积极的结果都有可能在未来有助于瓦解专制权力。一旦一个独裁者的形象被有效的致困行动毁掉，要想恢复元气是很难的。

这些效果可以在我们追踪的各种致困行动案例中看到，其中针对俄罗斯普京政权的案例，揭示了致困行动的潜在积极影响，即使它们尚未导致政权更迭。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系列俄罗斯活动人士已经采用致困行动来挑战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合法性。2012年，俄罗斯巴尔瑙尔(Barnaul)的活动人士绕过了严禁公开抗议禁令，设置了一组玩具，这些玩具举着小小的抗议标语。当局仿佛受到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油桶事件的启发，裁定玩具展览是一次“未经授权的活动”，然后拒绝了新的展览申请，声称玩具不能成为俄罗斯的公民。<sup>29</sup>这一情况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让克里姆林宫显得荒谬可笑。在2021年，警方还因一次堆雪人抗议活动逮捕了一人。<sup>30</sup>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创意活动人士采用了致困行动来抗议对任何提及“战争”的言论的严厉镇压。他们携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行无声的抗议行动，并制作了自我审查的海报，在出现“反对战争”一词的地方加上了星号。他们甚至在商品价格标签上加入了反战标语。<sup>31</sup>

同样地，在2022年底，中国的抗议者也违反公共集会禁令，举起了白纸，

以此回应政府实施压制性的“COVID清零”法律，这些抗争的努力导致政府决定放松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抗议者也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采取了致困行动。妇女们跳舞、摘下头巾、公开剪发，以嘲弄道德警察的权威。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些行为都让抗议者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揭露专制权力的荒谬之处，并将蛮横的政策重构为荒谬的行为。

这些创意策略会迫使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政权终止他们的蛮横政策吗？可能不会。但要问这些方法能损害这些政权的权威和声望吗？<sup>32</sup>我们的研究显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让当局吃到苦果。

注释 .....

- 1 艾丽卡·切诺威斯和玛丽亚 J. 斯蒂芬，《民间抗争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Mauricio Rivera Celestino 和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是鲜花还是只剩下刺，没有玫瑰？非暴力运动与专制政权的过渡》（“Fresh Carnations or All Thorn, No Rose? Nonviolent Campaigns and Transitions in Autocrac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May 2013: 385–400.）
- 2 穆罕默德·阿里·卡迪瓦尔，《群众动员与新民主政体的持久性》（Mohammad Ali Kadivar,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urability of New Democrac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April 2018): 390–417.）
- 3 艾丽卡·切诺威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Erica Chenoweth,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July 2020): 69–84.）
- 4 史蒂文·邓科姆和西拉斯·哈雷拜，《哥本哈根实验：创意形式与传统形式活动效果测试》（Stephen Duncombe and Silas Harrebye, “The Copenhagen Experiment: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e vs. Conventional Forms of Activ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1, issue 6, (2022): 741–65.）
- 5 菲利普·杜阿梅尔，《两难式示威》（Philippe Duhamel, “Dilemma Demonstration P Duhamel v2,” n.d., [www.academia.edu/7263696/Dilemma Demonstration P Duhamel v2](http://www.academia.edu/7263696/Dilemma_Demonstration_P_Duhamel_v2).）
- 6 米歇尔·尼可拉斯森，《非暴力抗争已确证是强大的武器》（Michelle Nicholasen,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oves Potent Weapon,” *Harvard Gazette*, 4 February 2019,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2/why-nonviolentresistance-beats-violent-force-in-effecting-social-political-change.](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2/why-nonviolentresistance-beats-violent-force-in-effecting-social-political-change/))

- 7 斯尔杰·波波维奇,《搞笑主义:新一代活动家将传播民主》(Srdja Popovic, “Laughtivism: The New Activists Will Spread Democracy,” *The Wired World in 2013: Annual Trend Report*, 1 November, 2012.)
- 8 玛伊肯·莱尔·索伦森,《政治活动中的幽默:创意性非暴力抗争》(Majken Jul Sørensen, *Humour in Political Activism: Creative Nonviolent Resist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9 比尔·莫耶等,《实践民主:组织社会运动的MAP模型》(Bill Moyer et al., *Doing Democracy: The MAP Model for Organizing Social Movement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1), 15.)
- 10 丽莎·维丁,《统治的模糊性:当代叙利亚的政治、修辞和符号》(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11 罗宾·狄克逊、玛丽·柳辛娜和娜塔莉娅·阿巴库默瓦,《异见的艺术:俄罗斯人如何抗议对乌克兰的战争》(Robyn Dixon, Mary Ilyushina, and Natalia Abbakumova, “Art of Dissent: How Russians Protest the War o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7 July, 2022.
- 12 娜迪亚·巴达尔,《活动家的讽刺性影响:负面刻板印象降低社会变革影响力》(Nadia Y. Bashir et al., “The Ironic Impact of Activists: Negative Stereotypes Reduce Social Change Influ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December, 2013): 614–26.)
- 13 额德姆·埃塔克和苏珊·斯多克斯,《何苦?对参与选举与抗议的再思考》(S. Erdem Aytaç and Susan C. Stokes, *Why Bother? Rethinking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and Prot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82.)
- 14 斯尔杰亚·波波维奇和索菲亚·麦克林恩,《恶作剧者对抗专制者:为什么两难行动促进非暴力活动》(Srdja Popovic with Sophia A. McClennen, *Pranksters vs. Autocrats: Why Dilemma Actions Advance Nonviolent Activ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5 艾丽卡·切诺威斯和克里斯托弗·威利·谢,《NAVCO 运动清单》(Erica Chenoweth and Christopher Wiley Shay, “List of Campaigns in NAVCO 1.3,” 2020, <https://doi.org/10.7910/DVN/ON9XND>.)
- 16 我们使用了核正则化最小二乘法 (KRLS) 估算器,同时校正了非线性时间趋势和目标政体的岁数。有关这种统计分析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彦斯·海恩穆勒和查德·哈孜里特的文章《核正则化最小二乘法:用灵活且可解读的机器学习方法减少规格误差偏差》,发表在《政治分析》杂志(2014年春季)第22卷第143-68页( (Jens Hainmueller and Chad Hazlett, “Kernel Regularized Least Squares: Reducing Misspecification Bias with a Flexible and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Po-*

- litical Analysis*, 22, (Spring 2014): 143–68) ; 有关我们的实证和稳健性测试以及更多信息, 请参阅索菲亚·麦克林恩、斯尔杰和约瑟夫·赖特的文章《两难行动促进了非暴力运动的成功》(Sophia McClennen, Srdja Popovic, and Joseph Wright, “Dilemma Actions Boost Nonviolent Campaign Success,” December 2022, <https://canvasopedia.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Dilemma-Actions-Boost-Nonviolent-Campaign-Success.pdf>.)
- 17 玛伊肯·莱尔·索伦森和约恩·约翰森, 《非暴力冲突升级》(Majken Jul Sørensen and Jørgen Johansen, “Nonviolent Conflict Escal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34 (Fall 2016): 85–88.)
- 18 卡迪·般若姆·查图和劳伦·菲尔德曼, 《喜剧演员和活动家走进酒吧: 喜剧在社会正义中的重要作用》(Caty Borum Chattoo and Lauren Feldman, *A Comedian and an Activist Walk into a Bar: The Serious Role of Comedy in Social Justic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41.)
- 19 同上, 第 48 页。
- 20 例如苏珊·洛曼, 《信息瀑布的活力: 1989 年至 1991 年东德莱比锡的星期一示威活动》(Susanne Lohmann,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Leipzig, East Germany, 1989–91,” *World Politics*, 47 (October 1994): 42–101.)
- 21 巴斯姆·尤素夫, 《革命入门: 笑傲阿拉伯之春》(Bassem Youssef, *Revolution for Dummies: Laughing Through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272.)
- 22 艾瑞克·约翰逊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情感、概括和风险感知》(Eric J. Johnson and Amos Tversky, “Affect, Gener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July 1983): 20–31) ; 珍妮佛·勒纳尔和达彻尔·柯尔纳特, 《惧怕、愤怒和风险》(Jennifer S. Lerner and Dacher Keltner,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July 2001): 146–59) ; 詹姆斯·祝阿克曼和罗斯·麦克德莫特, 《情绪以及风险选择的构架》(James N. Druckman and Rose McDermott, “Emotion and the Framing of Risky Choice,” *Political Behavior*, 30 (September 2008): 297–321.)
- 23 《阿布扎伊德拒绝为避孕套恶作剧道歉, 预计会被逮捕》(“Abuzaid Refuses to Apologize for Condom Prank, Expects Arrest,” *Egypt Independent*, 28 January, 2016, ) [www.egyptindependent.com/abuzaid-refuses-apologize-condom-prank-expects-arrest](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abuzaid-refuses-apologize-condom-prank-expects-arrest).
- 24 《白俄罗斯: 寂静的抗议令政权感到恐惧》(“Belarus: Silent Protests Frighten Regime,” BBC, 30 June, 2011,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3975788](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3975788).)
- 25 丹妮尔·布朗和萨默尔·哈尔娄, 《抗议、媒体报道和社会斗争的等级结构》(Danielle K. Brown and Summer Harlow, “Protests, Media Coverage, and a Hierarchy of Social Strugg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4 (October 2019): 508–30.)
- 26 玛格丽特·坦卡尔德和伊丽莎白·列维·帕拉克, 《规范认知作为社会变革的载体》(Margaret E. Tankard and Elizabeth Levy Paluck, “Norm Perception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Change,”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10 (January 2016): 181–211.)

- 27 迪特兰姆·舍费勒和大卫·图克斯伯里,《构架、议程设置及启动:三种媒体效应模型的演变》(Dietram A. Scheufele and David Tewk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March 2007): 9-20.)
- 28 尼可拉森,《非暴力抗争已确证是强大的武器》(Nicholasen,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oves Potent Weapon.")
- 29 凯文·奥福林,《官方裁决:玩具无法举行抗议活动,因为它们不是俄罗斯公民》(Kevin O'Flynn, "Toys Cannot Hold Protests Because They Are Not Citizens of Russia, Officials Rule," *Guardian*, 15 February, 2012.)
- 30 布仁丹克尔,《因雪人集会反普京被捕的俄罗斯女子毅然重复抗议行动》(Brendan Cole, "Russia Woman Arrested for Anti-Putin Snowman Rally Defiantly Repeats Her Protest," *Newsweek*, 29 January, 2021.)
- 31 《一名俄罗斯女子因将商店价签更换为反战信息而被监禁》("A Russian Woman Is Jailed for Replacing Store Price Tags with Anti-War Messages," *NPR*, 14 April, 2022.)
- 32 提摩西·福瑞等,《普京的受欢迎度是否真实?》(Timothy Frye et al., "Is Putin's Popularity Real?" *Post-Soviet Affairs*, 33, issue 1 (2017): 1-15.)

制度  
设计

罗伯特·埃尔吉 文  
徐行健 译  
王天成 审校

罗伯特·埃尔吉 (Robert Elgie)，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帕迪·莫里亚蒂 (Paddy Moriarty) 政府与国际研究教授，长期致力于当代世界半总统制的比较研究

译者徐行健是中国大陆专业人士

审校者王天成为《中国民主季刊》主编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从新角度看 半总统制： 一个主题的不同情况



**编按：**在讨论中国未来民主宪法设计时，半总统制一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长期致力于半总统制比较研究的爱尔兰政治学家罗伯特·埃尔吉(Robert Elgie)，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半总统制的定义标准与在世界上的分布，分析了不同类型半总统制对于民主巩固、存亡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新生民主国家应避免采用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该文2005年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第3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6, Number 3 July 2005)。

学界关于两种主要民主制度类型——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利弊的争论，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得到高度关注。关于总统制的内在危险性和议会制的明确优良性的讨论，在1990年代特别受关注，而时至今日这些讨论依然重要。在过去几年中，阿富汗、东帝汶和伊拉克等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家，已经面临或仍在面临政体建构的艰难抉择。此外，包括墨西哥和台湾在内的一些已经确立民主的国家，目前也在争论是否要改变其基本的政府体制。

关于政体类型辩论的大多数学术论著，都集中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相对优缺点上，而共识似乎是坚持胡安·林兹 (Juan Linz) 的判断，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议会制应优先于总统制得到选择。<sup>1</sup>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有力的反驳意见认为，在某些国家，总统制设计得当也会带来好处。<sup>2</sup>

在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争论中，对半总统制——既有直选总统又有对立法机构负责的总理——的分析，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半总统制一直是、而且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政府选择，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或之后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事实上，在中欧、东欧和曾属于前苏联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半总统制国家的数量是总统制和议会制国家数量总和的两倍。然而，

半总统制仅仅受到一本著作和很少几篇期刊文章的关注。<sup>3</sup>

从学术角度来看，半总统制的流行多少有些让人担忧。半总统制现在已成为一种广泛分布的政府体制，但在某种程度上，学者们在对其进行理论探讨时，普遍都得出了应避免采用半总统制的结论。林兹的判断仍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公认学术见解：“从这种体制的一些经验来看，认为它本身就能带来民主稳定的观点似乎值得怀疑。”<sup>4</sup>具体而言，他认为，半总统制要么导致“政治活动和阴谋，由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斗争，那些政治活动和阴谋可能会延误决策，并导致政策相互矛盾”，要么造成“对总统权力的独裁解释”。<sup>5</sup>阿图罗·巴伦苏埃拉（Arturo Valenzuela）和阿伦·里杰哈特（Arend Lijphart）在他们的文章中同意林兹的判断。<sup>6</sup>

半总统制作为一大宪制类别包括多种政体，它们的运作方式相互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各种半总统制政权的经验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这种政府形式，还能让我们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对民主的影响。高度“总统化”（presidentialized）的半总统制政权，如马达加斯加，总统强势，政府首脑只是附庸，严重阻碍了民主的生存。在光谱的相反一端，是强势总理和象征性总统的半总统制国家，如斯洛文尼亚，是最有可能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最后，其他一些半总统制国家，如尼日尔，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势均力敌，这容易出现出问题，并不怎么有利于民主。

## 重新定义半总统制

作为一个概念，半总统制以多种方式被定义。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于1980年首次推广了这一术语。他的定义仍是被最

广泛使用的一个：

如果建立一个政权的宪法包含以下三个要素，这个政权就被视为半总统制：(1)共和国总统由普选产生；(2)总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3)然而，与总统相对的，有总理和部长，他们拥有行政和政府权力，只有在议会不反对他们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任职。<sup>7</sup>

杜瓦杰的定义，其问题在于第二个标准：谁来决定什么构成“相当大的权力”？这种不精确性导致每个分析家主观地决定什么权力足以算作“相当大”，结果，被视为半总统制的国家数量，因观察者的不同而变化。杜瓦杰统计了6个西欧的半总统制国家：奥地利、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和葡萄牙——尽管奥地利、冰岛和爱尔兰的总统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他学者则认为，由于总统的弱势，这三个国家和其他类似的国家根本不应被归类为半总统制。例如，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和辛迪·斯卡奇（Cindy Skach）认为只有法国和葡萄牙这两个西欧国家是半总统制，而把奥地利、冰岛和爱尔兰归类为议会制，因为它们有弱势的总统——尽管是直选产生的。<sup>8</sup>

对半总统制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或者说现行定义中存在相当主观的成分，造成了这一术语难以有效使用。定义模糊的结果，是学者们对世界上半总统制国家的数量存在分歧，并且无法进行同类比较。例如，如果我们对“相当大的权力”采用严格的定义，而只把那些拥有强势总统的国家算作半总统制，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半总统制内在很可能会助长行政部门内部的权力冲突。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分析只基于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政权，而恰恰是这些政权可能会经历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反之，如果我们采用一个不那么严格的定义，并纳入

那些拥有象征性总统的国家——如奥地利、冰岛和爱尔兰，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出半总统制会在行政机构内部造成内在紧张的结论。半总统制可能会造成这种紧张，但只是在我们需要具体说明的某些情况下。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从杜瓦杰的定义中去掉第二条标准。<sup>9</sup>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简单地把这样一个政权定义为半总统制，即如果它既有直接选举产生的、固定任期的总统，又有对立法机构负责的总理。这样的定义使我们能够就一组明确的半总统制国家达成一致，并最大限度地为作者提供比较同类国家的机会。当然，这一定义仍没有消除在确定半总统制国家方面的所有主观性。例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除了一名总理外，还有不仅仅一名而是三名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我们如何对其归类呢？在该国总统选举后，三位当选总统投票决定谁将成为第一任总统委员会主席，然后议会决定其余两位总统的轮换。<sup>10</sup>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底是不是半总统制政体？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需要做出判断。在我看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体制不应被称为半总统制，因为它过于偏离了半总统制政体应只有一名直选总统的规定。不过，其他观察家可能不同意。

其他边缘性案例包括斯洛伐克和冰岛，在这两个国家，总统可以通过全民投票被免职。这些政体偏离了定义，因为总统不一定能被保证在一个固定任期内保持在职。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些国家仍应被归类为半总统制，因为罢免总统需要全民投票中的超级多数，因此，总统并不像总理那样，只对议会中可能经常变化的多数负责。实际上，这些总统职位与其他半总统制国家固定任期的总统职位非常相似。

总之，在决定将哪些国家纳入半总统制范畴的问题上，尽管修正后的半总

统制定义并没有消除所有主观性，但它大大减少了必须做出判断的次数。这样，它就能最大限度地让学者们进行同类比较。

## 半总统制与民主

采用修正后的定义，目前世界上有55个半总统制国家（见下页的表格）。2004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调查将其中23个国家列为自由国家，15个国家列为部分自由国家，17个国家列为不自由国家。除23个自由国家外，15个部分自由的半总统制国家中有8个被列为选举民主制国家。因此，即使多数半总统制国家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的，但也有相当多的半总统制国家是自由的；虽然在这些政权中，有很多不是选举民主制，但相较而言选举民主制还是占更大数量。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半总统制并非与生俱来地妨碍民主的存在。

这就是说，我们仍需更深入地探讨半总统制，才能对其是否有利于民主做出明确判断。我们无法对半总统制的整体表现做出判断，因为这一系列半总统制国家包含了如此广泛而不同的政治实践。如上所述，有些半总统制政权有非常强势的总统和弱势的总理，而其他有些政权则有强势的总理和象征性的总统，还有些政权在总统和总理的权力之间取得了平衡。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世界各地各类半总统制政权的表现，探讨不同的政治实践如何影响国家的民主成败。<sup>11</sup>

表——基于2004年“自由之家”调查的半总统制国家与民主的表现

被归类为自由的半总统制国家	不属于自由但选举民主的半总统制国家	部分自由和不自由的半总统制国家，也非选举民主制
奥地利	东帝汶	阿尔及利亚
保加利亚	格鲁吉亚	安哥拉
佛得角	马其顿	亚美尼亚
克罗地亚	马达加斯加	阿塞拜疆
芬兰	莫桑比克	白俄罗斯
法国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
圭亚那	俄罗斯	喀麦隆
冰岛	斯里兰卡	中非共和国
爱尔兰	乌克兰	乍得
立陶宛		加蓬
马里		几内亚比绍
蒙古		海地
纳米比亚		哈萨克斯坦
秘鲁		吉尔吉斯斯坦
波兰		毛里塔尼亚
葡萄牙		卢旺达
罗马尼亚		新加坡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塔吉克斯坦
塞内加尔		坦桑尼亚
斯洛伐克		多哥
斯洛文尼亚		突尼斯
韩国		乌兹别克斯坦
台湾		也门

根据有关这种政体类型的学术文献，我们应该会发现，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国家会出现问题；而具有礼仪性总统、强有力总理的半总统制国家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以类似议会制的方式运作；而行政权力平衡的半总统制国家，因为存在着破坏稳定的机构冲突，也会出现问题。下面将探讨这些担忧和期望是否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半总统制政权的实际经验相符。

**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政权。**这些政体往往与纯粹的总统制存在同样的问题。斯科特·迈因瓦林（Scott Mainwaring）和马修·舒加特（Matthew Shugart）认为，林兹指出了总统制的五个普遍问题：1）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对合法性的诉求相互竞争；2）固定任期使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加僵化；3）总统制鼓励赢家通吃；4）总统政治的风格鼓励总统不容忍政治反对派；以及5）总统制会助长民粹主义的候选人。<sup>12</sup>在评估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国家的表现时，上述几点非常突出。

例如，正如阿伦特·里杰哈特（Arend Lijphart）所指出的，即使半总统制允许不同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分享行政权力，但总统选举的赢家通吃性质依然存在。<sup>13</sup>在一个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中，这可能会导致出现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而这很可能对民主造成损害，因为总统可能会出于自身原因或利益而决定无视民主程序。这样，总统很可能会与立法机构发生冲突，而立法机构的成员享有另一种民众合法性来源。

民主能够并且已经在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中生存下来，但这并不是常态。在23个“自由”的半总统制国家中，以强总统弱总理为特征的体制只存在于4个国家——圭亚那、纳米比亚、秘鲁和韩国。<sup>14</sup> 这些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政权的存在表明，这种体制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纳米比亚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少数几个巩固的民主国家之一。尽管如此，所有这4个国家都曾面临过一些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而半总统制的高度总统化性质，可以说都造成了或者加剧了这些困难。

例如，奥雷尔·克罗伊桑特（Aurel Croissant）在最近的一篇亚洲民主化综述中指出，尽管韩国“在文官至上、加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等方面向民

主巩固迈进，但在横向问责和总统职位的制衡方面仍存在严重缺陷”。<sup>15</sup> 特别是，历届韩国总统在试图行使权力时，有时会与立法机构发生激烈冲突，尤其是在立法机构由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

虽然历史证据表明，由强势总统和弱势总理组成的半总统制并不必然会对民主造成致命影响，但这种组合并没有特别好的记录；在半总统制得以存续并保持民主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尽管存在与这种组合相关的问题，民主还是没有崩溃。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国家往往表现不佳——至少会给民主带来附带的不良后果——这也印证了林兹的预测。一些最脆弱的半总统制民主国家，包括所有的“部分自由”的选举制民主国家，都有强势的总统和弱势的总理。马达加斯加和俄罗斯（后者在2004年“自由之家”的调查中首次降至“不自由”）就是突出的例子。

在非选举民主制的半总统制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总统强而总理弱

有理由相信，在一些半总统制国家，总统权力的强大助长了糟糕的民主表现。俄罗斯或许是最臭名昭著的案例。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解散杜马，引发了一场宪法和军事危机，随后的秩序恢复（最终是叶利钦下令对杜马大楼进行军事袭击）

伴随着国家政府体制的显著总统化。此后，弗拉基米尔·普京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总统权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俄罗斯的表现可能会更糟，而且俄罗斯民众似乎在车臣等问题上支持普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认为，俄罗斯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形式在该国民主治理领域的急剧衰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非选举民主制的半总统制国家中（有些是“部分自由”国家，有些是“非



自由”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总统强势而总理弱势。当然,我们在做出正是这些国家半总统制的特殊形式导致了它们糟糕的民主表现的结论时,必须要谨慎。很可能在这些国家采用半总统制宪法之前,专制倾向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在许多前苏联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等——选择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可能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专制倾向的反映。因此,很难确定这些国家的民主巩固问题是因为采用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造成的,还是由共产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专制统治造成的。但至少,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并不能减轻这种专制倾向:在一种或许已经具有个人崇拜和“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意为军政领袖独裁统治)的政治文化中,总统直选激励总统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的缔造者或救世主,总理也无法对总统起到任何制衡作用。简而言之,这一体制几乎无法防止总统的专横统治。

总体看来,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政体的经验似乎验证了我们的预测。虽然这些制度并不必然会阻碍民主的巩固——圭亚那和纳米比亚的情况就是证明——但它们往往会给民主的巩固制造障碍。有时,它们由于强化已经高度个人化的政治文化所固有的问题,而给民主造成障碍;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会积极鼓励制度的个人化。例如,在也门,总统萨利赫(Ali Abdallah Salih)领导下的政体总统化,破坏了南北也门合并前通过谈判达成的谨慎的宪制平衡。

简而言之,证据表明,新生民主国家应避免采用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如果这一结论确实正确,那么中非共和国在2005年宪法中采用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具有礼仪性总统的半总统制政权。**这些政权以类似议会制的方式运作。总统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很少，他只是一个形象代言人，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决策者。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总理负责国家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半总统制国家的政治实践与拥有间接选举的名义总统和强有力的政府首脑的议会制国家——例如德国和希腊——的政治实践非常相似，我们预计它们的民主表现会很好。

一些国家希望有一位能够代表国家发言而又不会制造危机的领导人，那么，礼仪性总统的半总统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礼仪性总统的半总统制政权中，总统的直接选举使总统职位合法化，并允许在任总统充当国家发言人，而总统缺乏行政权力，意味着任何这种民众直选带来的合法性都不会用来对抗总理，不会将总统树立为总理的政治竞争者。在全球55个半总统制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6个国家有象征性的总统和强有力的总理：奥

地利、保加利亚、冰岛、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这6个国家都是自由国家，但我们不必过于仓促地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形式的半总统制显然对民主有利。例如，葡萄牙只是在民主得到巩固后才转而实行类似议会制的体制，总统基本上是礼仪性的，总理则是强有力的，因此这种特殊的半总统制并不是该国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促成因素。在1974年首次民主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葡萄牙总统职位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在爱尔兰，直到1937年，即独立后约16年、内战结束后14年，才实行直选名义总统。因此，爱尔兰在类似议会制的半总统制方面的经验，并不一定证明这种体制是该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因素。

即便如此，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半总统制并没有成为民主的障

碍。在这方面，最有趣的例子是斯洛文尼亚，它在1991年对半总统制的选择是一种妥协。<sup>16</sup>在该国制宪辩论期间，民众对直选总统职位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领导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集体主席团的米兰·库昌（Milan Kučan），很受民众欢迎。反对党知道库昌很可能赢得直接选举，但不太可能获得间接选举的总统职位，因此他们呼吁采用后者。最终的折衷方案是实行半总统制，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但主要是礼仪性的；这也符合斯洛文尼亚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历史传统。<sup>17</sup>一旦当选，库昌并没有试图行使超过宪法规定的权力。此后，虽然在总统的确切角色问题上出现过一些争议，但并没有出现破坏性的制度僵局，也没有总统试图以可能破坏稳定的方式将政治进程个人化。

与斯洛文尼亚总统一样，爱尔兰总统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在爱尔兰，这至少是总统选举有时没有竞争的原因之一。政党可能不希望承担总统选举的财务成本，也不希望冒总统竞选不利而扰乱其议会选举战略的风险——尤其是当有一位受欢迎的现任总统正在寻求连任时。总之，对于那些强烈希望有一个象征性领导人的国家来说，拥有礼仪性总统的半总统制政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在一定的民众合法性基础上代表国家发言，而不会有制造政治危机的风险。

与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相比，这种形式的半总统制几乎没有提供机会或动力让总统试图将制度个人化。事实上，如果某个领导人确实希望将这种制度个人化，那么这样的领导人首先担任总理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来实现这个目标——1999年宪法改革前斯洛伐克议会制初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由名义总统和强势总理组成的半总统制通常以类似于议会制的方式运作，并且通常需要议会多数或超级多数才能通过重大立法。

虽然历史上这种类型的半总统制的例子很少，但有证据表明，有象征性总统和强有力总理的半总统制，肯定比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更可取。这与林兹的预测以及巴伦苏埃拉（Valenzuela）最近的建议是一致的。<sup>18</sup>这种形式的半总统制与议会制相似，而总的来说议会制通常被认为问题较少，因此可能带来良好的民主表现。

总统和总理权力平衡的半总统制政权。传统上对半总统制的批评，大多涉及的是总统和总理权力平衡的国家。总统制经常因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之间造成潜在冲突而受到批评，而半总统制则因可能导致行政部门内部分裂而受到批评。林兹认为，半总统制可能导致“政治活动和阴谋，由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斗争，这些政治活动和阴谋可能会延误决策，并导致政策相互矛盾”。<sup>19</sup>同样，斯捷潘和斯卡奇也认为，半总统制“内在会造成政府陷入僵局和双重行政机构之间发生宪法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投票者没有产生多数票的话”，并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可能会介入打破宪法僵局。<sup>20</sup>尽管即使总统和总理来自同一政党或联盟，这些问题也可能发生，但在政治“共处”（cohabitation）时期，即行政官员（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党时，这些问题很可能会恶化。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会发现，总统和总理权力平衡的半总统制国家，在巩固民主方面表现不佳。

在相当多的自由的半总统制政权中，总统和总理都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有时还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共处。在其中一些国家——保加利亚、佛得角、克罗地亚、芬兰、立陶宛和波兰——总理是主要决策者，而总统有权偶尔或在一个或多个具体政策领域进行干预，通常是外交和国防政策。在

其他国家——法国、塞内加尔、台湾，以及自2003年宪法改革以来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职位承担着大部分政治重任，尽管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中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共处时期。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共处”并没有对政权构成威胁，因为它发生在政权明确巩固之后。尽管如此，这对政治阶层还是造成了创伤。2000年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任期缩短至五年，从而减少了（尽管没有消除）未来共处的可能性。

在其他国家，“共处”现象在体制还很脆弱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并助长了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曾在立陶宛、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发生过，台湾也曾短暂发生过。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却得以幸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平衡的半总统制并不必然有问题，即使对于新生的民主国家，即使是在政治共处的情况下。

可以肯定的是，平衡的半总统制的民主记录似乎比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要好得多。因此，从表面上看，林兹关于平衡的半总统制的预测似乎并不准确。然而，具有这种制度结构的国家可能已经在民主上得到巩固，不管它们的政权如何。也许他们确实面临过林兹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平衡半总统制的问题，但却克服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可能会问：即使这些国家在民主方面表现出色，这种情况是否有其他地方可能不存在的特异性（idiosyncratic）或非制度性原因？

如上所述，平衡的半总统制给行政部门带来了冲突的可能性，最常见的是在共处期间，但有时当总统和总理来自同一政党或联盟时也是如此。在许

多情况下，这种冲突确实会破坏稳定。据史蒂文·菲什 (Steven Fish) 的报告，1998年，蒙古“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政治炼狱 (purgatory)”，因为总统拒绝了反对派（在议会中占多数）向他推荐的一系列总理候选人。<sup>21</sup>尽管菲什在蒙古的案例中支持半总统制，但他承认该制度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府危机中起到了直接作用。

同样，在波兰实行民主的最初几年，总统瓦文萨 (Lech Wałęsa) 和几任总理之间的斗争也持续不断。一些人认为，瓦文萨“不想成为一个被动的傀儡，而是想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且“他试图通过树立先例来影响他尚未确定的宪法特权，他希望这些先例能被接受为政治惯例”。<sup>22</sup>在这么做的过程中，瓦文萨与试图行使自己宪法权力的总理们发生了冲突。即使民主制度在蒙古和波兰的案例中都得以幸存，但这似乎只是意味着尽管政体属于平衡的半总统制性质，民主并没有死亡。

事实上，通过研究不属于自由国家但属于选举民主国家的平衡半总统制政体的经验，这一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在尼日尔、斯里兰卡和乌克兰，半总统制政权受到机构冲突的损害，并且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未能实现民主巩固的原因。1995年，尼日尔总统马哈曼·奥斯曼 (Mahamane Ousmane) 和总理哈马·阿马杜 (Hama Amadou) 经历了一段特别困难的政治共处时期，导致长达一年的政治瘫痪，直到军队介入才得以打破。<sup>23</sup>在这个案例中，林兹关于平衡半总统制的预测之一是完全准确的。

最近，他的另一个预测似乎在乌克兰非常接近实现。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之间持续存在着激烈冲突的时期。总统通常希望掌握更多的权力，因此寻求更多权力，而总理一上任就立即获得了潜在总统候选人

的地位。<sup>24</sup>因此，行政部门内部的竞争是制度性的，有时是党派政治性的，而且往往是高度个人化的。尽管认为平衡的半总统制是造成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原因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毫无疑问，这种制度框架造成了一种刺激总统和总理寻求更多权力的局面。结果，该国的民主进程受到了损害，至少在2004年底橙色革命之前是如此。

不过，也有不少平衡的半总统制国家是被“自由之家”评为“自由”的巩固民主国家。证据表明，特别是与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相比，平衡的半总统制应该被视为相对明智的宪法选择。当然，它的成功机会似乎高于平均水平。尽管平衡的半总统制几乎总是与行政内部冲突联系在一起，但一些巩固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这种冲突是可以克服的。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创伤，但对民主来说并不一定是致命的。

即使有证据表明，一些关于平衡半总统制的更可怕的论断可能有夸大成分，但当新生民主国家知道它们很可能会面临潜在破坏稳定的行政内部冲突过程时，它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平衡的半总统制呢？除非有理由相信这种冲突不会损害政权的民主基础，否则，也许最好是完全避免平衡的半总统制。

## 给半总统制两个好评

长期以来，在如何定义半总统制概念，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这一概念方面，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通过采用最基本的定义，我们减少了在识别半总统制国家时的主观因素，从而增加了将这种政府形式与其他政府形式（尤其是总统制和议会制）进行比较的机会。

虽然有象征性总统的半总统制一般表现良好，但其他类型的半总统制可能会在巩固民主的道路上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鉴于符合半总统制类别的宪法安排和政治实践多种多样，有必要确定其某些形式是否比其他形式更有利于民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明确的：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国家的经验往往是负面的，而拥有礼仪性总统和强有力总理的议会式半总统制国家的

经验往往是正面的。只要总统确实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那么我们可以放心地鼓励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采用后一种类型的体制。

至于平衡的半总统制，情况则更为模糊。一些这样的政权——如佛得角、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政体——已经成功地渡过了可能存在问题的民主化进程；而另一些国家，如海地，则以民主失败而告终。这种政府形式的内在问题是行政部门中的政治共处问题。在稳固的民主制度中，共处问题通常不足为虑，但在较为脆弱的民主体制中，它曾经造成政治动荡。正如我们在蒙古和波兰所看到的那样，行政共处的问题可以在不损害民主进程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但尼日尔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更令人担忧的故事。总的来说，平衡的半总统制可以运转，但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选择。林兹、巴伦苏埃拉和里杰哈特对这种政府形式提出的警告可能是正确的。

很难确切地指出如何为民主的巩固创造尽可能最好的条件。一个国家的民主成败背后存在太多变数，因此很难确定行政部门的正式结构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尽管如此，本文的分析表明，虽然有象征性总统的半总统制一般表现良好，但其他类型的半总统制可能会在巩固民主的道路上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 注释

- 1 胡安·J·林兹,《总统制的危险》(Juan J.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 (Winter 1990): 51–69); 以及胡安·林兹《议会制的优点》(Juan J. Linz, "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 (Fall 1990): 84–91.)
- 2 马修·索伯格舒加特和约翰·M·凯里,《总统与议会: 宪法设计和选举机制》(Matthew Soberg Shugart and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罗伯特·埃尔吉编辑,《欧洲的半总统制》(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也参见斯蒂文·罗波,《所有的半总统制都是一样的吗? 半总统制比较》(See also Steven D. Roper, "Are All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 the Same? A Comparison of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April 2002): 253–72.)
- 4 胡安·J·林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民主: 有什么不同吗?》(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55.)
- 5 胡安·J·林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民主》(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55.)
- 6 阿伦·里杰哈特,《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Arend Lijphart,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April 2004): 96–109); 以及阿图罗·巴伦苏埃拉,《拉丁美洲被中断的总统任期》(Arturo Valenzuela, "Latin American Presidencies Interrupted,"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April 2004): 5–19.)
- 7 莫里斯·杜瓦杰,《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模式: 半总统制政府》(Maurice Duverger,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 (June 1980): 166.)
- 8 阿尔弗雷德·斯捷潘和辛迪·斯卡奇,《宪法框架与民主巩固: 议会制对总统制》(Alfred Stepan and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46 (October 1993): 8–9.) 他们将芬兰和瑞士作为“混合制”例子。
- 9 罗伯特·埃尔吉,《半总统制的政治》(Robert Elgie, "The Polit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13.)
- 10 我感谢索菲亚·莫伊斯特鲁普 (Sophia Moestrup) 提出这一点。
- 11 尽管我们在定义半总统制时可以尽量减少确定半总统制国家集合的主观性,但在确定半总统制国家集合中的不同实践类型时,我们还是无法避免主观判断。例如,一位研究者可能希望将台湾归类为高度总统化的半总统制国家,而另一位则可能将其归类为平衡的半总统制国家。简而言之,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研究台湾的学者都能就台湾的运作方式达成一致。任何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也是如此。我们所能做的是提供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无论台湾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大家都能同意台

湾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在我看来，这至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 12 斯科特·迈因瓦林和马修·S·舒加特,《胡安·林兹,总统制与民主:批判性评价》(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 Shugart, "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 *Comparative Politics* 29 (July 1997): 450-51.)
- 13 阿伦·里杰哈特,《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Arend Lijphart,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 102.)
- 14 冰岛的情况是,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但实际上由总理行使这些权力。因此,冰岛被归类为礼仪性总统制。
- 15 奥雷尔·克罗伊桑特,《从转型到有缺陷的民主:描绘亚洲的民主化》(Aurel Croissant, "From Transition to Defective Democracy: Mapping Asian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11 (December 2004): 163.)
- 16 米罗·采拉尔,《斯洛文尼亚》(Miro Cerar, "Slovenia," in 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232-59.)
- 17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终的体制中,总理也没有被赋予很多宪法权力,这使得斯洛文尼亚成为后共产主义中欧和东欧体系中的一个异类。
- 18 参见阿图罗·巴伦苏埃拉,《拉丁美洲被中断的总统任期》(See Arturo Valenzuela, "Latin American Presidencies Interrupted,"<sup>17</sup>)他指出“比半总统制更可取的是议会制,总统由民众选举产生,但权力稍小--更接近葡萄牙的制度,而不是法国的制度”。此处的分析与巴伦苏埃拉的文章用词不同,但结论相同。
- 19 胡安·J·林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民主:有什么不同吗?》(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55.)
- 20 阿尔弗雷德·斯捷潘和辛迪·斯卡奇:《宪法框架与民主巩固》(Alfred Stepan and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413.)
- 21 M·史蒂文·菲什,《亚洲内部的反常现象:比较视角下的蒙古民主化》(M. Steven Fish, "The Inner Asian Anomaly: Mongolia'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4 (September 2001): 332)
- 22 阿尼娅·范·德·梅尔·克罗克·帕斯科斯卡,《波兰》(Ania van de Meer Krok-Paszowska, "Poland," in 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170-92.)
- 23 索菲娅·莫斯特鲁普,《行为者和机构的作用:马里和尼日尔民主生存的困难》(Sophia Moestrup, "The Role of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The Difficulties of Democratic Survival in Mali and Niger," *Democratization* 6 (Summer 1999): 171-86.)
- 24 参见奥列赫·普罗切克,《陷入困境的半总统制:乌克兰宪法体系和内阁的稳定性》(See Oleh Protsyk, "Troubled Semi-Presidentialism: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binet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55 (November 2003): 1077-95)。这种情况类似于在法国发现的所谓首相俄狄浦斯情结。参见皮埃尔·塞文特《Oedipe à Matignon: 马提翁宫的俄狄浦斯:总理的情结》(See Pierre Servent, *Oedipe à Matignon: Le complexe du premier ministre*. Paris: Balland, 1988.)



在湖畔弄湿裙子 作者：郑玉禧

读书

莫里斯·卡尔达

本文作者莫里斯·卡尔达 (Moriš Calda) 是布拉格查尔斯大学英美研究教授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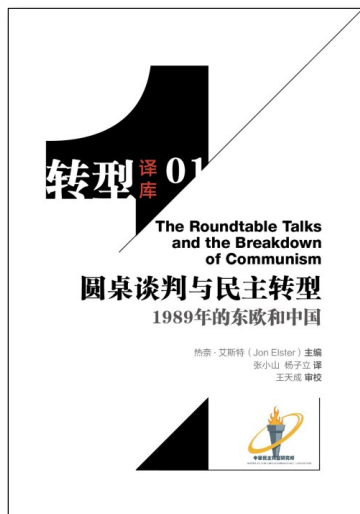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 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 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捷克斯洛伐克的 圆桌谈判

**编按：**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期间，政府与哈维尔为首席代表的反对派之间进行了10轮圆桌谈判。根据谈判结果，政府被改组、总统胡萨克辞职，整个国家迅速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热奈·艾斯特（Jon Elster）主持编辑的《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年的东欧与中国》第4章，总结分析了这10轮谈判，下面摘录的是其中前四轮谈判。

该书2017年已经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翻译出版。它不只研究记录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等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圆桌谈判，也在最后一章讨论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败。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可以免费阅读、下载本书完整版。



热奈·艾斯特（Jon Elster）等著  
张小山、杨子立译  
王天成 策划、审校

## 第一轮（1989年11月26日）

第一轮会谈召开的时间离发生在11月17日的布拉格事件不足10天，在此次事件中，防暴警察们对于一个纪念反对纳粹关闭所有捷克大学事件的学生集会的粗暴镇压，迅速激起了自1948年共产党政变上台以来前所未有的—波民众公开抗议浪潮。每个人都明显意识到这些示威游行不会消退，除非当权者做出重大让步。与此同时，反对派的“公民论坛”（OF）运动于11月19日形成，它由知名的不同政见者领导。其中最知名的领导人是剧作

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生于1936年），他曾于1979年至1983年在狱中度过四年。另一个知名的公民论坛领导者伊日·丁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生于1937年）曾是个电台记者，也曾因其离经叛道的政治活动于1979年至1982年入狱三年。公民论坛的领导层还包括彼得·皮特哈尔特（Peter Pichart）（生于1941年），这个政治学家和律师在八十年代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和捷克历史的分析。

为了稳定动荡局势，政府（直到不久前还是苏维埃联盟阵营里最顽固的成员之一）和组织日益完善的反对派决定于布拉格举行会谈。两边由中间方“莫斯特组织”（Most Group）促成走到一起，该组织成员有迈克尔·可卡（Michael Kocáb）和记者米哈尔·霍拉切克（Michal Horáček）。迈克尔·可卡（生于1954年）是个著名的滚石音乐人和电影配乐作曲家；霍拉切克（生于1952年）是为一份青年周刊撰写温和的反政府的专栏文章的记者。

会议开始，联邦总理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首先发言。他被认为是捷克共产党领导层中温和改革派的代表。阿达麦茨指出目前形势严峻，必须采取措施平息事态。他呼吁双方为了公众利益寻求共识的达成。他对筹备中的将于次日举行的罢工（罢工号召于11月17日的次日由演员和学生们发起）表示接受，但坚持罢工必须是政治性的，而且仅可持续几分钟，以不损害国家经济运行。同时，阿达麦茨说政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实际上，整个会谈中，阿达麦茨都使用“给我们时间”这种说辞，意图推迟崩溃的到来，等待革命浪潮逐渐消退。

哈维尔建议尽快讨论各个层面的事项和行动计划。哈维尔列举的公民论坛的主张：

1. 政治变革：总统胡萨克在1989年底之前辞职；必须修改宪法以及一定程度上重建联邦议会。
2. 在议会建立一个委员会调查1989年11月17日事件。
3. 政治犯和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必须释放，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4. 宣布新闻和信息自由，政府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这一轮会谈的最后，参会者同意两天后，也就是全国范围的总罢工的第二天，举行下一轮会谈。

## 第二轮（1989年11月28日）

联邦总理阿达麦茨提议讨论两个突出议题：公民论坛在第一轮会谈中提出的要求；前一天的罢工及迅速恢复生活“正常化”。

阿达麦茨列举了公民论坛提出的要求中哪些政府已经满足的：有些政治人物已经辞职；建立议会委员会调查11月17日事件的提案将于次日提交给联邦议会；政治犯名单已经提交给总统胡萨克；米洛斯拉夫·巴维尔（Miroslav Pavel）已经被任命为捷克电视台新的台长，他恰好是政府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巴维尔将以一个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委员会做工作顾问。

当阿达麦茨和他的团队成员用坚持“合法性”来兜圈子拖延时间的时候，哈维尔继续提出迅速变革的要求。他一再警告说民众已经对进展的缓慢失去耐性。他说只有尽快实行全面的变革，民众才能被安抚。

哈维尔一直很注意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礼让，他提醒阿达麦茨说公民论坛并不是反对派唯一的代表，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公民反暴力论坛”

(VPN) 的代表扬·察尔诺古尔斯基 (Ján Čarnogurský) 也到会了。察尔诺古尔斯基 (生于1944年)是个公司律师, 已经成为斯洛伐克天主教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领袖人物。哈维尔认同阿达麦茨所说的双方目标一致: 稳定局势并“建立秩序”。但他明确反对阿达麦茨使用“正常化”这个词, 因为显然这个词与1968年国家苏联化以后的状态密切相关。

反对派提出的主要主张包括: 阿达麦茨必须向总统胡萨克递交辞呈; 反对派希望新政府的组建可以重新委托阿达麦茨负责。次日, 联邦议会应当开会讨论删除宪法中三段相关段落 (关于坚持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在国民阵线 (NF, 由共产党和它的附庸党团组成的联盟——译者) 的领导地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接受议会议长阿洛伊斯·英德拉 (Alois Indra) 被要求的辞职, 并选举一个新的没有历史污点的议会议长加速议会进程。此外, 那部1989年1月通过的、给予警方法律手段对付日益频繁的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的法律, 应当废止。12月1日, 周五, 阿达麦茨应当提出他们的新政府人员和计划; 反对派将讨论新政府人选。

哈维尔进一步要求新政府保证集会、结社和新闻的自由。民兵组织<sup>1</sup>应当立即解散, 同时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也应当解除。新政府应当立法保障正当反对意见并且解决在工作场所派驻党政机构的问题。

哈维尔再次强调解除总统胡萨克职务的必要, 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能在一周内做好推行反对派计划的准备, 反对派就会要求组建由阿达麦茨以外的其他人领导的新政府。



阿达麦茨抱怨说反对派的要求就像个最后通牒，这一点哈维尔也承认并反复重申公众已经日益失去耐性，他们指望得到辞职的明确期限。他进而说如果反对派不表达他们的要求，公民论坛可能就会失去其公信力，公众会因此抛弃公民论坛，这将会导致因为没有调停方的存在而产生混乱。

阿达麦茨针对反对派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反驳：（1）他无法接受时间限定；（2）政府会在一周内重组，反对派应当提交他们的部长候选人名单；同时（3）反对派应当作为政治党派进行登记，终结作为独立公民团体的状态。独立团体目前有18个之多，使得政府沟通困难。

阿达麦茨拒绝立即辞去总理职务，辩称他首先必须听从那些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人的意见。他声称无权将英德拉从联邦议会议长的职位上挪走，但承诺会向其建议去职。彼得·米勒（Petr Miller）反驳说局势从第一轮以后正在加剧变化。米勒（生于1941年）原是个工厂工人，他说反对党坚持要求阿达麦茨当天辞职，并在次日进行修宪，同时坚持总统胡萨克在12月9日前（人权日前夕）辞职，同时无条件释放政治犯，除此之外其他期限都可以商量。

哈维尔提醒阿达麦茨说他的辞职将会是个表明变革确实在发生的象征性姿态，而这正可以给他提供缓冲时间。哈维尔问阿达麦茨是否愿意向联邦议会提交修宪议案，是否可以期待英德拉辞职，是否真的希望现任总统会在12月9日去职。这时马利安·加尔法（Marián Čalfa）开始第一次发言。加尔法（生于1946年）年仅18岁就入党，于1988年成为联邦政府负责立法的部长。加尔法指出新宪法已经预备一段时间了，<sup>2</sup>其中完全没有提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拒绝考虑在

未经联邦议会也未经捷克和斯洛伐克邦议会讨论的情况下就废止国民阵线（NF）。依琴斯凯反驳说没有人希望废止国民阵线（NF），只是希望它脱离共产党的控制，重要的是将提案提交给联邦议会以便让民众看到事情有进展。

这时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对话发生了，阿达麦茨建议反对党提出内阁部长人员名单，而依琴斯凯和米勒说公民论坛无意于此。阿达麦茨反唇相讥说反对派根本不想承担责任。这次交锋暴露了反对派在进入谈判的时候准备得多么不充分，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候选人，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三轮谈判时捷克总理皮特拉再次提出同一建议。反对派的这种无能为力，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转型过程一定程度的延缓，这些后果在随后的几个月能明显感到。

在第二轮的最后几分钟，哈维尔宣读了一份由反对派和阿达麦茨的顾问奥斯卡·科雷奇（Oskar Krejčí）准备的公报草稿，内容包括：（1）公民论坛将要求总统在12月10日前辞职；（2）总理承诺12月3日周日前组建新政府；（3）联邦政府次日将提交从宪法中废止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修正案；（4）总理向公民论坛代表承诺马上与布拉格市政当局商讨向公民论坛提供办公场所事宜；（5）公民论坛（OF）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自由接触、运用媒体。

反对派的声明包括公报草稿里的五点并加入了其他几点：（1）总理已经要求总统特赦政治犯；公民论坛将要求总统最迟在12月10日前满足这一期望；公民论坛保留更新政治犯名单的权利；（2）公民论坛对联邦议会副议长的这一声明表示满意，即他将向议会提议组建特别委员会调查11月17日

事件；(3) 公民论坛要求总理发表一个政府计划，清楚说明政府将允许选举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停止监控教会；修改军队征兵法和其他法律。有必要解散民兵组织并审查在工作场所遗留的派驻政治团体机构问题。如果公众对政府的计划和执行不满意，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要求总理在年底辞职并要求总统重新任命一位新总理；总统如果认为必要的话可以由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运动提名新总理候选人；(4) 11月29日，公民论坛将会书面促请总统胡萨克在12月10日前辞职；(5) 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向总理建议由他的内阁提交修宪案，以确保遣散所有那些无视人民利益和意愿的联邦议会成员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邦议会议员。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提出补选的方式；(6) 公民论坛要求政府和联邦议会立即公开谴责发生在1968年的华约五国入侵，并要求苏联和波兰、东德等国的立法机构宣布入侵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华约自己的法律；(7) 公民论坛要求所有市民继续工作但同时保持随时准备罢工的状态。

联邦政府的声明指出了会谈各方的分歧，并承诺在12月3日前向总统提交一份主要由专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基础上的新政府名单。联邦政府将会向联邦议会提交三项宪法修正案（针对共产党在政府的领导地位，解散国民阵线，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育中的地位被科学和人道主义原则所替代）。阿达麦茨还承诺向布拉格市政当局要求为公民论坛提供办公场所。

### **第三轮 (1989年12月1日)**

第三轮会谈伊始，哈维尔强调民众已经失去耐心，必须尽快采取下一步行动。他进一步提出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希望讨论的三点要求：(1) 公民论坛

的法律地位；（2）公民论坛的办公场所；（3）捷克政府需要做出的改变。捷克共和国总理弗朗季谢克·皮特拉看来比阿达麦茨容易妥协，他立即接受了前两点，会谈因此进入对第三点的讨论：哈维尔建议皮特拉不要试图“重组”他的内阁，而应立即辞职（他指出，如果只是重新调整内阁，民众会认为其中有内幕交易，由此可能引发危机）。他建议说新内阁成员必须真正是新面孔和专家。他随后提出了与阿达麦茨前几次会谈时相同的意见：关于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关于民兵；关于工作场所党组织的问题。

和阿达麦茨一样，捷克总理皮特拉表示他希望改组政府而不是辞职。他还和阿达麦茨一样强调了程序合法性，但他也表示会尊重那些已经被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但尚未实施的国际规范。

哈维尔说如果联邦和捷克的总理人选都保持不变，民众会认为没有任何进展。按照哈维尔的说法，留给皮特拉的唯一留任机会，是提名一个会被民众自然接受的内阁。实际上公民论坛协调中心愿意不在他们的任何通告中提及皮特拉的名字，给他一个通过迅速提名一个被广泛支持的新内阁而获得民众支持的机会。像与阿达麦茨的会谈一样，哈维尔进一步阐述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坚持用“辞职”而不是“改组”一词，以达到显著的社会“效果”。如果皮特拉递交辞呈，公众会给他两周时间；如果他试图只是改组内阁，公众的反应在两天之内就可能发展到无法预计的地步。必须指出的是，第三轮会谈在周五举行，两天后剧院团体和学生就将做出是否继续罢工罢课的决定。

当皮特拉邀请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提名部长候选人名单时，与前两轮一样，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显然还是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好准备。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不希望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们是在提议“他们的”部长候选人。他们也不希望加入国民阵线或者成为一个政党。他们视自己的角色为一种制衡，一种保障，确保当局落实自由选举之类的社会期望。

会谈者讨论了公报草案。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对于从宪法里删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欢迎，并列出了如下要求：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解决工作场所中民兵和党组织这一问题。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同时指出最好的政府变革形式就是集体辞职。

捷克总理表达了希望国家向世界文化开放并回归自身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的愿望。他说他的政府准备好了清除所有政治、立法和行政方面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捷克总理将会改组他所领导的内阁。

在公报的最后部分，参会者共同呼吁所有市民在实现全面民主的道路上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杜绝压迫和公开诽谤政治对手的行为。

#### **第四轮（1989年12月5日）**

这一轮谈判，发生在阿达麦茨从莫斯科之行返回后，他到那里去征求意见，并且据推测见了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新联邦政府的组建。哈维尔提议政府设7位副总理。他提名了一位主管经济的反对派副总理候选人弗拉基米尔·德罗西（Vladimír Dlouhý），接着提名伊日·丁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为外交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为财政部长，以及彼得·米勒（Petr Miller）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关于

联邦内政部长的职位，哈维尔提名巴维尔·里赫茨基（Pavel Rychetský）。

阿达麦茨出乎意料地宣布将提名博胡米尔·乌尔班（Bohumil Urban）而不是他本人出任下任联邦总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感到措手不及，发现正当讨要结果的时候，他们突然猝不及防地需要另找一个谈判对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其实是阿达麦茨精心筹谋的政治赌注，一旦成功就会使得他成为下一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明显失望了片刻之后，提醒阿达麦茨注意社会普遍的不安情绪，不受控制的罢工等等。哈维尔说他别无选择，只有拜谒总统胡萨克并提交反对方自己的总理人选。阿达麦茨的顾问奥斯卡·科雷奇提议哈维尔与阿达麦茨单独私下交谈一会儿。

在阿达麦茨和哈维尔从单独谈话回到谈判桌后，哈维尔说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将于晚上7点30宣布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总理辞职，因为他关于改组政府的建议根本不可接受。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们会立即向总统要求提名新总理候选人。这时，阿达麦茨的助手巴维尔提议阿达麦茨作为一个受到大多数公众支持的人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犹豫片刻之后，哈维尔提议如果阿达麦茨成为总统，则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候选人、人民党时任中央书记理查·撒彻（Richard Sacher）担任总理职务。这样就能一举解决几个问题：共产党员成为总统，一个非党员成为联邦总理。但他们都是捷克人，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一位斯洛伐克人出任联邦议会主席。<sup>3</sup>阿达麦茨提名共产党官员马利安·加尔法（Marián Čalfa）作为联邦总理，加尔法在1988年联邦政府改组时赢得政治声望。在捷克斯洛伐克特殊阶段的平衡游戏中要求一个斯洛伐克人当联邦总理的时候，加尔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共产党候选人。

这时候哈维尔提议这轮谈判休会并于明日继续进行。本轮剩下的就是会议

公报问题。虽然在第四轮会谈的最后几分钟气氛十分轻松，联合公报仍未能发表。

注释 .....

- 1 民兵组织起了共产党私人武装的作用。它由最忠诚的共产党员组成，建立于1948年2月共产党政变期间。他们定期进行射击演习，有力地威慑了其他民众。
- 2 洽尔法是联邦政府里专门负责立法事务的部长，他的职权范围包括负责准备即将在1990年生效的新宪法的草案。
- 3 在过去40年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传统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对等原则。任何时候，如果一个捷克人成为联邦总统，则一个斯洛伐克人就会被委任为联邦总理，反之亦然。

简记

Eleanor Zhang

作者 Eleanor Zhang 为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交叉学科项目硕士研究生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全球民主 人权事件



## 1.加蓬发生军事政变

加蓬的军事政变领袖，布里斯·奥利吉·恩格马（Brice Oligui Nguema）将军于8月30日领导政变，推翻了加蓬长达55年的邦戈（Bongo）家族王朝统治。他在9月4日周一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并承诺给予“自由、透明和具有公信力的选举”，从而恢复加蓬的正常公民社会运行机制，然而他并没有表明这些承诺具体的完成时间。

当天凌晨，加蓬选举中心宣布，现任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Ali Bongo Ondimba）在2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64.27%的得票率获得连任。随后，军方人员宣布选举结果无效，解散国家机构，在首都实施了军事接管。邦戈家族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个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国家，并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该国的石油出口位居全球第三十位。

恩格马将军曾在邦戈总统及其父亲奥马尔·邦戈·翁丁巴（Omar Bongo Ondimba）的统治时期效力多年。在他宣誓就职之后，与商界和宗教领袖、工会、政党、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和记者们举行了多小时的会谈。他对商界领袖发出警告，声称要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并宣布对加蓬的问题百出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30日通过发言人杜加里克发表声明，对加蓬正在发生的政变予以坚决谴责，认为这不是解决选举后危机的有效途径。并对周末选举期间可能发生的“严重侵犯基本自由的行为”深表关切。

这是西非和中非地区三年来发生的第八次政变。有11个成员国的“中部非

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宣布他们的领导人将会面，讨论对此政变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加蓬的主要反对派“Alternance 2023”呼吁国际社会鼓励军事政变领导人将权力交还给人民，声称他们才是8月26日选举的合法获胜者。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加蓬政变表达了批评态度，并对其可信度感到担忧。

## 2. 尼日尔政局动荡军人夺权

2023年7月26日，尼日尔由阿布杜拉曼·特尚尼(Abdourahmane Tchiani)将军领导的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Mohamed Bazoum)。尼日尔军队发言人阿马杜·阿布德拉马内 (Amadou Abdramane) 宣布关闭国家边境，全国实施宵禁，并关闭政府机构。

7月28日，特尚尼将军宣布自己为国家元首。

8月3日，尼日尔独立日，支持政变的尼日尔人走向街头挥动尼日尔国旗和高呼反法国口号，以此来庆祝军事政变。支持政变的抗议者还焚烧法国国旗，并向法国大使馆扔石块。一些支持政变的尼日尔人甚至高喊“打倒法国”，突显出非洲对法国的反感情绪日益增长。这些反感情绪源自法国对非洲的殖民历史，以及非洲在全球政治中逐渐上升的地位。

与此同时，反对非法夺权的尼日尔人也举行了反政变抗议活动，其中一些活动遭到了军方的严厉镇压。尼日尔民主社会主义党（PNDS-Tarayya）的青年组织表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它破坏了现有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在其声明中，PNDS-Tarayya呼吁年轻人“团结起来捍卫共和国和原有

的民主机构”。

尼日尔的军事政变后的三天，有15个成员国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针对此事召开峰会。ECOWAS对政变表达谴责，并呼吁恢复宪政秩序，无条件释放总统巴祖姆并恢复其职务。如果执政军事政权不满足恢复宪政秩序和恢复总统巴祖姆的条件，ECOWAS将采取军事干预，设定了截止日期为2023年8月6日。

ECOWAS立即关闭了尼日尔的边界，并禁止了前往该国的商业航班。作为经济制裁的一部分，它停止了与尼日尔的金融交易，并冻结了尼日尔的国家资产和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4日表示，法国决定召回驻尼日尔大使，同时结束与尼日尔的军事合作。

### 3. 厄瓜多尔暴力事件频发，多名政治领袖被害

2023年8月，厄瓜多尔在不到四周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了三起政治相关的谋杀案，其中包括一位总统候选人遇害。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统计，今年上半年已经发生了3,568起暴力死亡案件，远远超过了去年同期的2,042起。而在2022年全年因暴力死亡的总案数有4600起，是2021年的两倍，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厄瓜多尔左翼政党公民革命党的一名地区领袖佩德罗·布里奥内斯（Pedro Briones），8月14日在埃斯梅拉尔达斯省遭到枪杀。8月9日下午，厄瓜多尔政治候选人费尔南多·比利亚维森西奥（Fernando Villavicencio）在基多市政治集会结束后遭枪杀。此前，他对犯罪组织和官员腐败持有坚定的反

对立场。而仅在这两起谋杀案发生之前，7月26日曼塔市市长奥古斯丁·因特里亚戈（Agustin Intriago）被枪杀。

在接连发生暴力事件后，总统拉索（Guillermo Lasso）8月10日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8月20日，厄瓜多尔提前举行大选，这是该国首次在紧急状态下举行大选。由于无人直接当选，总统选举将在10月15日进入第二轮。

#### 4. 美国制裁涉嫌“强制同化”西藏儿童的中国官员

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将针对涉嫌在中国政府经办的寄宿学校中对西藏儿童实施“强制性同化”教育的中国官员出台新的签证限制。这一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激起了中方的强烈回应。

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所有参与执行了西藏同化教育政策的现任和过往中国官员都会受到签证限制。但因涉及到美国签证记录的相关机密法规，涉及到的官员名单等更多细节并未公布于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新发布的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强制同化”政策。他指出，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抹杀西藏年轻一代对其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记忆。声明中还专门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首字母缩写，以此表明美国的立场。

根据联合国今年2月份的报告显示，约有100万西藏儿童被相继送入寄宿学校，而其中许多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这些学校开设以普通话为主的“强制

性教育”课程，几乎完全不涉猎藏语、藏族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学习。这导致许多西藏儿童不能熟练掌握母语，加剧了他们文化身份的丧失。

## 5. 以色列民众数月游行抗议政府司法改革法案

2023年9月，距离议会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提出的司法系统改革方案进行最终投票的时刻越来越近。在过去的七个月里，每到星期六，以色列各个城市的街头都挤满了抗议人群，他们挥舞国旗，抗议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政府提出的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

根据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贾姆朱姆在特拉维夫报道称，“批评者表示说，此次司法改革提案的任何一部分被通过，都将对以色列现有的民主构成严重打击。”

此次内塔尼亚胡的改革提案包括：允许议会以简单多数投票，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取消最高法院在政府做出“极端不合理”决策时对其审查的权力；赋予议会在选举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中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取消了要求各部部长听从由总检察长指导的关于法律顾问的规定。

政府表示，这些法案是为了制衡最高法院对立法干预过多，并且针对法官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制定的。但批评者称这些改革会把以色列推向威权主义。鉴于以色列没有宪法，政府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总统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存在，以色列的民主结构已经相对薄弱。因此，最高法院被视为捍卫公民权利和维护法治的机构，司法机构在监督国家行政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反对者担忧，司法体系的削弱，会导致政府将拥

有更大的权力，这个以男性主导的政府支持全面吞并约旦河西岸，同时也支持一些反对 LGBTQ 群体、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以及妇女的政策。

## 6. 柬埔寨国王任命现任领导人洪森的儿子洪玛奈为总理

8月5日，柬埔寨现任领导人洪森（Hun Sen）通过媒体正式确认了他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CPP）在上个月的选举中在下议院125个席位中赢得120个席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8月7日，柬埔寨国王根据洪森的要求发布皇家命令，任命洪森的儿子，现年45岁的洪玛奈（Hun Manet）为总理，接替他父亲长达38年的铁腕统治。

洪森于1985年成为总理，其在位时长超过了已故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成为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治领袖之一。

上个月的大选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批评者称，与其说是选举，更像是一次加冕仪式。作为CPP的反对党兼主要竞争对手的烛光党（Candlelight Party），被以“没有正确提交参选文件”为由取消了选举资格。除了CPP以外，皇家派党取得了五个席位，而其他16个反对党都未能获得任何代表席位。CPP在820万张选票中获得了78%的票数。在选举之前，政府将任何抵制选举或损坏选票的企图都定为刑事犯罪。

据人权观察7月27日的文章点评，此次柬埔寨的选举是带引号的选举，是没有竞争对手、属于洪森一人的舞台。

美国、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派遣观察员参与此次选举，称该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欧盟官员表示，此次选举在一个政治和公民空间受到限制的环境中进行，反对派、民间社会和媒体无法有效开展工作而受到阻碍。国内外观察家指出，选举过程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反对派受到打压，选举前的政治氛围不利于竞选活动的开展。

## 7. 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涉嫌杀害锡克族领袖

9月25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指控，称印度政府特工参与了今年6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杀害一名锡克领袖的案件。

6月18日，加拿大锡克社区领袖哈迪普·辛格·尼加尔（Hardeep Singh Nijjar）在位于温哥华东南部萨里市的一座锡克寺庙外被枪杀。

这一指控引发了锡克社区内的愤怒情绪，同时使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升级。

特鲁多于9月18日表示：“任何发生在加拿大领土上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对加拿大公民的杀害，都是对我们主权的侵犯。”

印度坚决否认了加拿大的指控，并指责加拿大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遏制反印活动和所谓的“锡克极端主义”。

尼加尔作为锡克社区的领袖，主张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独立主义运动，这一运动也称为哈利斯坦运动，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结束时期。

如今，锡克教徒占印度人口约2%的比例，并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1984年6月，当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下令对锡克教进行军事突袭，以铲除分裂势力。许多锡克教徒的家庭在此后逃离到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寻求政治庇护。加拿大是目前除印度外拥有最多锡克人的国家。

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它已经针对政治反对派、记者以及包括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在内的宗教少数群体进行了打压，人权组织称这是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印度政府则拒绝了有关人权侵犯的指控，称这是对其内政的干预。





石坡上的情侣 作者：郑玉禧

##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旨在为中文读者提供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观点、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民主转型的深入探讨。它注重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敬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欧、澳洲等广泛地域范围以及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等专业背景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欢迎就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赐稿——

1. 关于中国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问题的研究讨论；
2. 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前景、路径、风险、战略等问题的研究讨论；
3.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经验、教训的研究或介绍；
4. 关于民主理论、宪法设计与民主建构的研究或介绍；
5. 关于民族与国家性问题的研究讨论；
6. 新书与重要著作的推荐、评论。

投稿要求如下：

1. 稿件应为汉语。也欢迎用藏语、维吾尔语投稿，我们将协助译成汉语发表。来稿请标明篇名、关键词、摘要（不超过 200 字）、作者姓名及简介、联系方式。
2. 国内作者：由于是学术刊物，鼓励国内作者用实名，但出于安全考虑，国内作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用笔名。
3. 稿件字数：论文，以 5000-8000 字为最适宜，建议不超过 10000 字；更长的文章可以考虑分期发表。书评，建议在 2000-3000 字之间。译作，建议在 4000—10000 字之间。
4. 来稿须符合写作规范要求，详细注释体例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上：<https://chinademocrats.org/?p=24>。
5. 投稿邮箱：[cjd@chinademocrats.org](mailto:cjd@chinademocrats.org)。您也可以通过此邮箱向我们提出选题策划、建议意见、咨询或者合作方案。
6. 《中国民主季刊》拟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中出版，截稿日期分别为每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9 月 1 日与 12 月 1 日。
7. 稿件刊发后将按字数支付稿酬。

##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How to Subscribe to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季刊》是电子出版物，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免费下载，也可以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免费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您。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our website, or you can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we will send it to you periodically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我们也印刷少量纸质版，以满足个人、机构、图书馆收藏需要。纸质版每期价格为 38 美元。

*In addition, we print a small number of paper cop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Paper copies are available for \$38 per issue.*

下载电子版：请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To download an electronic copy: Please visi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bsite at <https://chinademocrats.org/>.

订阅电子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或将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 [cjd@chinademocrats.org](mailto:cjd@chinademocrats.org)。

To subscribe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or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to [cjd@chinademocrats.org](mailto:cjd@chinademocrats.org).

订购纸质版：请电邮 [cclassics1994@gmail.com](mailto:cclassics1994@gmail.com) 联系代理商 China Classics Inc.。

*To order paper copies: Please contact our agent China Classics Inc. by email [atclassics1994@gmail.com](mailto:atclassics1994@gmail.com), or by phone at 858 229 9677.*

# 中国民主季刊

##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BN 979-8-9875925-0-2



9 798987 592502